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研究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言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座巨大的山岳，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观察和鉴赏。一种博大的思想理论，人们也可以从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从事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博大精深，是一个庞大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许多人已经从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哲学等不同领域，从体制改革、思维方式、工作方法、革命风格、治国艺术等不同层面进行研究。我们则对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情有独钟。这固然同我们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教学与科研的职业性爱好有关，更重要的在于，经过认真学习和研究，我们深感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在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和重大理论价值。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们去进行深入的学习与探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对中国政情较为熟悉，并对邓小平改革思路颇多了解的尼克松以亲历所见，在其遗著《超越和平》一书中写道：“最近 10 年，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并有可能在下个世纪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超级大国。在过去 45 年里，它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发展迅速的经济巨人。现在，它的增长率是 14%，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是最高的。……贸易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 40%，这一比例高于日本、美国或印度，其中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出口额的 30%。1993 年 1 月至 9 月，中国的外国投资增长了 171%，反映了人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尽管大多数国营企业亏损，享受国家补贴，但私人企业赢利，它们创造的产值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人均国民收入在最近 10 年里增长了 2 倍。在下一个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有可能变成最富有的社会。”要解开新时期中国经济奇迹之谜，就不能不深入了解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

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据统计，他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反复提出这个问题不下 20 处。这不是一般理论问题，而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的：“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几十年间，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是总的来说还需要很好地探索。近几年国际上发生的急剧变化，使这个问题更加引人深思。”值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庆幸的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倡议下，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命名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和发展社会主义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但是，经济建设、发展经济是中心，则是确定无疑的。邓小平曾经反复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的“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①]“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②]同时，他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提出了衡量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这些思想，我们认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特别重要部分，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核心。邓小平的其他重要经济思想，如对外开放思想、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等，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同时，发展经济始终是我国今后长期的主要任务，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如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的结尾部分语重心长地叮嘱的：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 20 年，如果从建国起，用 100 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同时，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特别是战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如何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发展经济的任务。因此，发展经济学在战后的兴起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和联合国制定的三个十年的发展计划都并不成功，而在战后经济发展中取得突出成就的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兴起，则引起世人关注。问题在于邓小平所说的：“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关键是“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①]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广大、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的大国，十几年来正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成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一本书中写到：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 20 世纪各种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 21 世纪必将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头等大国。原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认为，“邓小平提出经济开放和面向市场，这促使经济出现两位数的实际增长率。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不仅将超过日本，而且也将超过美国和欧洲联盟。可见，中国国民经济能够相当迅速地跃居世界前列。”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认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在 50 年内可能超过欧美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成为一条巨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发展的成就，必然引来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的高度评价。印度学者苏地生直接了当地指出：“美国《时代》周刊已经两次把邓小平选为当今世界的风云人物，没有什么人对此提出异议。全世界还应该认识到，邓小平是当代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主张授予邓小平诺贝尔奖。苏地生主要从我国农村改革的伟大成就来分析问题，认为邓小平用生产责任制这根“魔杖”解放了 8 亿中国农民，使中国农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76 页。本书所引用的《邓小平文选》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卷为 1994 年 10 月第二版，第三卷为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4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1 页。

业走上了新的征程。在短短 5 年的时间内，农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同时，由于采取“农业第一”的方针，避免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在保持人口分布平衡的同时，最好地利用空间。这样就既创造了经济“每年以两位数递增”的奇迹，又避免了西方工业革命兴起时期和现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种种弊端。因此，他认为邓小平“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的模式，而这一模式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今天所需要的”。苏地生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因为他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农业和农民问题，以及传统农业为主的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化的问题。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贡献的确辉煌夺目。我们认为，邓小平对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是全面系统的，它涵盖了发展的地位、目标、道路、动力、方式、结构、环境、保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恩格斯在 1869 年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一篇书评中曾经这样评价马克思《资本论》对于资本和劳动关系的科学而透彻的分析，说他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察下面的山景那样”，“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①]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不仅站得高，看得远，而且又是最富理论创新的。诸如，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设计；他的改革开放思想，特别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想；他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他从时间、空间、结构来阐述经济波浪式发展规律等等，都把经济发展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我们认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是面向 21 世纪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中华民族是幸运的，有了这个发展经济学，将使中国从百年屈辱贫困历史走向繁荣富强的光辉历程。同时，邓小平在中国创立的“新的模式”的成功，至少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

邓小平曾经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评价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对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就是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来学习和研究的，并力图按其本来面貌来阐述，虽然我们在主观上尽了最大努力来切磋琢磨，但是，由于理论水平的限制，疏漏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匡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69 页。

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研究

第一章
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是探索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经济发展思想最为突出、最为丰富，起着基石作用。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发展，并日臻完善，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系统地考察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发展历程，有助于准确把握它的内涵特征和精神实质。

一、经济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指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①]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政治家邓小平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时总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着眼未来。他指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②]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具有开放性特色，主要体现在他以世界发展格局为参照系来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20 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发生巨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俄国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第一阶段，总特点是“战争与革命”的格局。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实践，它作为一种制度开始与资本主义同处于一个历史阶段，进行过殊死较量。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80 年代末，为第二阶段，总形势是冷战格局，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与竞争。进入 70 年代以来，两种制度的和平竞争已成为主要现实，双方的斗争，更多地从过去的军事方面转向经济和政治方面。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出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把苏联模式凝固化、教条化，把它作为“唯一”模式加以推广，从而窒息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普遍经历了曲折，以致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以后是第三阶段，可称为“后冷战”时代。世界处于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尚未形成，国际局势不可测的因素还很多，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呈现出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正面临着世界格局的重大转折和对国际局势的重新认识问题，以便适时调整内外政策。上述世界格局的巨变，对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际形势判断变化，是邓小平调整我国内外政策重心的重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较长一段时期里，由于国际上“冷战”格局的存在，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83 页。

上“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一直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想的干扰，过度渲染了国际局势中的战争因素，甚至认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因此，我国国际战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大战，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方针的制定，都是从这种认识判断出发的。反映在内政方针上，势必坚持以备战为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果，把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备战和转移战略设施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极为低下，造成不应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

限于历史条件，邓小平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局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原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回忆说：“1975 年 10 月（应为 1974 年 10 月——引者注），我作为联邦德国总理首次正式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毛泽东强调说：‘我知道苏联会怎样发展下去，要打仗。’我进行了反驳：我不想排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但如果西方具有足够的防御能力，爆发的可能性不大。毛坚持其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当时的代总理邓小平表示赞同”。“1984 年 9、10 月份，我在访毛近十年之后，又一次来到中国。这次谈话刚开始，邓小平便回顾了我们那次争论。突然，他直爽他说：‘您当时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您是正确的。’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①]查阅《邓小平文选》，1984 年 10 月 10 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中说到：“1974 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内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②]事实上，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通过对整个国际局势作的填密分析，改变了对战争危险性迫近的看法。1983 年 3 月 2 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③]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为我国提供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有利国际环境，直接推动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对外开放方针的贯彻，促进了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调整。1985 年 6 月 4 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阐述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①]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性迫近的看法，而是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有鉴于此，才能把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第二个转变，是我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搞对外开放，“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就反对谁”，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显然，第二个转变是建立在第一个转变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战后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引起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又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此种机遇和挑战的深切感知，

[①]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 年 1 月版，第 29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2 页，2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2 页，2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6 页。

成了邓小平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一场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科学技术革命，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等新能源的发现与利用；电子计算机等的发明和应用；新材料的开发和利用；空间技术的发展以及遗传工程的重要成就等等。80 年代以后，电子、激光、光导纤维、遗传工程、新能源、航天技术等等有了新突破，并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它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科技产业革命，始于美国，后来逐步扩大到西欧、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经过这次技术革命，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以 1965—1973 年这段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年代”为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年平均增长率为 4.7%。在世界经济中，40—50 年代是美国一家独霸，在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经济大发展期间，联邦德国与日本也相继崛起，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6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亚洲的“四小龙”也利用有利的国际机遇，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经济也迅速崛起，业已形成新兴的工业化体系，出口额提高了 100 倍以上，用 25 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资本主义工业化 100 年的路程。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经过 50 年代初期高速增长阶段后，由于多种原因，较长时期内处于停滞和缓慢发展状态，与世界的差距就拉大了。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我国与世界发展差距就拉得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①]这就对我国造成很大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霸权主义的压力。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②]二是周边国家迅速发展所造成的：‘友好的压力”。邓小平又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③]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强了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程度，各国间的经济、科技联系日趋密切。这一切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展起来，不加强对外交往，不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外资以及外国智力，闭关自守就不可能成功。“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此外，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经济结构大调整，在工业方面，从劳动密集型上升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必然要让出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及设备，输出资本，这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留下了发展余地。加上当今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①]目前正是我国大发展的良机，要善于把握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3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6 页，37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6 页，37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4 页。

第三，战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尤其是近年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促使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进行再认识。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流行过一种观念，认为斯大林确定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社务主义各国可以和必须效法的唯一楷模。但是，这种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在苏联的实践并不成功，在东欧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也遭到了挫折，在我国全面建立后，人们也普遍感觉到它带有根本性的缺陷，需要进行改革。1985 年 8 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总结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

二战以后，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到 60 年代，一大批国家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束缚获得了独立，不少国家独立后都向往社会主义，甚至直接把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联系起来。其中，流行于撒哈拉以南黑非洲的非洲社会主义思潮，如恩克鲁玛主张的“加纳式的社会主义”，尼雪尔提出但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在非洲新兴独立国家很有影响。他们原想通过社会主义措施来建立平等、公正的新社会，但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标，而且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困难。1980 年 4 月 21 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的谈话说到：“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①]同年 5 月 5 日，他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中又说道：“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②]

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坚定地认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得到提高，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实践证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并不成功。他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

从国内条件来说，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是在认真汲取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并不断得到丰富完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构成了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活水源头。乒如毛泽东所说：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对此，邓小平明确说过：“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③]

邓小平谈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讲话很多，其中，1988 年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39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4 页。

5 月 18 日，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的谈话中说：“我国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太好。”[①]这是总的评述，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情。

从 1949 年建国以来直至 1957 年，我国经济建设形势很好，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经济高速发展，“事情做得非常好”，“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公认的”，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当然，这期间也不是没有缺点，主要是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虽然从总体上说“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但缺点是“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从 1957 年起，“左”的倾向开始抬头，一直延续到 1978 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历了相当曲折的道路。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②]在这 20 余年中，我国经济建设虽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总的看来，成功的经验少，挫折的教训多。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而当时正是世界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我们耽误了 20 年的发展时间，损失了很多发展机遇，这是十分可惜的。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③]邓小平对这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作过多次认真总结，无论是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将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近 30 年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始提出了现行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历史经历了巨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邓小平在总结这段时期的成功经验时把它概括为“三大转变”：“1978 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有时他也概括为“二大转变”：“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国内的各种事情都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两者其实是一致的。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正是在这段时期伟大的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并发展得到成熟，也必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而日臻完善。

当然，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还与他独特的经历、思维方式和领导风格密切相关。任何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时也无不打上个人的主观烙印。关于这个问题，在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特色中有专门论述，在此恕不赘言。

二、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任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85 页。

开始就对各种问题摸得很准是不可能的。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他总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在总结实践提供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为其理论创造提供养分，在实践中使已有的认识不断得以丰富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总体上看，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孕育”准备时期

早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就十分关注经济问题并把它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证。1943 年 7 月 2 日，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敌后抗战是一个极复杂、极艰难的斗争，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整个六年，并且已经奠定了继续坚持最后胜利的基础。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邓小平认为其中一个重大秘诀“就是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①]毛泽东指出，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邓小平也同样认为“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而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参与主持中央西南局工作。尽管当时面临的各种任务复杂，头绪繁多，诸如剿匪、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等，但他始终把经济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上。1950 年 5 月 16 日，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③]其中主要还是发展生产，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基础。此外，在理论上，邓小平还提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理论”，“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④]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与他后来在 80 年代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以及生产力标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邓小平对八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转变的路线是完全赞同的。面对历史的转型期，1957 年 4 月 8 日，他在西安干部会上强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他还客观地指出：“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但在改造自然方面，这门科学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在建设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他告诫全党：“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①]遗憾的是，邓小平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7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8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47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48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263 页。

的这番话不幸而言中。在随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我国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栽了大跟头，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邓小平也坦率地承认，“大跃进”的错误他也有份。

60 年代初，我国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不得不着手调整，尤其是 1962 年在恢复发展农业问题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已成了党内讨论、争论的一个热点，也是个很敏感的问题。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而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②]他认为“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的做法可“使他们合法起来”，因为这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1974 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顶住“左”倾思想压力，立即提出了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首要任务的观点。1975 年，他开始着手全面整顿。他认为只有通过整顿，解决交通、农村、工厂、科学、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一再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大局，要全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批评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是“大错特错”，全党要讲大局；为生产力论正名，把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全面整顿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改革的思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5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作的《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的谈话提出了许多发展经济的思想观点：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整顿企业管理秩序；抓好产品质量；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

上述内容表明，邓小平许多重大的经济思想观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已具雏形，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经济发展思想尚处于萌芽状态，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思想。

（二）形成和成熟时期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结束了党内“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一系列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同时，从这次会议开始，邓小平已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既是党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判断、战略决策上的核心，也是理论创造上的核心。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进行指导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开创性的理论创造，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他的经济发展思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是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和成熟的时期。我们之所以选择党的十三大作为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形成和成熟的最后标志，是因为党的十三大把邓小平在 1987 年完整地表述的从本世纪 80 年代到下世纪中叶，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323 页。

段我国现代化三步发展战略思想，正式作为全党的战略任务肯定下来，同时，围绕三步走的战略思想，他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思想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逐步提出，而到 1987 年达到完全成熟。因此，我们认为，以 1987 年党的十三大为标志，邓小平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经济发展思想。主要表现在：

1.确立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国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在这个转折过程中，邓小平起了重大作用。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反复强调：“我们从 80 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意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①]邓小平认真总结了我国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指出：“多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②]使我国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提高，这是个十分沉痛的教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也引发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他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基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①]因此，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始终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路线，并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压倒一切的标准。

2.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任务完成后，如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心任务便突出地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 1979 年 3 月，就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还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的两个重要特点，即底子薄及人口多、耕地少进行了分析。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更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和基本方向。1984 年 10 月，他在向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介，绍我国经验时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②]1987 年 8 月，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③]

3.制定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有人认为最早促使邓小平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是 1979 年 12 月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4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1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4—9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2 页。

6 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其实，早在 1979 年 10 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就讲到过：“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 1000 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比较好过了……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①]可见，在此以前，邓小平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早已有所考虑，因此，他在与大平首相谈话中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比如人均收入 1000 美元）“也不是随意说的”。1982 年党的十二大确认了邓小平到本世纪末分两步走实现“翻两番”的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1984 年 10 月，邓小平又提出与党的十二大含义不同的包含后来提出的“三步走”基本内容的新的“两步曲”：“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②]1987 年 4 月 30 日，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完整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③]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战略目标，这是根据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目标思想对我国 70 年发展战略目标的完整表述。这说明邓小平已完成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蓝图的总体设计，是邓小平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4.确定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为了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较早地把注意力集中于科学教育事业。1975 年他在复出后着手全面整顿时就提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1977 年，他再次复出后明知科学、教育难搞，但还是自告奋勇来抓，因为，他坚信“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1978 年 3 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重申“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更是反复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在我国发展经济重点问题上，邓小平在 1982 年 5 月会见利比亚国家元首多伊时的谈话中还谈到：要“重视发展农业”，工业方面，“我国国家大、人口多，没有一点大的骨干工业是不行的”。1982 年 9 月，他完整地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①]10 月他又说：“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②]邓小平关于我国产业部门协调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的主张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5.强调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为了发展我国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94—19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79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6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 页。

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这是邓小平亲自倡导和制定的重大政策。邓小平曾经指出：“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即改革开放。他反复强调，我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③]

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最早可追溯到 1975 年他提出的全面整顿的主张。1978 年 10 月，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改革这个概念。同年 12 月，他列举了我国经济管理工作中的种种弊端后，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78—1982 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在农村，“首先解决农村问题”，搞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自主权，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遭遇了重重阻力。对此，邓小平对农业改革多次明确表示肯定和支持，1984 年 10 月，他称“这几年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在农村改革大好形势的推动下，1984 年我国城市改革在经过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全面展开，这意味着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1984 年 10 月 10 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中说：“1978 年开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第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邓小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思想指导下，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效。邓小平说：“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早在 1980 年邓小平就提出过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当时未具体化。1986 年，邓小平再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分析总结国内外形势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反复强调“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③]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对我国对外开放的策略和步骤做了精心部署。1980 年，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国务院决定首先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 年，邓小平亲自考察深圳、珠海、厦门特区，看到一片繁荣的景象很受鼓舞，在他的建议下，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 14 个港口工业城市，此后，沿海经济开放区不断扩大。1987 年 2 月，邓小平指出：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

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解放仍然受到束缚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这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高度概括。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7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3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64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7 页。

6.明确我国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早在 1979 年，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这个思想在当时并未成为全党的共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深入开展，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内容上看，当时所说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邓小平对此评价很高，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党的十二大报告也肯定“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并确定我国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7.制定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

早在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就会产生“示范力量”，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在新时期，邓小平不仅多次重复和肯定了这个政策，而且通过制定和实施农村和城市体制改革、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以及从沿海开始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政策，使这一“大政策”得到贯彻和表现，打破了以往平均主义的做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在空间上的波浪式向前发展。

8.阐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团结的政治局面。”[①]

就国内条件来说，鉴于历史教训，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早在 1975 年，邓小平在全面整顿过程中面对“文革”的混乱局面，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引用毛泽东“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提出“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1973 年 12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重申“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不仅多次强调指出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且阐述了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现行政策不变，排除“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

就国际条件而言，面对 80 年代以来国际出现的和平与发展的潮流，邓小平认为，这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中国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建设”，“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因此，我国的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以上是本阶段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它表明，邓小平经济思想已基本定型，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丰富，日趋成熟。在这个基础上，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与经验，系统地阐述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10 页。

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初步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途径、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理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极好总结，标志着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并成了全党的共识。

（三）发展深化时期

党的十三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人们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经济得到进一步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邓小平高兴他说，中国真正活起来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矛盾，主要是经济比例失调，通货膨胀严重，腐败现象蔓延，经济不稳定和政治不安定因素增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直至发生了 1989 年全国性政治风波。与此同时，1989—1991 年，我国进行了三年治理整顿，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国际上也出现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我国在国际形势上也面临着严峻局面。在这种复杂的形势面前，邓小平主张要排除“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继续前进，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认为只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邓小平坚定不移地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①]在这个时期，他针对新的实际进一步发展深化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思想，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南巡谈话，实际上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实践和方针政策作的全面系统总结，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指明了方向。在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鼓舞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再度涌起。在这段历史时期，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向来认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今中国的主题，“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①]经济发展要保持适当的速度，不能滑坡，“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发展才是硬道理”确是至理名言，这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现代化主题的深化。

2.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1988 年 9 月 5 日、20 日，邓小平在两次谈话中说到：“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②]在这以前，邓小平只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他在理论上的一大创见和认识的深化，反映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日益增大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因此，“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具有世界性战略眼光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6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4 页。

3.提出要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1987 年 11 月 16 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到党的十三大的一大特点是“保证我们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1988 年 5 月，他又提出“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①]1989 年政治风波后，社会上出现姓“社”姓“资”问题的空洞的论争，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对此，1992 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为此，他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大大深化了以往的生产力标准。他还进一步比较完整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讲到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认为不完全，应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邓小平的一大理论贡献。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面认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奠定了基础。在邓小平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国内改革力度加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对外开放步伐也加快了，在业已初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基础上，1988 年 4 月，举办海南经济特区，1990 年，上海浦东被列为开发、开放的重点。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党中央又作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对外开放，陆续开放沿江沿边和内陆中心城市，基本形成由沿海到内地梯次发展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取得了巨大成就。

4.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早在党的十三大前夕，1987 年 2 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①]明确把市场和计划当作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但是，1989 年政治风波以后，理论界仍有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与姓“社”姓“资”问题联系起来，对此，邓小平再次严肃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②]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明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之成为全党的共识，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体制保证。

5.提出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二个飞跃

邓小平十分重视我国农业的发展，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 80%以上，农村不发展，中国就不会有大的发展。1978 年以来，邓小平积极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责任制，使农业发展出现了奇迹，1984 年、1985 年达到了顶点。但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0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4 页。

这种建立在细小土地规模基础上的农业，其技术进步和农业的商品化进程是非常缓慢的。1990 年 3 月，邓小平从长远的战略目光出发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③]从目前和长远来看，随着客观条件的成熟，应主动地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促进我国农业的长期稳定增长和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顺利转变。

6.提出经济发展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我国经济发展规律是波浪式前进，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强调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我国经济波浪式发展规律的空间形式。1991 年 8 月，邓小平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跃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①]1992 年南巡谈话中，又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②]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规律的时间形式。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如日本、韩国、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在我国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发展速度较快、效益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总之，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开展，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并且更加系统化了。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8 页，37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8 页，375 页。

第二章
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特色

任何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也无不打上创立者个人的主观烙印。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凝结着邓小平的卓越贡献。它所具有的理论特色、方法论特色以及语言特色，与邓小平的独特经历、思维方式和领导风格密切相关。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内容广博、深刻，富于创新，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风格。

一、长远的战略性

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具有高瞻远瞩的非凡才能，他所看到的未来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历任野战军政委、西南局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改革开放以来，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总设计师。他曾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个林彪”。长期身居高层领导岗位，使邓小平习惯于从战略角度和高度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形成了高屋建领、举重若轻的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对此，1950 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在和薄一波谈及邓小平与刘伯承的不同领导风格时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薄一波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①]邓小平的女儿邓林也说过：“在工作上，他完全是个大手笔”，“他的工作方法好，不是权在手，事无巨细全包揽，而是提得起，放得下，肯放手让别人去做。”[②]

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也往往从宏观战略角度和高度谈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诸如，他把和平与发展问题看作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把我国经济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目标”；把改革开放看作发展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把发展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他在谈到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问题时说，这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在谈到扩大开放时他又说：“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他在谈到产品数量和质量问题时说：“产品不能只讲数量，首先要讲质量。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力。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问题。”……

所谓战略性，是指从长远利益出发，着重对事物发展整体的宏观把握。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战略性特色，首先体现在他的大局观上。他认为，考

[①] 《我眼中的邓小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7 页，226 页。

[②] 《我眼中的邓小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7 页，226 页。

虑问题，必须从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小局利益必须服从大局利益。他说：“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③]。这就是邓小平大局观的哲学基础。从这个道理出发，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早在 1975 年 3 月，他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又多次强调“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①]他始终把发展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作为我国的“中心任务”、“基本路线”，对此要“死扭住不放”，排除一切干扰。在经济建设中也有大局，例如“稳定压倒一切”，“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因为“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又如“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从政治角度谈经济，是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又一战略特色。1984 年 10 月 6 日，邓小平在会见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的谈话中曾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②]1990 年 3 月 3 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又说，经济发展不发展，发展快不快，“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是个政治问题。”[③]经济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从政治角度谈经济，是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突出特点。当然，这与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不相同的。邓小平把发展经济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我党制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要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此外，邓小平认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保障，例如，中国经济要发展，关键的条件是稳定，不仅政局要稳定，政策也要稳定，不稳定，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经济体制改革也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否则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此外，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战略特色还体现在它基本上是一种宏观经济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成了我党的领导核心，但他尽量不在具体决策部门担任职务，对他来说，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才是他责任范围以内的事。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不被具体经济事务所缠绕，而把更多精力放在经济发展目标、战略、方针、政策的宏观思考和把握上。对此，邓小平曾说：“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①]事实上，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发展我国经济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带有宏观经济管理性质。例如，把发展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属宏观经济管理范围； 他提出让一部分地区、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4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77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4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77 页。

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通过努力劳动先富起来，产生示范效应，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只是个“大政策”；他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也是个太原则。

二、深刻的人民性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中一再强调：党在敌占区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利益，凡是能够保护人民利益的事，应努力赴之。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无不尽力提倡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 1958 年到 1978 年这 20 年忽视发展生产力的经验教训时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②]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同志“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理论中的人民性主要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同时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闻民所闻，天视民所视”的思想也有一定关系。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突出地体现出这个特色。

富民思想是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中人民性的重要体现。邓小平在批判‘四人帮”搞的“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时指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以逐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基本目标。富民思想也是邓小平制定一系列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比如，他反复强调我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 1%，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又如，我国的改革和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 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人民性，还表现在他特别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把这些创造总结提高，形成政策加以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崛起，经济特区的试验，各种企业承包制的创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推进等等，都是邓小平热情鼓励群众的创造并加以肯定推广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鲜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①]

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深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

[②]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8 页。

[①] 《伟大的实践，光辉的篇章》，载《人民日报》1992 年 12 月 24 日。

会成功。”[②]因此，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此毫不动摇。他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③]“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拥护。”[④]

三、强烈的务实性

邓小平是现实主义型的政治家，素以务实著称。长期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实事求是、务实苦干的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率先倡导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认为，实事求是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与根本点，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它是我党“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进行科学决策的首要原则。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充分表现占这种强烈的务实精神。

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中务实性的根本体现。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人口多（其中 80%是农民），耕地少，面积大，经济落后，科技文化不够发达，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最大实际。制定我国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邓小平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同解放思想、探索创新相统一的。他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客观实际总是在不断变化，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也不得不变，必须以变应变。邓小平还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②]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颇多创新之处，无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创新的结果，也是他务实精神的体现。

注重实践，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前进，这是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中务实性的又一大特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大胆试验，总结经验，逐步推广。“不搞争论”，大胆试验，是邓小平的一个发明。这就是邓小平著名的“摸论”，表明了他踏实的思想品质和求实的工作作风。有人把它称之为“经验主义”。其实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前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2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0—371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0—371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1—292 页。

无古人的事业，要在没有任何经验的基础上事先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作为指导，这只能是一种空想，这种先验理论越具体，就越空想。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办法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把实践作为检验政策成败得失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许多重大政策都采取大胆试验、摸索前进的办法。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部分地区实行后，有些地方和有些人一下子想不通，持观望态度，他表示要坚决地试，允许观望，“拿事实说话”，当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并被人们接受以后再加以推广。试办经济特区也是这样。

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务实性还表现在注重实效上。战争年代的经历使邓小平形成了野战军式的战略自由、注重结果的思维习惯。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①]60 年代初，他针对“包产到户”问题提出的著名的“猫论”，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姓“社”姓“资”问题的空洞争论，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手脚。邓小平从根本目标上而不是从原则手段上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进一步提出判断姓“社”姓“资”问题的三条标准，完全改变了以往人们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以往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思维误区是把方法、手段当作本质，邓小平坚持目的高于手段，手段服从目的，引导人们走出误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例如，传统的经济理论，一直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不过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场思维革命，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所具有的简洁、质朴的语言特色。这个理论是深刻的，同时又是通俗的。诸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稳定压倒一切”，这些格言式的论断，其中包含的经济学道理十分深奥，而理论的概括却如此简洁、明确、朴实，深入浅出，十分管用。它一旦为人们接受，就会形成全党和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邓小平很多经济思想是在和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会见外国领导人的谈话、视察各地区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以及在重大场合的讲话中阐述的，论述的是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是针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时说的，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性。

四、辩证的统一性

“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号召学习邓小平的这一思想。1957 年，在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讲话中，毛泽东又强调：“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

在邓小平看来，辩证法不仅是一种世界观，更重要的是一种方法论，它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323 页。

为人们提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由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在工作中必须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如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硬”的思想：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这就是“两点论”。在思考全局，统筹兼顾的同时，必须突出重点。邓小平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底，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这就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中充满了这种辩证的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与补充。在经济关系上，以公有制占主体，以个体、私营、合资、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在分配形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

2.整体与重点。产业发展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但是产业发展必须有重点。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提出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应当实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体现了邓小平的这一辩证思想。

3.发展与稳定。邓小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稳定也是辩证统一的，“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①]“发展才是硬道理”。此外，政局稳定与经济发展也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政局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关键，同时，经济发展又为政局稳定奠定基础。

4.内因和外因。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立足于改革，同时必须对外开放。他在论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时，总和改革开放相联系，形成了改革开放的辩证法。

当然，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中辩证法内容十分丰富，只有深刻领会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精神，才能把握它的理论实质。

五、全面的开放性

现代系统论认为，任何客观事物都并非绝对封闭，而是开放式系统。每一个系统都与它的外部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影响着系统的结构、功能与发展。邓小平确立了以全球为参照系的思维视角，他从现代化角度、世界角度、未来角度，思考中国现实发展问题，提出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邓小平开放性思维方式的形成，与他的独特经历不无关系。美国学者戴维·W·张分析说：邓小平的领导特征，可能来自这样的背景：他是20年代以来唯一到国外广泛旅行过的中央领导人。他有在民主、自由法国的几年生活经历；1949年以后，他经常到国外去旅行；尤其是在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1974年，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发言；1978年中美两国外交大门正式打开后，作为中国的“铁腕人物”，邓立即作为美国政府的国宾访美。这样，邓像周恩来一样，比其他人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更早了解有关别国现代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情况，这些独特的经历也许对他的改革政策和把重点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起了作用。[①]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与邓小平不同，毛泽东生平只去过苏联两次。并不是说不出国或很少出国就不具备世界眼光和开放意识，但毕竟“百闻不如一见”。20 年代留法生涯对邓小平开放意识产生了什么影响，目前还未有直接材料证实，但 1991 年 1、2 月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说到：“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 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10 万、20 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②]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他在参观日产汽车公司时发表了谈话：“承蒙各位指教，使我获得了新知识，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中国也制定了使自身达到现代化的目标，为此，我们欢迎经济发达的国家，尤其是日本产业界的协助”。在“光—81 号”子弹火车上，同车的日本记者要他谈谈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感想，邓小平说：“感觉上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如果要说乘坐的心情，则好似有人从后面用鞭子抽赶着我们前进。”接着又加了一句：“我们现在也很需要跑。”[③]这些可以作为某种佐证。

邓小平是放眼世界，着眼未来的思想巨人。他总是立足现实，高瞻远瞩，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现实及未来贯通的交汇点上思考问题。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具有开放性特色，主要体现在他以世界发展格局力参照系来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如他在认真分析 80 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内外政策重心的转变。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和信息革命使世界联成一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历史教训和现实经验来看，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金乃至外国智力，是不可能的，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他指出：“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的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①]因此，他主张“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②]他提出的我国一系列全方位、多层次、多途径的对外开放政策正是这种开放性思维的必然产物。

[①] （美）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喻晓译），法律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7 页。

[③] 董恩明《邓小平访日拾零》，引自《我眼中的邓小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9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6 页，37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6 页，373 页。

第三章
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科学体系

所谓理论体系是指由若干理论子系统所构成的具有内在必然联系的整体系统，它包括理论主题、与主题相统一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内在逻辑结构及其理论基础等等。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制、发展条件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科学回答，业已构成了一整套独立而严整的理论体系，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组成部分。只有科学地把握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体系，才能真正明确它的精神实质和重大价值。

一、经济发展思想的主题

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内容广博，多姿多彩，但它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这是确定无疑的。不过，我们不能一般地看待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论述，他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赋予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命题以创造性活力。不仅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逻辑以此为起点而展开，而且整个理论的内容和体系也以此为基础而构建，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总结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切经验教训的归结点。

1957 年以来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成功的时候少，挫折的时候多。在这 20 余年时间里，总的看来，经济上处于停滞和缓慢发展的状态，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多大改善。邓小平认为，其总根源在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对内表现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工作重心仍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以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则表现为自我封闭，自己孤立自己。此外，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也不对头，如无视生产力发展的本身要求，片面夸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无视客观经济规律，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无视我国国情，制定的政策超越阶段；片面强调高速度，忽视质量效益，欲速不达；分配上吃“大锅饭”，尤其是由于“左”的思想指导，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这一切引发了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1980 年 4—5 月，邓小平在几次谈话中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①]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他还针对“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荒谬论调，指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春，第 312 页。

穷。他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像这样的话，他讲过多次。如果说，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那么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则是贯穿“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一根主线，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切经验教训的根本总结。

第二，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新起点。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其中 80%以上是农民，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这是邓小平在新时期面临的最大问题。过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搬用苏联的发展模式，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走了不少弯路，经济发展很慢。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是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及其历史要求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它是在实践不断摸索、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起来的，而这一切都是从发展生产力出发的。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①]例如，他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他制定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了发展生产力，原来的那套经济体制不行，必须改革。改革先从农村着手，因为中国 8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不发展，中国就不会有多大发展。1978 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承包制人手，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当时很多人持观望态度。邓小平主张坚决尝试，允许观望。结果，农业发展出现了奇迹。随后，从 1984 年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逐渐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从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及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和认识步步深入，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着眼，总结了我国历史上闭关自守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他不仅倡导对外开放政策，还亲自制定对外开放的策略和步骤，第一步是建立经济特区，取得重大成功后，第二步是开放沿海城市，建立经济开发区，第三步是形成全国性的开放格局。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发展生产力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典范。

第三，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考虑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聚焦点。

把握发展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这一中心论点是掌握邓小平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一把钥匙，只有紧紧地把握住这一中心论点，才能使其他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到解答，比如：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了解放生产力，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只有“死路一条”。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7 页。

界，闭关自守就没有希望。为什么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因为它适合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利于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不适合我国的生产力水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为平均发展不可能，过去槁平均主义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大败笔，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生产力才能迅速发展，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因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充分表现了他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新思维，也是他能够解放思想、敢于突破传统禁区的重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解决了长期困惑束缚人们思想和手脚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例如，对市场经济问题上，传统观念上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邓小平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目的，市场与计划不过是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认识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从而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通过对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深刻把握，重新确认了经济建设是我党一切工作的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到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规范了它的地位，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高度规范了它的作用，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高度规范了它的意义，使之成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贯穿主线，我国经济建设的理论、目标、步骤、布局也是按照这条主线逻辑展开的。

二、经济发展思想的基本框架

印度苏地生在《邓小平——当代伟大的改革者》一文中指出“全世界还应该认识到，邓小平是当代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信誉是确定无疑的。他砸碎了空想主义的枷锁，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的模式，而这一模式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今天所需要的。”[①]所谓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兴综合性经济学科，主要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起飞的问题。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应当包括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并揭示其发展规律。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难题，并在实践中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为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构筑了基本框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是硬道理”论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邓小平的发展观理解为单一的经济现代化，但是，经济发展的确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核心。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发展自己，关键是经济发展”。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的发展，主要是指发展生产力，发展

[①]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8 页，301 页。

国民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反映了经济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论，首先是指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一大主题。纵观当今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论断，其中，发展问题（实质是全球的经济问题）是“核心问题”。发展作为一大“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应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它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但是，历史表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落后国家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自己。

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论，主要还是指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这是中国顺应当今世界潮流的时代要求，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深切总结，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总之，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①]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核心”、“大局”、“主要任务”、“根本任务”、“政治路线”，要“死扭住不放”，决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任务。

（二）发展模式论

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模式论的根本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联着东西对垒之世界政治格局、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纷纷独立以及美国围堵共产党势力的外交政策，美国一些社会科学家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提出了“现代化理论”（MedernizationTheories），即社会变迁理论或国家发展理论。尽管后来英美学者对“现代化”的概念理解充满歧义，但是，多数看法底层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的意指，即现代化是一种向着某种“现代的标准”迈进的变迁过程，而这种“现代的标准”大致是以近代西欧与北美之社会为蓝图的。这种理论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色彩。事实上，现代化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由于各国历史与国情、文化背景等因素的不同，现代化的模式必然各具特色，根本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英美学者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种种现代化模式并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以至 60 年代以来，这种理论开始遭到许多严厉的批判而逐渐破绽百出。此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曾流行过一种观念，认为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社会主义各国可以和必须效法的唯一楷模。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苏联实施并不成功，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尝试也失败了，在我国确立后，人们都曾普遍感到它带有根本性缺陷，需要进行改革。邓小平指出：“要求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照搬英、美、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同时，“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的确具有真知的见。

研究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中国发展“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4 页。

单”，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会在某些局部地方少数人更快地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长期摆脱不了贫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其原因还在于社会主义“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能够确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第二，要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开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第三，吸收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了我国发展的具体模式，在实践中已取得了巨大成就。

（三）发展战略论

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发展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战略措施等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发展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至关重要。邓小平的“发展战略论”，首先体现在他对中国发展战略目标步骤的设计上。这就是著名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80 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战略目标和步骤，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既宏伟远大，又切实可行。它把经济增长与国力增强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统一，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观。

邓小平的“发展战略论”还包括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的选择。他在强调产业部门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①]他又说：“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①]发展经济学中，影响产业部门发展次序选择的理论主要有均衡增长和非均衡增长两种理论，但两者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个对立统一的过程。邓小平关于我国产业部门协调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统一的观念颇有见地，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

（四）发展动力论

经济发展动力问题历来为发展经济学家所关注，但他们所强调的角度和侧重点各不相同。邓小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动力的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因素。他从生产力诸要素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真谛，认为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无穷无尽的，进而把发展科学和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一大战略重点。二是体制的改革。邓小平主张通过改革现有的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大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通过改革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三是对外开放。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大大加深了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进程，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大市场业已经形成，“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先进技术、资金和智力，利用国际资源和有利时机，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的捷径。我国历史经验教训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 页。

表明，闭关锁国是导致贫穷落后和发展缓慢的重要根源。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又一巨大的推动力量。

（五）发展机制论

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提高资源有效配置的效益。计划和市场都是国家管理经济、分配资源的手段，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中，资源配置效益是截然不同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立者亚当·斯密强调“自由放任”，认为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从而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利益。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重商主义和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则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用国家的力量来维护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当代经济发展理论中，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大都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主张经济发展计划化。6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只有通过市场和最小量活动的政策干预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解决资源配制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基本采用了这种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传统理论把计划和市场理解为经济制度，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邓小平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出发，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屏障，多次强调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创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邓小平这个理论指导下，我国大胆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来发展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六）经济发展规律论

波浪式发展是事物运行变化的普遍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经济发展规律也是如此。邓小平通过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的规律。

我国经济波浪式发展规律，首先表现在时间形式上。“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快搞几年，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若干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如日本仍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是这样。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要发展得快些，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稳稳，强调经济协调稳定发展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有问题。目前我国国内稳定，政策对头，国际时机对我国发展有利，正是大发展的良机，应当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我国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规律，表现在空间形式上也是波浪式递进的。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中，同步发展或同步富裕是不可能办到的。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目标，而地区、企业和个人的非均衡发展才是最终达到这个目标的有效途径。

（七）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效益统一论

邓小平十分重视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从国家独立、体现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和国际竞争的压力三个方面说明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性，提出“发展大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发展的就不要阻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

当然，邓小平强调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与我国过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追求盲目的高速度是有本质区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有条件的：一是发展速度必须切切实实，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二是“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三是发展速度与效益、质量相统一，“只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总之，经济发展速度须与效益、质量相统一。

（八）经济发展机遇论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是邓小平根据当今世界形势的转变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的一个伟大战略思想。从当今世界特征来说，一方面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局面是可能的，这一相对和平环境为我国发展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两极格局已经终结，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经济也出现了一体化发展趋势，各种矛盾存在着，机遇存在着，关键在于善于把握、利用这些矛盾和机遇，以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国内政局稳定，政策对头，人民拥护，也具备了加速发展的有利条件。邓小平指出“现在，我国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正是中国发展的机遇，他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要好好地干，埋头苦干，放开手脚干。

（九）经济发展环境论

所谓经济发展的环境是指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环境对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快慢成败，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国内政局稳定，二是国际和平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就国内环境来说，“稳定压倒一切”，关键是政局稳定。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要处理好改革、稳定、发展三者关系。就国际环境来说，我国迫切需要长久的国际和平局面以利于从事经济建设，利用国际资源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十）协调发展论

邓小平的协调发展论，首先是指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以保证我国经济持久、快速、健康地发展。但是，必须指出：“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能以片面的“协调发展”论来限制重点发展和一定条件下的加速发展。经济建设中过分地强调求稳就有问题了。

邓小平的协调发展论还表现在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发展三者关系上。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要从整体上把握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推进发展和社会稳定。

此外，邓小平的协调发展论还包括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进步，追求的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这是因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还是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

与协调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当然，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十分丰富，上述十个方面的内容并未涵括其所有内容，但基本架框大致如此。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从发展生产力这个总纲出发，初步勾勒出我国经济发展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观点富有创新，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必然联系，构成了较为严密的内在逻辑结构，业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虽然，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大多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与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及外宾的不同谈话中阐述的，但他的经济发展思想从整体上看是连贯的、系统的，忽视或否认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科学体系是不科学的、错误的。

三、经济发展思想的哲学基础

一个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正确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指导。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紧密相关，其中包括的哲学内核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生产力的主体地位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深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大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依靠发展生产力来实现。在他看来，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任务，这既是他独特的理论创见，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只讲到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其任务只是为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也是这么认为的，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则把发展经济的重心放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改变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本身要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了”。邓小平把经济发展的着重点放在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要求之上，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诸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发展科技和教育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之一，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形式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形式；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引进外国先进管理体制和先进科技、资金、人才等等。他还进一步提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指出“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它的“核心论”。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

邓小平反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是我党“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他认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否则就要栽跟头。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

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亲自创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正确，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正在于违背了他亲自倡导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不仅坚决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并把它运用于一系列重大决策之中。他认真分析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这个基本国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切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建设实际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就构成了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基础论”。

（三）解放思想，根据现在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

唯物辩证法历来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反对墨守成规、教条主义，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只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指南，并不是包医百病的良方。邓小平认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①]“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 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③]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南巡谈话，从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到“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一系列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方针政策，包括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发展环境等等，这就构成了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本体论”。

（四）“按辩证法办事”，处理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

辩证法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邓小平是运用辩证法处理各种重大问题的大师，体现了他高超的决策艺术，在中国经济建设问题上，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这种思想特色：“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产业部门协调发展与重点发展；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等，这些就构成了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协调论”。

总之，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它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中逐步形成发展，并且日趋成熟，已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威力，也必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入进一步得到丰富与完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83 页，191 页，29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83 页，191 页，291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83 页，191 页，291 页。

第四章
“发展是硬道理”论

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与中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也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关注的理论焦点。发展理论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理论，是从50年代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同国度、不同学科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阐述了“发展”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等问题，即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发展问题也占有突出的地位。邓小平以全球战略和历史发展眼光阐述了一种新的发展观，论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极大地推动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一、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狭义地说，发展理论主要研究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全面现代化，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转变。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整体性变迁过程，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系统发展过程。“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要使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追求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邓小平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①]1979年10月30日，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②]这段话明确地勾画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富强、民主和文明三位一体的内容。经济发展还是一个经济和政治体制变迁的过程，经济发展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这是因为政治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保证和必然提出的要求，另外，现代化离开精神文明也是不完善的，经济发展应同文化发展相结合。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归结为单一的经济现代化，但是，必须指出，发展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确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所谓“四个现代化”主要侧重于经济现代化，这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③]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④]“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⑤]作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9—250页，20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9—250页，20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第27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第276页。

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深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首先依靠发展生产力来实现。毫无疑问，经济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和核心，邓小平的发展观，反映了经济建设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占的主体地位。就经济发展来说，它不仅要有经济增长，而且要有结构优化，经济效益上升，是一种持续、高效和协调的经济发展。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首先体现在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上。在一般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是指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的总量或人均量的提高。邓小平在设计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把以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现代化的指标，符合国际通行的标准，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概念形态上，人们最初是作为同义词交替使用的，后来发展学者们愈来愈多地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一些基本区别。但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是经济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发展经济学家多马指出："现在对增长的关心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由于过迟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要是没有增长就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的国际冲突，使增长变成生存的条件了"。[①]

邓小平也十分注重我国的经济增长，多次强调，经济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②]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③]

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增长时，还十分注重把发展速度和提高效益结合起来，即既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又要注意提高经济效益。邓小平所强调的经济快速发展与我国以往经济生活中所强调的高速度是极不相同的：一是高速度是有条件的，要切合实际，"能发展就不要阻拦，有条件的地方尽可能搞快点"，[④]二是不能离开质量、效益讲高速度，"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⑤]三是坚持稳定、协调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⑥]。

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且还是带有结构性变化的经济增长。我国以往经济建设中存在着片面注重发展重工业、仅仅注意几个主要产品产量、忽视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弊端。邓小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在强调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前提下，提出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骨干项目，并把农业、交通和能源、科技与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具有远见卓识。

此外，经济发展还必须是包括大多数人参与和分享的经济增长。邓小平十分重视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总体上经济增长较慢，即使有些时期因连年高积累、高投资，经济增长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5 页。

[①] 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4 页，355 页，375 页，143 页，37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4 页，355 页，375 页，143 页，375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4 页，355 页，375 页，143 页，375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4 页，355 页，375 页，143 页，375 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4 页，355 页，375 页，143 页，375 页。

了，但是人民生活依然维持在一个低水平的基础上，这种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邓小平强调经济发展“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好起来”[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逐步得到满足”。在邓小平构想的经济发展战略中，不仅有“温饱”水平、“小康”水平、“比较富裕”水平等直接描述改善人民生活的概念，而且“三步走”目标还科学地勾勒出了人民生活从总体上逐步提高的程度。

二、发展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发展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课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区别在于发展内容上的阶段性差异和发展模式上的不同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南北二极对立的局面，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邓小平从全球战略眼光出发，深刻地指出：“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

50 年代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科学技术革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战后 40 至 50 年代是美国一家独霸，在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经济大发展期间，联邦德国与日本相继崛起，形成了三个中心鼎立之势。1965—1973 年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年代”，发达国家每年平均增长率是 4.7%。但是，进入 80 年代，速度明显减慢，平均增长速度为 3%。90 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经济衰退，从衰退持续时间、经济下降幅度和失业上升幅度看，许多国家的衰退是二战后或是 7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详见下表。

西方 7 国经济增长率（%）

国别＼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美国	2.5	0.8	— 0.2	2.1
日本	4.7	4.8	4.0	1.3
德国	3.4	5.1	1.0	2.0
法国	4.1	2.2	1.1	1.8
意大利	2.9	2.1	1.3	0.9
加拿大	2.3	— 0.5	— 1.7	0.9
英国	2.1	0.5	— 2.2	— 0.6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主组织 1993 年《世界经济展望》。

西方国家经济衰退问题一方面受到经济发展周期律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则受制于世界市场问题。占世界人口 3/4 的 130 多个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发展停滞，这一大片地区和人口不能形成发达和繁荣的市场，从根本制约了世界经济，包括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原苏联、东欧的经济严重困难，使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4 页。

国际资金的流入畏缩不前，对商品交换也缺乏购买力。而占世界人口 15.7%的发达国家里，市场状况已呈饱和状况，贸易摩擦及保护主义日益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发达国家的经济继续发展将不容乐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 60 年代以来，随着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纷纷独立，怎样改变占人数 4/5 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心问题。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形势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得十分不利，加上自身因素的限制，诸如天灾不断，战乱频繁，人口增长过快，科技教育及生产管理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等原因，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南北差距越拉越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慢得多。以 1965—1973 年这段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黄金时期”为例，发达国家平均增长率是 4.7%，发展中国家（石油输出国除外）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2%。80 年代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失去的十年”和“倒退的十年”，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从 1980 年的 12 倍扩大到 1990 年的 20 多倍。90 年代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除东亚继续一枝独秀外，总体上看，南北经济差距继续拉大。据联合国统计资料表明，占世界人口 15%的发达国家占有世界总收入的 70%，而占世界人口 77%的发展中国家只占有世界总收入的 20%，其中占世界人口 50%的穷国的收入为世界总收入的 5.6%。

纵观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格局，邓小平精辟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今世界的二大主题，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而核心是南北问题，也就是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面临着发展速度和再发展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则存在着严重的发展问题。发展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具有头等重大的事情，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处理好南北关系关联着全人类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不发展，发达国家还有什么市场？因此，邓小平认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尤为突出。建国以来，特别是 1957—1978 年 20 余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80 年代以来，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邓小平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大慢，不抓住时机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是一种“友好的压力”。另外，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压力严重地存在着，“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国际新形势给我国带来极大的压力与挑战，同时，也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已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只有经济发展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就会大大增强，就能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

---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81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6 页。

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不能没有中国。

三、发展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70 年代末以来世界潮流和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邓小平把中国前途与世界潮流联系起来，强调了发展问题对当今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发展是当今中国的主题，也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一条主线。他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②]为此，他反复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自己的发展”，“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总之，“我们所做的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他还明确地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

邓小平把发展问题提到无以复加的战略高度，“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①]

首先，加快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曾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邓小平也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快，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未充分体现出来，国内有一些人不大相信社会主义。对这些人要加强说服教育，但最终说服他们还要靠我们的发展。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我国人民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

其次，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大问题。

当今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竞争。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近代的历史和当今世界的现实都清楚表明，经济落后就会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落后，备受列强欺凌，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灾难史。富国强兵成了历代先进中国志士仁人为之毕生奋斗的崇高理想。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正表现出这种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先进国家民族之林，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更有效地顶住霸权主义的压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就必须把经济发展起来，中国之称为“世界一极”，现在主要还是因为在政治上是个大国，而不是经济大国，对此，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因此，他较早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发展中国经济的问题之上。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只有“国家的力量真正强大起来了，中国在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4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 页。

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不同了……所以要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好好地干，一心一意地干”。[1]他在谈到 80 年代三件大事时说，核心是经济建设。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是相互关联的。邓小平指出：“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2]毕竟，国防建设受制于经济实力。“弱国无外交”，这是千年古训。就香港问题而言，在近代中国，英国殖民者凭借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三个不平等条约，即 1840 年的《中英南京条约》、1860 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及 1898 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占了我国的领土香港。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曾二次与英国交涉，希图收回香港主权，但都未能成功。1982 年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开始时，撒切尔夫人还带着“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的想法来北京会见邓小平。但是邓小平坦然地宣布了三条原则：（1）香港主权问题不容讨论；（2）一二年内谈判解决香港问题；（3）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结果谈判终于按中国的原则要求达成了协议。1984 年 10 月 22 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谈到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时这样说道：“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1]

第三，经济发展是解决国内各种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仓禀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固有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历来认为，虽然不能说物质文明提高了，精神文明会自然而然地随之提高，但是，精神文明必然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邓小平对此认识十分明确：“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②“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③

总之，当代中国面临着种种复杂而严重的问题，诸如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问题，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祖国统一，增强综合国力、加强国防问题，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问题，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数量问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发展经济，“当然，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搞好”。④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就能改善，精神面貌就会改观，社会就会稳定，我国在国际上就能站得住脚，并能扩大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影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得到体现。事实证明，“不发展经济，不改

---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9 页，99—100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9 页，99—100 页。

[1] ②③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5 页，89 页，370 页。

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④]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自己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稳定局面；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脐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都离不开发展”。

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展是个广泛的社会综合范畴，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核心。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作了许多独特的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一，把注重发展生产力提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高度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曾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列宁也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②]可以说，发展生产力，这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全部科学体系和全部发展历史的基本原则。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由于理论准备不足，更由于革命救亡的需要，他们关注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对发展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认识不足，如李大钊于 1919 年 5 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时说“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毛泽东在 1941 年的一次讲话中也谈到，记得我在 1920 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的把握不尽准确，强调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也产生了不利影响。比如，国民革命后期，“那时候有同我们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我们也在那里举行罢工，提出的经济要求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所能负担的程度，结果市场调敝了，损害了革命政权的经济基础”。[①]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与此也有一定渊源关系。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的把握比较准确。早在 50 年代初，他就提出：“共产党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中国 20 多年的建设实践，取得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更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40—241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363 页。

[②] 《列宁全年》第二卷，第 6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343 页。

发展生产力”。[②]邓小平不仅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基本原则，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这一基本原则去观察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根本性实践活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和结论，成为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二，把发展生产力提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众所周知，马克思和列宁在社会主义实现条件问题上曾根据各自的历史条件作出了不同的判断。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形态将产生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上。但是，迄今为止，这种发达的社会主义还未能作为现实形态出现。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落后国家首先取胜的新论断。这种论断在俄国、中国等国家变成了现实。但是，落后国家如不解决在革命后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很难巩固和完善。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雪崩”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他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特征，这是前人所不曾论述或不曾考虑的。他还特别驳斥了林彪、“四人帮”所主张的普遍贫困的假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离开发展生产力来谈论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

第三，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提到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大批“唯生产力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总结了这个沉痛教训，不仅多次指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把它提高到政治路线高度。1979 年 7 月，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0 年 2 月，他又指出，现阶段政治路线，“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1984 年 6 月，他又强调：“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1989 年国内发生政治风波，随后国际上又发生苏联、东欧剧变，国内有些人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发生了怀疑，邓小平又及时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第四，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对生产力标准问题认识并不明确，“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大批“唯生产力论”，用政治标准代替一切，显然是错误的。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2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79 页。

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思想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62 年，他针对农村承包责任制、包田到户的问题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提出了著名的“猫论”。这标志着他的生产力标准思想的萌芽。1978 年 9 月，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又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②]正式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思想，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社会上产生了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有的人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典范加以推行，把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反对，如市场经济问题即是一例，致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充分突出了生产力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深化，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改革开放的成果创造了条件。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28 页。

第五章
经济发展战略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如何规划运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阶段、重点、对策都作了系统的科学论述，形成了他的经济发展战略论。经济发展战略是对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谋划。邓小平的这些谋划为我国 70 年的经济发展勾画了宏伟蓝图，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十几年来，它不仅指导我国的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大飞跃，而且将照耀着我国到下一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全过程。

一、实事求是地制定我国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

确定经济发展要达到的目标，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它规定一定时期经济发展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和要求。经济发展战略阶段的安排、重点的选择、对策的采取，都是为实现这些基本目标和要求服务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重点转移时，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基本奋斗目标的。这个基本目标，原本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来的。早在 1964 年 9 月，周恩来在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国庆招待会的讲话稿中就提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同年 12 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向全国人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提出的实现的时间期限，从初稿的“在较短的时期内”，改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这反映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全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已经明确，但实现的时间期限的把握尚在思考之中。这个奋斗目标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可惜还来不及认真贯彻实施，就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1975 年 1 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上又重申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这时提出的要求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叶剑英在 1979 年庆祝国庆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把这称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我们留下的“政治遗嘱”，强调它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百折不挠地加以实现的奋斗目标”。但是，如何来实现这一“政治遗嘱”呢？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中思考的问题。1979 年 1 月 17 日，邓小平在谈到工作重点转移时就提出：“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 1958 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1979 年 3 月，邓小平就提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概念。他首先对“中国情况”（国情）的两个特点：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特别强调：由于底子太薄，

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些都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长期起制约作用的因素，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邓小平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当时陈云也提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20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①]李先念也指出：“我们的国家穷，搞现代化需要大量资金，人民生活又要改善，这就是矛盾。搞现代化，用人少，而我们有大量劳动力需要就业，这又是矛盾。我们只能在这样的矛盾中来搞四化，这就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规划建设蓝图时必须考虑的基本出发点”。[②]叶剑英也提出：“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③]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关系整个现代化建设备方面的大题目，具有丰富而广泛的内涵，而邓小平首先集中关心的重点是从我国的条件出发来研究，到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标准问题。当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50美元左右，居世界后列，科学技术水平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这样大的历史差距，又面临着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等因素的制约，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特别是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是不可能的。当时邓小平和许多中央领导都指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因此对发展目标不可能定得过高，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也不可能太短。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奋斗目标提出了调整的意见。他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我们到本世纪末时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呢？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就能花多一点力量来援助第三世界的穷国。”他主张“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①]这段话反映出邓小平在研究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时，首先对到本世纪未能够实现的现代化目标进行深入的思考，结论是只能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的低目标。邓小平把它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不可能实现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标准和超赶的目标。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客人的提问时，正式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要达到的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要在本世纪来实现小康水平。1980年1月，他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著名讲话中，向全党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战略目标。对

[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8—39页。

[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75页。

[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80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4—195页。

于怎样来实现小康目标？邓小平提出“现在需要总结经验，搞快一点、好一点，需要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需要制订长远规划。这些都是大事，我们不能急躁，也不能耽误时间。”[②]他把制订实现小康目标的长远规划这件“大事”放在与作历史问题决议同样重要的地位。当时，他找来中央负责经济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有关同志，对他们说，当前要抓好两件事：一是作历史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二是考虑制订长远的发展规划。正是根据他的意见，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本世纪末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十二大报告以到本世纪末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中心，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的最完整系统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提出后，邓小平一面关心和狠抓这个战略目标的落实和实现，另一方面又在积极思考我国经济在 21 世纪进一步发展的目标。他在 1980 年 12 月 25 日《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这篇讲话中就谈到经过 20 年的时间，我国经济发展达到小康水平以后，“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到 1984 年 3 月，邓小平说：“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在肯定翻两番有把握的基础上，邓小平会见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指出：同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几年的发展仅仅是开始。达到小康水平以后，我们还要在下世纪 30 年到 50 年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后来他在多次谈话中反复讲到这一设想。1986 年 6 月 18 日，他在《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的谈话中又把下一个世纪的发展目标具体化。他说“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再花 30 年到 50 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①]1987 年 4 月 30 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的谈话进一步把发展目标具体化并完整地概括提出我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 80 年代翻一番。以 1980 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 250 美元，翻一番达到 500 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 1000 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 30 年到 50 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 4000 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①]这是对我国 70 年时间内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完整表述，标志着邓小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成熟。正如一个外国评论家指出的，中国提出 70 年的发展战略，这样长期的目标，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把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正式的战略任务规定下来。

邓小平在讲到我国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多次讲到“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但又说“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说它是雄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47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62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6 页。

心壮志，是因为达到这样的目标同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是低水平的，甚至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对我国这样原有基础十分薄弱，科学技术落后，而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是需要经过全国人民的长期艰苦奋斗才能实现的。但是，这个目标的提出又是“实事求是”的。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的提出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是在深入研究我国国情特点的基础上，科学地估量我国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实际程度，而对原定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进行实事求是地调整，降低目标，规定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第三步的战略目标，是在原定的本世纪末目标经过五年实践结果检验，证明能够实现以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来的，而不是随便说的。第三，它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特别是毛泽东在世时所没有的国际条件来确定的战略目标。“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他说：“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了，国际交流发展了，我们的经济一定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要拿国际水平的尺度来衡量。”[②]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正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用国际水平尺度衡量的发展程度。

二、会面科学地规划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途径

在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邓小平不仅重视实事求是地确定发展目标，而且十分注意全面科学地规划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他在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说：“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①]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目标，它的实施，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邓小平提出的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是全面的，它们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实现战略目标的对策体系。

1.他从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一宏观层次上，提出实现战略目标，要有新的政策，那就是要实行改革开放和国内外要有和平稳定的环境。首先他把实行改革开放作为实现战略目标最主要最根本的措施。他说：“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②]1984 年 10 月，他在《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的谈话中，把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称为“政治目标”，而把对内搞活经济、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作为实现目标的“根本政策”，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没有这个政策是不可能的”。[③]他还把坚持改革开放的长期性与实现战略目标的长期性统一起来认识。他说：“对内搞活经济，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 50 年到 70 年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 20 年，还有第二步，需要 30 年到 50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70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5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7 页。

[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66 页。

年，恐怕是要 50 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 50 年至 70 年。”[1]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是保证战略目标实现的根本手段，必须贯彻于实施战略目标的全过程。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以理顺各种经济关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邓小平认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关系理顺了，到本世纪翻两番就有把握。”“搞得好，有可能为今后 50 年至 70 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因此，他强调“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2]其次，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3]为此，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内外政策来争取和维护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实现战略目标创造条件。

2.他从经济发展系统内部结构安排的层次上，提出了一系列结构对策。首先，他提出要做好前后发展阶段的安排和衔接。他指出：“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4]他强调：“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的关键，是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后来，在谈到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时，又说：“关键是本世纪内的最后十年，要为下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打下基础，创造比较好的条件和环境。”[5]

其次，他提出要保证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实现，在产业结构的安排上必须有重点。他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1]“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2]

第三，他认为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要重视地区布局，让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得快一点。他谈到“中国发展经济从何着手”？“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3]为此，他主张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区，以加快经济发展并带动内陆地区。90 年代以来，又进一步抓上海、开放和开发浦东新区，实施沿长江开放、沿边和内陆省会和自治区首府城市的对外开放，这不仅将有力地促进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还将为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施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3.为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邓小平从具体操作实施层次上，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第一，要搞好规划，心中有数。党的十二大确定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后，邓小平首先关心的是这个目标“靠不靠得住”？他在十二大召开不

---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79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6 页，360 页，54 页，267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6 页，360 页，54 页，267 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6 页，360 页，54 页，267 页。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6 页，360 页，54 页，267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2 页。

久，就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提出“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他在 1993 年 2 月视察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后，又进一步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要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决各自突出的问题，帮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具体规划能够落到实处。”同时，他又根据我们国家大，不同地区发展条件不同的特点，强调制定具体规划要区别对待。他举日本经济发展为例，日本翻两番首先是在城市搞起来的，中国要翻两番，条件好的大城市起码应该翻三番。“落后的地区，如宁夏、青海、甘肃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数。”

第二，要适应条件变化，掌握好发展速度。邓小平认为，要 20 年实现翻两番，时间是很紧迫的，必须抓紧，必须保持一定发展速度。但是，在具体发展速度的把握上，他是注意根据不同的条件提出不同要求的。在总体上，他提出：翻两番目标“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高速度发展。”在 1979 年调整时期，对 1980 至 1981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安排，为了使调整过程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邓小平主张增长 6%也可以。对“七五”计划的安排，邓小平肯定：“7%的速度并不低。”1984—1988 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较快的发展速度，第一步战略目标提前完成。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国在 1989 年提出治理整顿。邓小平认为治理整顿是必要的，但是要注意经济不能滑坡。他提出“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1990 年 12 月以后，他认为：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计的要好，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后来进一步提出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力争使经济发展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邓小平在不同时期对发展速度的不同考虑，都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条件，基本出发点是如何更有利于实现发展战略目标。他说：“经济能不能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

第三，要搞点骨干项目，做好前期工作。在本世纪末的发展战略目标确定之后，邓小平对国家计委负责人说：“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他说：“你们提出一批勘测设计项目，准备提前做好建设的前期工作，这件事要认真落实。要列出进度表，什么时间勘探清楚，什么时间拿出设计，由专人负责包干。煤、电、油这些能源项目，还有交通项目，前期工作要抓紧，晚了不行。”他认为：“利用外资，请外国专家，也得把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好。”农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基础。所以，邓小平认为“前期工作，也包括发展农业。”[①]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层次的前期工作，一是微观层次的具体项目的前期工作，如科学技术研究、技术经济论证、勘察设计等；一是宏观层次的前期工作，即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准备等，实际上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它们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前期准备，邓小平强调前期工作体现了“不打无准备之战”的战术思想。他特别从宏观上重视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为实现战略目标打好基础这一关键环节。

第四，要抓好培养和使用人才。他强调事在人为，关键在人。为了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必须把人才培养使用工作做好，“我看最难的是这一条。”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7 页。

他认为：“要实现 20 年翻两番的目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解决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20 年规划能否实现，关键就在这里。”[②] 他在 1983 年视察江苏后，谈到江苏经济高速发展经验时，肯定他们“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江苏多年来是比较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对知识分子使用比较得当。”他强调“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我说的是包括职工教育在内的智力开发，要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所以主张“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同时“要利用外国智力”，“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为了实现战略目标，邓小平对解决人才问题要求之迫切。

三、邓小年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略家，他在指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战略研究。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革命战争战略研究的著名论著，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指导。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为过渡时期制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战略也是成功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积极探索，试图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但由于在探索中发生曲折，所以毛泽东并未形成一套科学地系统地贯彻始终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他提出的一些战略如“大跃进”战略，抓“文化大革命”来促生产的战略，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曾经正确地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经济发展战略也是研究经济发展全局的规律的学问，经济发展战略是否正确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性规律是否正确认识的体现，是经济发展思想是否成熟的标志。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①]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又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作为直接奋斗目标，提出了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任务。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但是对它大大地加以发展和创新了。主要体现在：

1.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来确定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任何一个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都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认识国情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

[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8 页，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8 页。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982 页。

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①]正是以这一基本出发点为依据，我们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过渡时期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使我国顺利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从1957年9、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开始，我国在经济建设上的“左”的思想抬头，以至于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当时，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发展，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任务顺利完成的条件下，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的任务看得过分简单容易，虽然也承认中国是“一穷二白”，但不是如实地把它看成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而是浪漫主义地得出“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结论。对“大跃进”具有典型性和深刻影响的全民大办钢铁，就是在“苏联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的影响下，提出中国用15年左右在钢产量上赶上英国的目标，而且在这种“超赶”意识下把“超赶”时间一再缩短：由15年逐步缩短为10年，7年直到2、3年，甚至认为两年也是可能的。这样的奋斗目标，完全是脱离现实的主观空想，必然遭到失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翻两番的目标和后来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是在总结大跃进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等基本特点以及新的国际条件，按照使我国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好一点的要求而提出来的。它体现了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一点，又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因此，它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遗愿时，“把标准放低一点”，改为“中国式的现代化”，达到“小康水平”。在发展的指标上，抛弃了“大跃进”那种单纯用某种产品（如钢）赶超“英国”的办法，（中国是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只用某种工业产品产量去和某一个人口只有我们几十分之一的发达国家去比“超赶”，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是采用国际通用的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指标，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发展目标的设计上，而重要的在于为何加快发展，以实现战略目标的思路、方法上。

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批评“反冒进”，主张搞“大跃进”。邓小平也主张“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上台阶式”的发展。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争取在国际上摆脱被动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是完全必要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跃进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上，要害在于用什么思路、方法才能实现“跃进式”的增长。毛泽东主张的“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们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①]毛泽东曾经讲过，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多、快、

[①]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20页。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21页。

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也是一条路线。在他看来，坚持群众路线在经济建设中的运用就是要大搞群众运动，像组织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那样，通过亿万群众的鼓足干劲，轰轰烈烈地进行大会战，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所以，“大跃进”时期几千万人上山采矿大炼钢铁，几千万人上山兴修水利，场面的确轰轰烈烈，但都未达到“多快好省”的目的，而是带来巨大的灾难。这种“跃进式”的发展思路，实际上是在传统的命令型的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从政治需要出发定指标，通过行政命令来层层落实“跃进”指标，运用传统的工作方法：通过政治动员和伦理保证来激发群众积极性，大搞群众运动去完成指令性的指标。

邓小平为实现战略目标，主张抓住时机加快发展，争取经济发展上台阶的思路和方法，与毛泽东的不同，主要在于它不是在计划经济框架范围内而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指导思想，主要不是凭借过去的传统经验，而主要是面向现时代新的条件和环境来进行设计的。这主要体现在：它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依托于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而不是主要靠人力的投入；它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并不是看成一个封闭体系，而是根据现代经济国际化的特点，把它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主张对内对外开放，特别是与国际市场相衔接来促进目标的实现。

3.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还表现在他把不系统不完整的间断的战略思想发展为完整系统的始终坚持到底的战略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在 1954 年 9 月第一届人大、1964 年 12 月第三届人大、1975 年 1 月第四届人大的三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除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外，最初提出交通运输现代化，后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但是在贯彻执行不太长时间以后，由于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未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一再 81 为“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所冲击和破坏，所以，这个战略目标未得到坚持贯彻，而是隔几年之后又重新提出来。特别应该指出，我们党虽有重视“战略”问题研究的传统，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从未使用过“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更未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过系统研究。因此，尽管我们提出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但是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阶段安排、重点选择、力量部署、政策措施并未进行过自觉的系统的研究。当然，我们过去未使用“经济发展战略”概念，并不等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研究过战略性问题。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制定的路线和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的总和之中。正如毛泽东谈到政策问题一样：“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①]应当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我国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和对经济发展战略缺乏自觉地系统地研究，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执行的战略，往往具有一定盲目性，甚至执行错误

[①]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1181 页。

的战略。一般的研究者都把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前的经济发展战略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战略；1958—1960 年“大跃进”时期的“以钢为纲，全面大跃进”战略；1961—1965 年调整时期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战备”为中心，三线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杂乱无章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四个战略阶段中，除第一阶段是自觉认识我国过渡时期特点而制定的正确战略之外，“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战略是脱离我国国情包含严重失误的战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调整战略是正确的，但它是为克服“大跃进”战略的严重破坏而被迫采取的战略。如果从我国 50、60、70 年代已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为主线来考察，实际上我国缺乏一个系统的前后一贯的战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我国本世纪末并延伸到下一世纪中的战略目标。我国经济决策部门和经济理论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系统的研究，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实际上是对这一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概括。它形成了包括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部署、战略方针、战略重点、战略对策构成的系统的战略思想体系。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十二大”提出、“十三大”进一步完善概括为“三步走”的战略以后，对于如何坚持和实现这一战略，始终是邓小平关注的中心问题。邓小平在 1984 年 3 月说：“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1990 年 3 月又说：“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我国经历 1986 年底和 1987 年初处理学生闹事、1988 年 9 月开始治理整顿、1989 年 6 月政治风波等每次风浪以后，都坚定不移地主张要坚持按照我们原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继续前进。在 1989 年 9 月 4 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商谈他的退休时间和方式的谈话中，仍然关注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他说：“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要搞几个大项目，表示我们的信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①]1992 年初的南巡重要谈话，邓小平为实现战略目标又提出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力争经济发展上新台阶，并嘱咐大家为实现下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而埋头苦干。他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紧要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呀！”邓小平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制订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坚持“一个中心”的具体体现，我们应该坚持到下一个世纪中叶，不能动摇。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21 页。

第六章
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论

目前，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社会发展动力来自改革。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面。辩证唯物主义历来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与它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因素。从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考察，任何社会发展动力来自内部更新和外部作用两大方面。现代社会更是个开放的系统，外部因素对社会发展推动作用日益增强。发展经济学也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运动是在内忧外患的压力和挑战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这些国家中，现代化运动通常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内在发展和传播发展的统一。邓小平每每谈到中国发展问题也总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联系，诸如："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改革"，"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如果放弃了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邓小平不仅总把中国发展与改革开放相联系，有时还干脆把改革称作开放（即"对内开放"），把开放称作改革。他指出："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①]可见，在邓小平的中国社会发展动力论中，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者缺一不行。

一、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

唯物史观历来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是首次在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断，是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然而，毛泽东虽然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却并没有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作具体深入的研究。

1979 年 1 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到："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论断的正确性。但是，他又指出："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①]邓小平从发展生产力着眼，通过总结汲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他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6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82 页。

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②]他还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一系列重要命题，令人耳目一新。邓小平的改革观，创造性地运用、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具有许多理论创新。

邓小平提出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下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发展动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只讲到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其任务只是为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也是这么认为的。邓小平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具体表现在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提出了通过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即“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认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①]“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②]

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它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说的那种“革命”，而是具有新的时代内容的特殊的社会革命，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它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我们进行的这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是，不能把原有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当作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过去的改革是在原有体制框架和目标模式内作细枝末节的修补，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是要对原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作根本变革。

二、改革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和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其中主要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照搬苏联的体制模式。这种经济体制在苏联早期工业化建设和我国一五计划时期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它带有根本性缺陷，不仅在苏联没有取得成功，在东欧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也失败了。这种经济体制在我国全面建立后，毛泽东也深深感到它带有的一些弊端，并作了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和尝试，但由于习惯上把计划经济体制当作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此，始终未能突破苏联式体制模式的框框。对此，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①]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社会从 1957—1978 年 20 余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7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0 页，13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0 页，13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7 页，138 页。

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弊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模式，大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几乎把国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以外的经济成分扫除得干干净净，不能适应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发展又不平衡的状况；经济管理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地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经济运行机制计划过多，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发展生产力，这种经济体制必须改革。邓小平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①]

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最早可追溯到 1975 年他提出的全面整顿的主张。对此他在 1987 年 10 月 13 日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的谈话中说过：“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②]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邓小平全面整顿的主张在贯彻过程中被迫中断。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致词中说，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③]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改革这个概念，同年 12 月,邓小平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改革迫切性和重要性：“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空谈往往淹役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上述论断正式确定了改革的方针，从此开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1979 年至 1982 年，改革重点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79 年春，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农民率先搞起大包干责任制。此后，安徽、四川及其他省、市、自治区也纷纷实行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势不可当。到 1980 年 3 月，全国实行联产计酬的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核算单位占全国总数的 55.7%，但农业责任制的发展也遭遇了重重阻力。在这关键时刻，1980 年 5 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7 页，138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0 页，25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0 页，25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36 页，150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36 页，150 页。

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发展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此后，随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的下达，农业生产责任制转入大发展阶段，到 1981 年底，全国已有 97.8%的农村生产队实行了责任制，其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占 74%，从而取得了我国农业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匈牙利学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评论道：“农民生产和农户的平均收入开始迅速增长，到 1984 年、1985 年这两项实际上都翻了一番……1984 年中国总共收获了 4 亿吨粮食，比 1958 年翻了一番，比 1975 年增产约 50%”。[2]美国学者莫里斯·麦斯纳也指出：“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经济结果都是十分显著的。从 1978 年以后，农业总产值以每年平均 9%的速度递增。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也明显提高。在 5 年的时间里，农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许多外国访问者都报道说，农村大多数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都明显提高了。直接的证明就是农民们到处都在盖新房，购买的消费品大量增加，食物也有了显著的改善”，“不管农业改革的最终路线结果如何，毫无疑问，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邓小平时代将是一个最成功地创造了经济发展纪录的时代”。[3]据统计，到 1984 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 4.0730 亿吨，比 1979 年的 3.0477 亿吨增加了 1.0253 亿吨，年平均增长 1.078 万吨；棉花产量达到 625 万吨，比 1978 年的 216 万吨增加了 409 万吨，年平均增长 68 万吨；油料产量达到 1191 万吨，比 1978 年的 521 万吨增加 670 万吨，年平均增长 111 万吨。其间，种植业产值由 988.6 亿元增长到 1996.7 亿元，翻了一番；农业总产值由 1458.8 亿元增长到 3390.7 亿元，增长近 1.4 倍；农民人均收入也由 133。6 元增长到 355.33 元，增长 1.5 倍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农业生产的奇迹，基本上不是在依靠对农业的大规模投资和在农业经济中引进先进生产技术的情况下取得的。如从农村改革之日起，农业投入的资金在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向，农业投资的绝对额也逐年减少，1979 年为 57.91 亿元，1985 年降为 35.91 亿元，这种情况是造成此后我国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中国“能否在没有对农业的大规模投资和在农业中引进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在未来一直保持 80 年代初所达到的农业增长速度，这一点还是很成问题的”。[1]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重视。那么，1979—1984 年我国农业生产高速增长的根源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主要取决于联产承包制这种崭新的经济体制。1984 年 10 月，邓小平在几次谈话中明确肯定：“这几年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2]“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了变化，到现在快六年了。这六年来发生的变化，确实比预料的要好。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

---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5 页。

[2] （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7 页。

[3]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6—587 页。

[1]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6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78 页，81 页。

就发生了显著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农民自发创造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其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三分天下有其一，同时，也解决了一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对此，邓小平十分高兴，对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槁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①]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农业高速增长，不仅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也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开始运用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当然，邓小平也认识到：“农村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可以说，城市改革意味着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尝试，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城市改革是一项长期的战略问题，要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在农村改革大好形势的推动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 1978 年至 1981 年开始试点，属于探索性的，取得了一定成绩和经验。城市经济体制的目标是解决原有体制存在的经济决策权过分集中、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吃“大锅饭”等弊端。此后，城市改革继续深入开展，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理论上突破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并系统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问题。邓小平对这个决议评价很高，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确很好”。[①]《决定》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展开的新阶段。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也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不断深化，逐渐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他多次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 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使中国改革大潮再度涌起。在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指导下，党的十四大强调：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蕴藏在广大人民中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调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对此，邓小平高兴他说：中国真正活起来了。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生产力和经济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阻碍作用也日益显露出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是因为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经济体制改革势必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78 页，81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8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3 页。

配套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文化观念的更新，否则，现代化事业势必将遭受历史性的挫折。我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破产就是极好的例证。

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戴维·w·张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家和决策者很少有可能干预生产和普通公民之间的竞争，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缩小经济上的不平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和经济紧密相连，成为一个整体。政治及来源于政治舞台的政策左右着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充分重视经济规律"。[②]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离开政治。邓小平对西方学说中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观点不以为然，他不仅关注到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而且还注意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历来主张"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①]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已被提到日程上来。

我国原来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搬来的，它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关联，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政府统制经济体制，由政府包揽、统管一切经济事务，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国家和社会合一，政府统管企业，企业是政府的附庸，政府实行"父爱式"管理，企业仰赖着政府的等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小生产封闭模式的一种放大复制。这种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弊端，具体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手续繁杂，效率低下。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着人民群众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的发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此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转变政府职能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邓小平对我国原来的政治体制的弊端有深刻体察，早在 1980 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没有具体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明显。1986 年，邓小平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严重性："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②]"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①]"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②]

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和表现，更是发展生产力的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

[②] （美）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喻晓译），法律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1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6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60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64 页，17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64 页，176 页。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为此，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的三条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他还深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与权力下放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还是政治民主问题，包括民主与法制。当然，民主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所以，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③]必须在保障政局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

三、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希望

国际经济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国在经济关系上的互相倚赖亦随之增加。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利用大工业为武器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如果说当时世界市场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那么，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随着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而兴起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国际化进程。对国际经济关系起宏观协调作用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出现加深了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程度。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大市场已经形成，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的格局下，世界各国的各种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方面的合作日益加深。这一切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②]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继续发展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脱离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③]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在较短时期内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对外开放，利用国际资源发展自己就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从国际经验着眼，把对外开放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看作是经济加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动力。有鉴于此，“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④]成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重要依据。正如美国学者戴维·W，张所指出的：“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变的关键，西方的科学技术、投资和管理是中国经济发展战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2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4—25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4 页，117 页，7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4 页，117 页，78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4 页，117 页，78 页。

略所需要的一部分，这就是邓小平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关键所在”。[1]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还基于对我国历史经验的深刻分析之上。鸦片战争前，我国封建统治者主动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2]这种闭关锁国政策阻塞了中外交流，导致了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各方面全面落后的局面，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宰割的百年屈辱。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被迫开放”，尽管“被迫开放”也比“主动封闭”强，但是，它是一种丧失独立主权条件下的“对外开放”，使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国仍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状态。造成这种局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但在当时国际冷战格局下，中国只能对苏联、东欧开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则实行封锁。对此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3]后来，由于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中苏关系全面恶化，我国与东欧的关系也很紧张，几乎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搞建设。当然，造成这种局面也有我们自己的主观原因，自己孤立自己，“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4]这是 1957 年后 20 年时间我国经济处于停滞、缓慢发展的另一个重大根源。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深刻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1]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的两大主流。中外关系也出现巨大转机，中美关系坚冰被打破，我国与西欧、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恢复了正常关系，中苏关系开始缓和，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与第三世界和地区的关系也得到了加强。这一切为我国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积极倡导对外开放政策，他不仅反复强调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指出不足之处是“开放得还不够”，“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2]1989 年发生政治风波，我国又一度处于不利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对对外开放政策毫不动摇，提醒全党：“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封闭时代”。[3]

邓小平不但积极倡导对外开放政策，而且还亲自对对外开放的策略和步骤做了精心部署。首先是兴办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邓

---

[1] （美）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喻晓译），法律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1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0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27 页，64 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27 页，64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4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02 页，299 页，239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02 页，299 页，239 页。

小平同意了：“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④]中央没有钱给他们，只提供适应对外开放需要的特殊政策。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8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当时兴办这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1984 年，邓小平亲自考察深圳、珠海、厦门特区。他在经济特区看到一片兴旺发达景象，视察期间写了一些题词，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又提议“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用下就是很大的胜利”。[①]根据邓小平的设想，1984 年 4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的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京、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14 个港口工业城市，同时，批准除北海和温州以外的其他 12 个有条件的沿海开放城市，参照经济特区的某些做法，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后，沿海经济开放区不断扩大，1988 年 4 月举办海南经济特区，1990 年，上海浦东新区又被列为开发、开放的重点。至此，已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在内的总共 293 个市县，2.8 亿人口，42.6 万平方公里面积的沿海开放地带。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中央又作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对外开放，陆续开放沿江沿边和内陆中心城市，基本上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梯次发展的全方面、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

事实证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成效，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重大推进作用。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

四、坚持全面的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邓小平所说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他提出“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第二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第三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邓小平所说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开放。他主张“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里所说的“一切文明成果”，既包括物质文明成果，也包括精神文明成果。

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国际资源以加快发展我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这是任何国家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途径，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都与外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02 页，299 页，239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2 页。

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额剧增，1992 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达 1656 亿美元，比 1978 年增长了 6 倍，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0%多，1993 年的对外贸易总额达 1957 亿美元，为 1978 年的 9.5 倍，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 40%左右。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从 1978 年第 32 位上升到 1992 年的第 8 位。中外经贸关系的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推动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带动了国内经济的起飞，还获得了可观的外汇，弥补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资金不足。

第二，引起外资。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引进外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它对我国经济发展意义十分重大。1980 年 4 月，邓小平破除我国过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陈旧观念，率先向全世界宣布：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1984 年 6 月，他又说：“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在邓小平引进外资思想指导下，我国利用外资数额不断增加，至 1992 年底，全国已建立三资企业 9 万多家，当年外商实际投资额超过 110 亿美元。截至 1995 年，我国累计引进外资总额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针对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调，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①]我们要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吸取更多的外资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

第三，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尤其重视。60 年代前期我国与国际上的科学技术有差距，但不很大，但此后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却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差距就拉大了。因此，邓小平提出“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②]这样，就能大大缩短我国与国际科技差距，成为我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捷径。先进的管理经验对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是重大的，邓小平把管理也视为一种科学技术，“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③]从管理求发展，向管理要效率，这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一大趋势。

第四，引进外国智力。早在 1977 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④]1983 年 7 月，邓小平又针对“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的问题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①]在邓小平引进外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3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50 页，57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50 页，57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2 页。

智力思想的指导下，1985 年，我国成立了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当年该组织就为国内工商企业聘请了 1100 多名外国专家，1986 年又聘请 1600 多名。名省、市、自治区也陆续成立了引进外国智力的机构。我国在这方面可供开挖的潜力还很大，特别是创造条件，争取中国留学生、海外华裔人才回来报效祖国，这更是一个战略性措施。

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80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行列。整个 80 年代，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速度为 2.9%，西方发达国家平均增长速度为 3%，发展中国家多数情况不好，在拉美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非洲也可称为“悲惨的十年”，唯有东亚经济一枝独秀。中国在 80 年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9%。90 年代初，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19 驯年为 1.6%，1991 年为 0.2%，1992 年为 0.6%，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情况也不太好，1990 年为 2.3%，1991 年为 0.7%，1992 年为 4。9%。原苏联、东欧地区，90 年代以来头 3 年，俄罗斯以 20%、15%、20%的速度下降，东欧则以 10%、14%，10%的速度下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 90 年代的头二年因调整而略低些，分别为 4.3%、7.8%，1992 年又高达 12.8%，1993 年达到 13%以上。较为熟悉中国事务的尼克松在他的遗著《超越和平》中不无感慨地写道：“最近 10 年，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并可能在下个世纪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超级大国。在过去的 45 年里，它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发展迅速的经济巨人。现在，它的增长率是 14%；这一比例高于日本、美国或印度，其中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出口额的 30%，1993 年 1 月至 9 月，中国的外国投资增长了 171%，反映了人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当然，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个不争事实。

第七章
市场经济促进发展论

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面临一个基本经济问题：即如何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源（如劳动、资本、土地）于各种不同的用途（如消费品生产、资本品生产、劳务），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福利（如增加国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提高生活质量等）。这里就有一个选择资源配置方式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依靠计划经济来配置资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实践的发展证明，单纯的计划经济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和现实，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结论，主张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找到了新的体制依托和推动力量。

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点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按照过去一些理论家概括的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特征之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水火不相容，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意味着演变为资本主义。

邓小平在 1979 年就明确地否定了这种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①]1985 年 10 月 23 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提出我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是否反映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又十分明确地回答：“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②]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总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深入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而作出的科学论断。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第一，他从理论上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属于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方法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范畴，因而不能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他多次讲到：“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它们“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反复讲到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并没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3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8 页。

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其中最搞不清楚的，可能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了。

第二，他从历史的角度来总结，指出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它可以与不同经济制度相结合。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人们早已接受斯大林的正确观点：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形式是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服务的。但是，却往往忽视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有商品生产就要交换，就有了市场，市场就会对经济活动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只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作用范围和程度不同而已。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形成，但是，在封建社会已经有了萌芽。邓小平正是看到了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这种内在联系，从总结历史来说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可以和不同制度相结合的。既然承认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当然也就应得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结论。

第三，从现实来看，他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①]他又说：“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②]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特别本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了计划控制；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已逐步从不承认市场的作用到逐步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这本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人们在把计划与市场作为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的传统思想禁锢下，往往不敢承认事实。或者承认计划和市场在两种制度下都起作用，但强调计划和市场不等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仍然固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制度的区别。邓小平明确地将计划和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视为方法、手段，而不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这样再去区别市场与市场经济，就没有多大的实质性意义，从而就可以科学地回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了。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说了“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但是，它并没有丢掉“老祖宗”，而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从而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范例。

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理论说明，一般都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学说为根据的。马克思在 1868 年 7 月 11 日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4 页，20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4 页，203 页。

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他并在信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①]1878 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②]恩格斯在解释社会主义生产将决定于计划安排，而不需要借助于交换价值的调节时，是这样说的：“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官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劳动在各种产品生产的分配，可以通过计划来加以安排，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①]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这些论述表明他们曾经认为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及其表现出来的弊端，来揭示资本主义特征和预见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不是为未来新社会的实践规定具体蓝图。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随着社会实践而发展的。恩格斯在晚年及时察觉到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新变化，他在《反杜林论》发表两年后的 1880 年，应保·拉法格的请求将《反杜林论》的三章编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独立发表时，恩格斯在论及生产力的社会本性迫使资本家阶级在资本关系范围内对资本生产关系的形式进行调整的地方，补充了两段关于托拉斯产生发展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②]1891 年，恩格斯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时，更加明确指出纲领草案中所说的“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一句话需要大加修改，他认为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出现，标志着生产的“无计划性没有了”。[③]恩格斯提出资本主义的“计划性”问题之后，列宁在 1917 年针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一般垄断变为国家垄断的现实，更加强调了恩格斯的观点，并指出“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他的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提法，不估计到托拉斯的作用，却说‘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无计划性’，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①]

从上面引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几点认识：

第一，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一“自然规律”的实现形式——即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它由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制度）决定，但是，它并不是社会制度本身。不能作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68—36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23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8 页，43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8 页，43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70 页。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29 卷，第 436 页。

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志。

第二，在同一个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实现形式——资源配置方式是可以变化的。在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无计划生产可以被有计划生产所代替。这不仅是因为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使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更加强烈，而且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它自身范围内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使资本社会化了，垄断组织和资本主义国家掌握了相当大一部分经济资源，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计划性成为可能。因此，这说明资本主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计划经济。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无需借助于价值。但是，这个结论的得出是有条件的。它以生产资料全部归全社会共同占有，因而劳动具有直接社会性，劳动产品不再成为商品为前提。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想，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其他经济条件决定着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其资源配置方式怎能离开价值及其表现形式——交换价值呢？恩格斯说过：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的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我们岂可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有所发展的理论不顾其发展而将其前一阶段的结论当作不可改变的“金科玉律”来固守呢？

从上述几点可以清楚地说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志，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根本对立的观点，是教条式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邓小平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两种手段、方法，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但是，他以“老祖宗”为依据却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这就是他的伟大贡献。

二、“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和改革目标选择问题。人们对任何事物的价值判断和选择，都要有一定标准作为衡量是非和决定取舍的尺度。邓小平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及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的观察、评价上，打破了人们动辄从社会制度性质（姓“社”姓“资”）来考虑问题的传统思维定式，确立了一个全新的标准：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在回答格隆瓦尔德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提问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怎样“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考察、评价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根本标准，这是有充分的科学根据的。因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而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标准，就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必须搞市场经济作出科学的回答。邓小平不仅对市场经济能更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作出原则判断，而且对它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了许多重要的论述。

1.他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认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①]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一大弊端是忽视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邓小平在1980年就提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②现在则认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发展”，主张“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是一个认识的大飞跃。这标志着已经认识到原有经济体制的要害在于“只搞计划经济”而不搞市场经济。现在的出路是搞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邓小平主张“计划和市场都得要。”③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经济调节手段，各有所长，结合运用可以优势互补。但是，只搞计划经济或以计划经济为主都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邓小平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②]

2.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是以市场为纽带，把生产和消费有机联结起来，两者互相促进，这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具有极端重要性，邓小平通过对苏联东欧国家长期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教训来阐明这个道理。他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苏联东欧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僵化的结果，是使其生产和消费都在低水平上循环，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这是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销，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3.邓小平还从信息的重要来说明必须搞市场经济。他说：“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①]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及时传递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按照计划经济的理想，社会中心组织能够准确地掌握全社会的经济信息，并能作出科学决策，迅速得到实施，因而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现代的科学技术、信息传递、组织管理水平都做不到这一点。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信息的传递主要是纵向的。纵向信息畅通，而横向信息闭塞。我们摘市场经济则是要使纵向信息和横向信息结合。市场对资源配置状况的反应信号最为灵敏，而且还具有开放性的特点。通过市场上的各种经济信号能获取到国内和世界的经济信息。所以，邓小平在 1989 年平息动乱以后，谈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时说：“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②]可见，邓小平总把市场经济和信息的重要性、对外开放联系起来考虑。

4.邓小平主张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其核心思想要把社会主

[①] ③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8—149 页，364 页，20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46—247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4 页，306—307 页，14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4 页，306—307 页，149 页。

义的优越性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方法结合起来，以加快生产力发展。他指出：“我国当前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③]他在 1992 年南巡重要谈话中谈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证券、股市等经济形式时，更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证明了邓小平上述思想的正确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加深对市场机制作用的认识过程。在党对市场机制作用认识不断深化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也经历一个以逐步强化市场机制作用为主线的逐步推进的过程。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实际上都是使生产者逐步成为市场主体，为他们进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同时，逐步放开价格，逐步构建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的过程。我国这种以市场取向为方向的改革，在空间上采取了渐进式的梯度推进的战略，与对外开放相结合，我国地区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实行的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区——内陆地区有区别的政策。其中，经济特区，从创办一开始就明确实行市场经济裆时叫做“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而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经济政策和思想观念优于内地，其市场化程度也大大高于内陆地区。从实践结果来看，我国逐步强化市场机制作用的改革过程，不仅没有削弱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使我国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最快和人民生活提高最多、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的新时期。特别是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先行地区（经济特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沿海地区）更以其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和人民生活提前进入小康水平，为全国提供了示范，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之路。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八五”期间，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现代化建设开创了新局面，“八五”计划提出的主要任务 1995 年将完成或超额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1995 年已提前实现。

三、“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计划和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方法、经济手段，可以运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4 页，306—307 页，149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3 页。

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1]这个“方法上基本上相似”而所有制关系和社会性质“不同”，就是方法和制度的关系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本质上是一个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运用市场经济方法问题。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它是指“市场经济一般”。但是，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独立存在着“市场经济一般”。在现实生活中，只存在封建社会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初期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市场经济的现实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新事物，要把握“市场经济一般”只能向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习市场经济的方法。所以，邓小平多次反复提到采用资本主义方法问题。他说：“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1]“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加速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他的著作中把企业经营形式、银行金融、借外债发展、证券、股市等都看成是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资本主义方法，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主张大胆借鉴和试验，用它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讲的“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并非指这些方法本身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而是指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中采用的方法。其中有许多是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所采用。从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如果我们不“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方法”，我们就只能沿用过去那种计划经济的方法，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飞跃发展。

但是，在谈到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时，邓小平又提出值得注意的几个思想：

第一，他讲的是“吸收资本主义一些有用的方法”，并非指资本主义的一切方法。事实上，资本主义有些方法并不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要求，只是增加资本家利润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的方法（如某些以牺牲工人健康来增加利润的方法，靠色情服务和赌博来发财致富的方法），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相矛盾不能学习借鉴。目前，有些地方借口发展市场经济、吸引外资，而采用提供“三陪”等色情服务的方法，甚至对“三资”企业侵犯工人合法权益、危害工人健康和生命的一些作法也听之任之，这是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第二，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总是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邓小平在讲到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时，又强调是“当作方法来用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方法时，要注意把握好方法和制度、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必须明确，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方法来发展市场经济是方法、手段，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目的。不能因为搞市场经济而伤害社会主义本质，冲击社会主义制度。在利用资本主义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时，不能忘记“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特点”和优势。

---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36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30 页。

第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时，还要处理好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和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例如，实行股份制和建立股票市场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实践证明是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东西。但是，我国的所有制基础和国家性质与西方国家不同，在建立股份公司制度时，其组织形式和领导体制，既要符合国际标准的规范化，又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确立和保证党组织和工人阶级在公司中的应有地位，就是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

第四，在搞市场经济过程中，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也会出现一些消极的东西。邓小平清醒地估计到这一点，提出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他说：“搞活开放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但有办法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①]在这方面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总结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和措施，诸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健全民主法制、打击严重犯罪活动等。他满怀信心他说：“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①]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也指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无疑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把物质文明建设好。同时，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并要求“精神文明建设要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3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9 页。

第八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

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什么？在许多人都停留在传统的经济理论观点，主要依赖于资金、人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的时候，邓小平却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并系统地提出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出了一条新路。这些思想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户力”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重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他们通过对现代科学和现代大工业的考察，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认为，科学已成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是“财富的生产者，就是实际财富”。因此，他们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认为“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赞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列举的每一项生产力的巨大成就，都是科学进步结果，都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有力佐证。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39 年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 年，经过毛泽东批示，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他在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所以，他说：“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为了使边区在困难环境下更好地发展经济，党中央还作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党和毛泽东同志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在 1953 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毛泽东就号召：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954 年，周恩来在讨论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和政务院的报告时指出：“我们充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结合最近对总路线的学习，把科学工作提到应有的位置”。同年 3 月 8 日，党中央在向全国批转这个报告的批语中就明确指出：“在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的时候，必须大力发展自然科学，以促进生产技术的不

断发展，并帮助全面了解和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我国科学基础薄弱，而科学研究干部的生长和科学研究经验的积累，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必须奋发努力，急起直追，否则就会由于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①] 1956 年 1 月，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技术，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强调“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并代表党中央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①]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历时数月，制定了《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把规划付之实施。1958 年初，毛泽东曾经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并要求“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如果说，毛泽东的这些重视科学技术、主张进行技术革命的思想，主要集中在通过技术革命来实现赶超目标的话，1963 年他在听取聂荣臻等汇报《科学技术十年（1963—1972）规划》时的谈话，则把科学技术和发展生产力直接联系起来了。他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于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②]从 1963 年起，我国又开始执行《1963—1972 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尽管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后来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我国仍然成功地制造了“两弹一星”、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牛胰岛素、培育成功一大批高产杂交组合水稻，在我国科学家独创的石油地质和油田开发理论指导下，发现和建立了大庆等一系列大油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在贯彻党重视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重要决策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他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继承并进一步大大发展了党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逐步形成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认为科学研究是一项基本建设，具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的萌芽。

早在 1952 年 9 月 12 日，在政务院讨论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科学研究是一项基本建设，在这方面的投资叫基本建设的投资。我们知道，基本建设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它是指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用投资形式来实现的固定资产再生产。新增加的固定资产部分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性质；替换已经破坏或报废了的固定资产部分属于简单再生产性质。基本建设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6 页。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4 页。

[②] 转引自龚育之：《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司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地震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0 页。

按其经济内容可分为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基本建设是调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改变国民经济结构，用先进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手段。邓小平把科学研究列入基本建设范畴，既表明科学研究具有再生产的经济性质，又反映出他认为科学研究具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的性质。因此，这个提法已具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的萌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在 50—60 年代就很重码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发挥，他在 1961 年 9 月主持制订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 70 条）中把企业技术进步作为整顿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肯定“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不久，又提出要“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认为“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浪费专业技术力量”，针对当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有的单位让技术干部去搞与技术无关的行政工作，还有的长期下放或打杂的现象，他强调“以后，对大学毕业生的使用，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①]

第二阶段，70 年代中，肯定“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

1975 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此期间，邓小平亲自抓了当时处于半瘫痪、半取消状态的科研机构的整顿工作。1975 年 7 月，中央派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们尽快就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提出意见，后来形成了《关于科学技术工作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草稿。9 月 26 日，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肯定了《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同时，他强调“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他说：“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②]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是“整个国家建设”，而不仅是经济建设。他 1975 年 7 月 14 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抓装备时，也提出“科研要走在前面。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③]他还强调：“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④]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把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视为关系工业、农业、国防建设的“大事”，主张科研应走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前面，处于应当超前发展的地位。

第三阶段，以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为标志，公开阐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并强调“现代科技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1977 年 7 月，邓小平再次复出后，首先就“自告奋勇管科技、教育”。他认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不抓科学、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291—29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2 页，20 页，28—29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2 页，20 页，28—29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2 页，20 页，28—29 页。

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在他的亲自主持下，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1978 年 3 月 18 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针对“四人帮”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颠倒是非，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诬蔑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的反动观点，十分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邓小平不是从书本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人，他引经据典，搬出马克思来，主要是为了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主要是面对现实，面对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的现实，面对我国四个现代化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的现实。他在对近 30 年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的发展进行深入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出巨大的作用”。“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这个阶段，邓小平不仅在理论和认识上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和论证了科技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的关键地位，而且围绕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我国在科学技术研究和依靠科技进步来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四个阶段，1988 年前后，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他特别对于世界高科技的发展给予极大关注，强调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要占有一席之地，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70 年代以来，邓小平一直关注着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他常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一类字眼来形容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他强调“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他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①]正是从世界的变化，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的深刻思考出发，邓小平在 1988 年 9 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他说：“最近，我会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只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已经不够了，他根据什么作出这个论断呢？按照邓小平自己的解释：“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②]“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2 页，377—37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2 页，377—378 页。

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由此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1989 年邓小平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由上面这些论述可见，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是偶然心血来潮的“标新立异”，而是对历史教训的反思、现实发展的概括、未来发展前途的依靠。因此，这是一个经过长期酝酿、深思熟虑，而最终升华出来的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二、“科学技术是弟一生产力”思想的基本内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和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都提出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并为此作出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的战略决策。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贯彻好科教兴国战略，首要前提是要全面理解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地位与作用、发展方向、基本任务、战略重点、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等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论述，形成了我国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他科技思想的精髓”。在这里，江泽民从八个方面概括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同时又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其精髓。这就为我们全面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思路。在这里，我们分为两部分，主要阐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关于解放科技生产力、发展科技生产力的一些思想。

科技、技术、生产力，这三者是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事物和概念。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现实力量。只要人类社会产生和存在，就有生产力存在发展。人类在生产中不断认识自然、积累经验，才逐步产生科学思想和技术经验。在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者的体力、经验和技能；生产工具是长期停滞、改进甚慢的手工工具；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还很不深入系统，科学还没有发展成为理性知识体系；技术与科学往往缺乏直接联系，当时的技术还主要是经验性的技术。因此，在古代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还起不到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还不能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近代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大机器生产方式的产生，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直接结合起来了！在这个阶段，如马克思所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就使“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因此，马克思得出了科学是“一般社会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著名论断。

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过去长期被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至少在我们中国是这样。后来掀起的“批邓”，公开把这一科学论断作为“科学技术决定论”。“唯生产力论”来进行批判。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第一大贡献，就在于他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并从近 30 年现代科技、经济发展的实际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两

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他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基本因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来阐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

邓小平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本世纪中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在肯定马克思观点“非常正确”的同时，指出“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作出这一判断的基本依据是生产和科学技术关系的根本变化。这种根本变化如钱学森所概括的：“人类的历史是先有生产，后有技术，再有科学。现在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从而导致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和社会的更大进步”。钱学森认为邓小平正是“依据他的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分析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变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①]邓小平从 1975 年肯定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到 1988 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其思想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1975 年讲“科学技术叫生产力”，主要是强调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不要拖整个国家的后腿，在工业和国防建设等方面要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提出：“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但是，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命题本身并未展开论述。到 1978 年，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时，不仅是结合新的实践，来论证这个观点，而且已经包含着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的因素。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①]在这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经快呼之欲出了。但是，这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仍在继续观察、思索，经过十年后，才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根据邓小平的论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内涵应包括几点。

“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一系列的新兴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发展。他总结说。“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几十倍几百倍的提高。邓小平说：“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邓小平还从科学技术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论证它是“第一生产力”。他指出：“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他又说：“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

[①] 钱学森：《科学技术进步的重大战略意义》，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司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地震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0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87—88 页。

由上几点可见，邓小平把科学技术视为决定生产方向、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力量，它关系国家兴衰成败，因此，它是第一生产力。

三、关于解放科技生产力、发展科技生产力的一些思想

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解放科技生产力、发展科技生产力，就成为邓小平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主要有：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政治上解放科技生产力；提出“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从政策体制上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跟踪追赶当代科技生产力；提出“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科学技术”，加快发展科技生产力。

（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它首先表现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它的发现、发明、创造、再生产，以及推广运用，都要以智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为主力军。科技人员是科技生产力的载体，没有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就不可能使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但是，在我国过去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和政策的影响，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不被看成劳动者，而被扣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帽子。“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更把错误推到极端，知识分子被作为“全面专政”的对象，名列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被称为“臭老九”。因此，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发挥科学技术和教育的生产力的作用，首先就需要解决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阶级属性和历史作用，从政治上解放科技生产力的问题。早在 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时，他就顶住“四人帮”的巨大压力，明确指出：“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说：“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样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未，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他深入地分析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肯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是劳动，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劳动者，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产阶级剥削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因此，他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强调：“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既然承认了这两个前提，那未，我们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

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1]正是基于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作用的深刻认识，邓小平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他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1]在 1988 年他还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

（二）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思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一头是科学技术，一头是生产力，它从理论上把科技和经济结合起来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还需要解决许多问题，需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发挥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对此，邓小平通过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在解决了认识问题之后，进一步从方针和体制两个方面来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邓小平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的同时，又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要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他说“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仍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2]这里涉及科学技术为国防现代化服务与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可能”。[3]所以，他提出“科学技术主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适应方向的转变，他又明确宣布：“中央要求科技界面向经济建设”。[1]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基础上，中央制订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明确指出：“科学技术门类很多，应当为多方面服务，但主要应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指明了方向。

我国长期科技发展不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率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体制与机制。主要表现在：（1）在运行机制上，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技工作，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2）在组织结构上，过多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脱节，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3）在人事制度方面，由于“左”的影响，对科技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动，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尊重。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为此，中央在 1984 年作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之后，在 1985 年 3 月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在评论这一决定的草案时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科技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

---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88—90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8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40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8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8 页。

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②]

（三）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科学技术

邓小平在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的同时，也如实地指出生产技术的落后状况。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这方面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正是从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现实出发，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发展我国的科技生产力，他提出要“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他强调：“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①]

怎样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办法是“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并提出多种政策措施。

1.“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这是邓小平站在世界发展的高度提出的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方针。第一，要求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从目标上要坚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高起点；第二，重视战后欧洲、日本通过采用贷款方式引进技术、专利，加快恢复发展经济的经验。日本在 1950—1978 年间共引进技术 3 万多项。有人估计，如果由日本人自己从头做起，要多耗费 4 倍的时间和几十倍的经费。我国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更应该充分利用“后发性效应”，来加快实现发展目标。第三，他指出：我们已经有了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

2.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邓小平在讲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时，强调包括管理。他认为“管理也是一种技术”。先进的技术装备，要由人来使用管理，否则不能发挥其先进生产力的作用。邓小平指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①]对于西方国家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经验，人们常常把它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因而不敢学习借鉴。邓小平说：“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并没有阶级性”。[②]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8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91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29—130 页，35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29—130 页，351 页。

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③]

3.要利用外国智力。邓小平在 1977 年 8 月，根据外交部反映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工作的情况，就指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对于这个问题，在贯彻执行中由于认识不足，决心不大。邓小平在 1983 年 7 月 8 日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强调：“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他说：“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乏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冬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④]邓小平还特别关怀出国留学人员。“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要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⑤]

4.参加国际科学组织的合作研究。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夫妇等时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你们成立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积极参加这个世界实验室的工作。[①]

（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高科技的发展是当代世界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也是国际范围科技竞争和未来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主要是通过高科技的发展及其对生产力的变革作用来体现的。我国要发展科技生产力，必须重视高科技，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进入 80 年代以来，邓小平对于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和我国应采取的对策给予极大的关注。

1.他要求：“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强调“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他从头到尾，亲自关怀指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建设。他主张“还有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他提倡“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

2.发展高科技，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提高。在 80 年代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对发展高科技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美国的“SDI 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原经互会的“2000 年科技进步综合纲要”、前苏联的“二十年科技进步综合规划”、日本的“振兴科技基本政策”、韩国的“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印度的“新技术政策声明”等，都是以发展高科技为基本内容的国家级战略规划。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这就是 1986 年 11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3 页，32 页，378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3 页，32 页，378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3 页，32 页，378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83 页。

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王大衍、王涂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个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经过两百多位专家学者的全面论证和反复修改而制订的，它规定了我国发展高科技依照“瞄准前沿、积极跟踪、有限目标、重点突破”的指导方针；选择了对我国今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 7 个领域，确定了 15 个主题；明确了发展高科技的基本任务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缩小同国外差距，力争在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为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并通过计划的实施，培养和造就新一代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八六三计划”是指导我国高科技发展的纲领。

3.高科技的发展既能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又能增强军事实力，为国防现代化服务。战后，不同国家对发展高科技采取不同政策，其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前苏联发展高科技主要着重于与美国争霸，重视军事领域发展，忽视民用，导致国民经济的停滞。日本则主要将高科技用于民用产品生产，使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我国制订“八六三计划”时，对于选择高科技发展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出现不同意见的争论。邓小平明确批示：“我赞成‘军事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方针，既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发展必须主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也反映出他对国防现代化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正确安排。他说：“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①]

4.1991 年 4 月 23 日，邓小平为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作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我国在 1987 年开始执行“八六三计划”以后，为了与这个计划相衔接，从 1988 年 8 月开始实施“火炬计划”。这是一项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高技术产品为龙头，以高技术成果为依托，以大中企业、大院大所和高等学校为骨干力量，促进高技术成果商品化，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的指导性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到 1991 年 9 月三年内共安排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579 项，加上各省市自己实施的项目，共计近 2000 项。全国已有 27 个大中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进入开发区的言技术企业已近 1690 家。邓小平“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为高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高科技的研究成果，只有转化为商品，形成产业才能真正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而高科技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又反过来对高科技的研究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按照邓小平的题词去做，就会使我国高科技的研究和高科技产业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邓小平如此高度重视高科技的发展，曾经引起有些人士的不解。邓小平曾经谈到：“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①]邓小平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的战略眼光出发，重视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9—100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9 页。

我国高科技发展，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认识：第一，发展高科技，是振兴我国国民经济的希望所在。“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第二，高科技的发展，关系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他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第三，发展高科技是当前世界发展的潮流，“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否则，不参与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就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第四，邓小平把发展科学技术，特别高科技，看成是关系实现人类希望的大事。他说：“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邓小平正是从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和倡导我国“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

四、学习邓小平高度重视科技教育的革命实践，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在科学地分析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决定》要求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并为此而作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进一步深化和向更高阶段发展。这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要实施好这一战略，不仅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而且要认真学习邓小平重视科技和教育的革命实践。我们要以邓小平为榜样，来贯彻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1.要学习邓小平从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科技和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把实施科教兴国真正作为重大战略问题来抓。

邓小平在说到自己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时，明确指出“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他认为“中央提出要求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从中小学教育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他强调从战略高度来看待科技教育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要从长远利益来认识问题。他说：“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说：“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第二，要从实现现代化的全局来认识问题。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第三，要面向世界看问题。80 年代以来，他就始终关注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强调“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内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要不然我们很难跟上世界的发展”。1983 年 10 月，他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可以说这是他认识教育和科技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邓小平是高度重视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的，但是在谈到增加科技教育的投入时，主张“我们要千方百

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体现了近期发展在必要时要服从于长远发展的战略思想。教育和科技作为一种产业来看，都是属于一种长远投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形象他说明教育发展、人才的培养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即使按照邓小平的要求认真抓紧，也只能“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科学技术从人力资金投入，形成科技成果，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运用，再到大面积推广，形成社会生产力，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因此，在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指导思想上，强调要有战略观念就特别重要。缺乏战略眼光，只追求“刀下见菜”、“立竿见影”的领导者，往往只顾眼前应急，忘记根本大计，对科技教育必然是“讲起来首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这是不可能认真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和科教兴国战略的。

2.要学习邓小平迎难而上“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的精神，去克服科教兴国过程中的各种困难。

正是从战略高度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和教育在我国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在 1977 年 7 月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以后，即“自告奋勇”地向中央提出要管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如果回到 1977 年的背景来学习邓小平这一段自白,我们就不仅敬佩他对科学教育在四个现代化中的地位的认识之高，而且从当时抓科学教育之难更看到他“自告奋勇”之“勇”。科学教育战线，是受“文化大革命”破坏最严重的领域。邓小平 1975 年主持中央工作抓全面整顿时，就以敢“摸老虎屁股”的精神开始着手对科学教育进行整顿。他对科技和教育发展中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他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劳动者；强调科研工作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对有水平的科研人员要爱护和赞扬，发挥其作用，科研人员专心搞科研，不是“白专”；要选择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给科研人员搞后勤；对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他强调要办好教育，以解决后继有人的问题，认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提出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调动人的积极性。他主张选数理好的高中生入科技大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些整顿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 1975 年，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没有“敢摸老虎屁股”的勇气是提不出来的，但是，他明确表示“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正是由于提出了这些意见，后来成为邓小平被重新赶下台的主要“罪状”之一。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冲击和所谓“天安门事件”后的组织处理，并没有削弱邓小平坚持真理，拨乱反正，为实现我国现代化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他坚定地认为，我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977 年的教育科研战线，由于“四人帮”的肆意破坏，是非颠倒，存在极大的思想混乱。对科学技术是否是生产力？对科研教育战线 17 年的工作如何估计？科技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是不是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不是走“白专”道路？怎样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教育改革的方向？还有科研和教育的体制、机构问题等，都是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更不要说还有许多更具体层次的问题。但是，即使问题成堆，邓小平也坚定地表示“必须理出个头绪来”。他在 1977 年复职半个月后，就邀请 33 个著名专家和教授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连续四天仔细倾听专家教授们发表意见。通过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邓小平

对科学教育战线的问题认识更深刻，解决问题的思路更加明晰，拨乱反正的决心更坚定。8 月 8 日，他在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凡点意见》的重要讲话，在科学和教育战线引起巨大的反响，受到广大科技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欢迎。但是，对这个讲话也有人反对。邓小平说：“我在八月八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对我的讲话，有人反时，这不要紧。一个方针政策，总会有人反对和不同意的。他们敢讲出来就好，可以开展辩论嘛！”他特别批评教育部的负责人思想不解放，怕又跟着他犯“错误”。强调“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经过邓小平坚定不移的努力，终于实现了科学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分别在 1978 年 3 月 18 日和 1978 年 4 月 22 日胜利召开。邓小平在这两个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彻底清算了“四人帮”对科学教育事业的破坏，为新时期科学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开始了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春天。

邓小平抓科学教育的“难”，当时主要难在政治思想上。要拨乱反正，一是否定和批判 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在政治上要冒被人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风险，二是在思想上要克服“四人帮”制造的混乱，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任务十分艰巨。今天，我们全面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困难，是在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已经明确，思想空前统一条件下，具体贯彻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只要我们有邓小平那种迎难而上的精神和坚毅不拔的解决问题的决心，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3.要学习邓小平倡导的“少讲空话，多做实事”的作风，采取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去解决科教兴国中的具体问题。

邓小平在谈到抓科学、教育时，对“抓”的概念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①]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谈到自己怎样抓教育时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②]当时抓教育，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教育部的负责人思想不解放，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在拨乱反正面前处于被动地位。所以，邓小平首先“抓头头”：找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要他们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批判《纪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两个估计”。同时，他又亲自抓具有方针性的具体问题，如教育部的机构问题、工宣队撤出学校问题、大学的管理体制问题、大学的学制问题、大学的招生条件问题、教材问题，科研机构内部的领导体制问题、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问题、科研和教育的后勤工作问题、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邓小平一再强调：“现在我们的方针政策已经明确，我们的口号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他强调要加强党委对科学和教育工作的领导，但明确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战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几年前，我曾经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我还是这个志愿”。为了调动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68 页，第 7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68 页，第 70 页。

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他不仅解决了对 17 年的估计问题，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帮助大家放下精神上的包袱，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而且提出要采取许多具体的政策措施，切切实实地帮助科技教育工作者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如，建立奖励制度、保证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业务工作时间、师资的培训提高、科研教学骨干优先解决两地分居、后勤服务工作等。在当时我国刚结束“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处于百废待举的情况下，邓小平抓科学和教育能这样深入具体，说明他对科学技术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怀的确是无微不至的。

邓小平抓科技教育的务实精神，特别表现在他抓高科技的发展上。80 年代中期，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大讨论。王大衍、王淦昌、杨嘉埠、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对这场世界新科技革命十分关注的邓小平，在 1986 年 3 月 5 日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有关方面在研究选择高技术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有不同意见，4 月 6 日，邓小平明确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当我国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制定出来后，10 月 6 日，他在有关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当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1987 年 3 月，这个计划开始组织实施，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对发展高技术的高度重视和抓得很紧，这个意义重大的计划从提出建议到选择项目、制定计划到组织实施，只用了一年的时间，的确实现了“速作决断”的要求。1991 年 4 月 23 日邓小平又为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作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进一步为高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要求已经明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大的政策措施已经制订，关键在于不同领域、部门、地区、单位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落实。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需要我们的各级干部学习邓小平抓科技教育的务实精神，“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有些外国专家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么重视科技，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在今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之前，据统计，全国已有 28 个省市自治区颁布了科教兴省（市、自治区）的有关规定，300 多个市推出了科技兴市战略，60—70%的县提出了科技兴县的计划。实施结果如何？可惜没有人调查统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真抓实干和“口惠而实不至”者，必然是两码事。但愿我们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能用邓小平的科学精神来贯彻落实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为科教兴国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4.学习邓小平亲自抓重大项目的范例，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解决实施“科教兴国”的关键问题。

邓小平抓科技教育不仅体现在抓头头，抓方针政策、抓计划上，而且亲自抓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项目。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关怀便是一个范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了解粒子物理研究的重要，早在 1956 年制订的科学发展 12 年规划中就确定要建造 20 亿电子伏特的加速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几经周折——经过 1956 年、1972 年、1976 年、1980 年的几次

变动，使工作未能展开。邓小平深刻理解高能物理研究的重要和科学家们的心愿，在 1981 年初指示当时主持国家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组织专家论证，拿出方案。根据专家们的论证，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在北京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邓小平经仔细研究后批示：“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他还亲自为工程建设点将。1983 年 4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同年 12 月，党中央国务院将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列入国家重点工程，要求在五年左右建成。邓小平亲自为工程的奠基石题词，并在 1984 年 10 月 7 日，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参加工程的奠基仪式，并坚定他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由近万台集中了多种高技术的设备组成的复杂巨大系统工程，其复杂性和面临的技术难关不亚于当年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的研制。邓小平十分关注工程的进程，经常阅读工程的简报，及时作出指示，帮助解决工程进展中的难题。他亲自批示：“我们的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还多次强调：“最重要的是质量问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1988 年 10 月，他又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视察了这个工程，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并从我国怎样跟上世界发展的高度来评价我国发展高技术的计划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邓小平抓北京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为我们的领导干部提供了身体力行、亲自抓重大科技项目的典范。

为了保证“科教兴国”战略的实现，中央《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江泽民总书记还提出：“中央要求党政第一把手都要亲自抓第一生产力”。但愿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以邓小平亲自抓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的行动为榜样，深入实际，解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能保证关键项目的落实，同时这对于带动各级干部增强重视科技教育的意识，积累指导科技教育工作的经验，都是大有好处的。

第九章
先富带后富，加快发展论

邓小平在 1977 年复出以后，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认为这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大问题。他在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先富带后富，以加快经济发展的理论，为我国经济发展找到了“新办法”。

一、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改策

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根据我国新的情况，提出了新的经济政策。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经济政策，许多人比较注重从收入分配，从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来理解。但是，如果联系邓小平有关论述和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我们认为对邓小平这一思想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收入分配的范围，而应当理解为是一种涵盖生产发展——收入分配——生活水平提高在内的经济发展的新政策——即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邓小平这一段话本身和后来他自己结合改革发展的实际来解释这一思想的有关论述。从邓小平这段话本身来看，他是主张一部分地区、企业、个人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即在经济发展中贡献大），从而“收入先多一些”，再“生活先好一些”，实行这一政策的目标是“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其基本着眼点是“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逐步贯彻了这一经济政策。邓小平在 1983 年 1 月《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谈话中指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986 年 3 月，在我国农村政策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以后，邓小平在解释为什么实行这一政策时又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①]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到，邓小平把是平均发展、吃“大锅饭”，还是波浪式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成是新旧不同的两种办法、两条路子。这实际上是既包括生产，也包括分配的经济发展的两种模式。这就可以帮助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55 页。

我们理解：为什么邓小平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把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作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情况的第一条经济政策首先提出来，并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因为，当时中央已经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但是，我们面临的是长期“左”的思想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人们思想僵化、经济停滞、生活贫困的局面，整个国民经济如同一部陷于瘫痪的大机器。如何把这部大机器开动起来并使它加速运转？邓小平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展经济民主，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为此，他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的政策，作为撬动陷于瘫痪的国民经济大机器的一个有力杠杆——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这一政策之所以具有撬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威力，其实质在于它是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把为国家创造财富与集体或个人经济收入、生活福利有机结合起来，从物质利益着手来推动经济发展。后来，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重要谈话中总结他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构想时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概括，更清楚地表明他的“先富带后富”论着眼点在于加快发展，是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来的。

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论是从总结经验教训，否定旧办法、旧模式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与旧办法、旧模式存在几点区别：

（1）旧的办法、旧的模式混淆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就要立足于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差别，因此，必须消灭人们的收人差别和富裕程度差别——执行平均发展、平均主义分配的原则。新的办法、新的模式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条件的不平衡，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一个过程。它需要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逐步带动其他人富裕的渐进过程才能实现。因此，邓小平在讲“共同富裕”的实现时，总是讲“逐步达到”、“最终达到”。从整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来看，邓小平勾画了一个由“消灭穷困”——“不贫不富（小康）”——“比较富裕”的进程。[①]邓小平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

（2）旧的办法、旧的模式把实现共同富裕的着重点放在收入分配上，主张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把收入的大体平均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办法。实行这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办法，阻碍生产力发展，物质产品越来越少，结果只能“共同落后，共同贫困”。新办法。新模式把实现共同富裕的着眼点，放在生产发展。它主张反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因为它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阻碍生产力发展。邓小平强调：“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变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

（3）旧的办法、旧的模式在公平和效率关系上，追求表面上的平等而忽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9 页。

视效率。邓小平针对我国 70 年代中的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指出：“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②]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的经济政策时，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③]

（4）旧的办法、旧的模式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忽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新的办法、新模式则强调在重视革命精神的同时，必须重视群众的物质利益。邓小平指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①]

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后富，加快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模式包括丰富的内涵，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1）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不能搞两极分化。他说：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他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②]

（2）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但是不搞平均发展、平均分配。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③]

（3）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它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可以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④]同时，强调“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⑤]

（4）实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①]并认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要防止两极分化，首先要靠正确的政策。邓小平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0—31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4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4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55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2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66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95 页。

指出："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②]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都是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政策。同时，邓小平还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5)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经济政策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它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裕起来。因此，它的政策范围包含了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在处理这三个层次中的先富和后富关系的总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具体实现形式又是有区别的。因此，需要对三个层次进行分别考察。

二、地区之间的先富带后富问题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大国，如何正确处理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关系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原则问题。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针对旧中国工业布局过分偏集在沿海少数几个城市而内地基本没有现代工业的畸形布局，把建设投资的重点向内地转移，是合理的。但是，在"三五"、"四五"、大三线建设时期，以备战和建设战略后方为基调，以全国平衡发展为指导思想，以工业为主体的生产力布局跳跃式地向西推进，使沿海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这虽然为中西部地区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但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速度和效益都相对下降。因此，为了加快我国经济总体发展，需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

邓小平在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力时，明确提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他主张在生产发展中要强调因地制宜，并解释说："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他还举例说："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①]正是从全国不同地区的特点和条件的差异出发，他提出了处理地区之间发展关系的"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的指导思想和"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原则。

我国加快一部分地区的发展，以影响和带动全国，主要是通过实施沿海地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来实现的。早在 1979 年 4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广东省委原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谈到要发挥广东的优势时，邓小平就首先提出了办经济特区的问题。他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这一倡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谷牧带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领导研究办特区问题。考察组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确认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经济特区的许多有利条件。1979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将这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1984 年 2 月，邓小平到深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39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6 页。

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进行视察，看到“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他在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提出“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要求，主张“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邓小平是把设置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以加快沿海地区的发展作为落实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这一大政策的战略决策来抓的。他说：

“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1984 年 5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去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实地考察后提出《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考察报告，建议“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进而陆续开放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北起大连港，南至北海市，构成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地带。”邓小平对此报告给予肯定，说：沿海连成一片，这很好嘛！1985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式沿海经济开发区。1988 年 1 月，邓小平又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①]1988 年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海南建省并建立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同年我国开始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开放市县增加到 288 个，开放区的面积增加到 32 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 1.6 亿。针对这种沿海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要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倡议设立经济特区、建立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到形成沿海开放地带，他都起着关键作用。邓小平如此高度重视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是从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这个大局出发的。他主张通过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来加快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从而加快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他认为“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邓小平在主张沿海地区加快发展，先富裕起来的同时，也注意地区之间不能搞两极分化。他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因此，他主张对“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同时强调：“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他提出了一些具体做法：可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开始做某些技术转让；打破“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封锁，发展经济协作区；先富起来的地区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408 页。

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等。但是，他也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①]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出：“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为此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了主要措施。

三、企业之间的先富带后富问题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已经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企业和生产队是我国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企业和生产队管得过多过死，国家和企业（生产队）、企业（生产队）和企业（生产队）之间“吃大锅饭”，是这种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弊病之一。因此，邓小平提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他举例说：“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土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由此他设想：“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①]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实际上就是他在同一报告中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企业由于生产经营好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以带动其他单位发展这一思想的展开和注释，其实质是改革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生产队）的管理体制，即搞活企业，使企业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并根据生产经营的好坏而获得不同的经济利益。在邓小平这次讲话之前，安徽、四川两省在农业管理体制和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已开始作了有益的试验。1978 年，安徽省旱情十分严重，秋种遇到了困难，当时省委决定把集体无法播种的土地借给社员播种。这个办法调动了社员积极性，大大加快了秋种的进度。在借地的基础上，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组，有的搞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省委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突破禁区支持滁县、六安地区和凤阳县等进行试点，使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发展起来，同一时期，四川省也进行了改革试验，在农业方面，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 15%左右，并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在工业方面，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8 年 10 月选择了四川宁江机床厂等 6 个企业试点。从 1979 年起，试点工业企业扩大到 100 个，试点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一般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邓小平在讲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4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45—146 页。

到农村改革时，曾经说过：“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个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1]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原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是集体经济的生产经营体制的伟大变革，调动了农户和集体两个经营层次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这就在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90%的人生活改善）的前提下，有一部分生产经营好的集体经济单位和农户比其他单位、农户收入增加更多，生活水平提高更快而“先富裕起来”。一部分人的先富，在农村对其左邻右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在农村中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

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一方面农民不仅能够从事商品生产，同时也能将属于自己的产品进入市场从事商品经营；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了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要求，这除了引起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也使农村专业户、个体工商户、私营经济产生和发展。这就使一部分人不仅依靠自己的劳动，而且能够依靠自己的更多的资金、生产资料，通过商品经营或通过他人的劳动而富裕起来。从而使“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外延有所扩大。这部分人的“先富”虽然与劳动致富有本质区别，但它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农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邓小平在思考工业的改革。他指出：“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邓小平在 1975 年抓工业的整顿时，就针对许多地方存在的无人负责现象，十分重视建立责任制。他提出：“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同时要求“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更明确提出：“在管理制度上，当前特别是注意加强责任制。”他认为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1]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我国城市工业企业改革从 1979 年开始，经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推行经济责任、经济权利、经济利益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实行两步“利改税”来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1987 年后进入企业改革经营方式、转化企业经营机制阶段。所有这些改革，从其基本框架来讲，都是围绕健全企业与国家、企业内部的责任制——即责、权、利关系来进行的。通过这些改革，一方面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搞活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不同企业由于生产经营的条件和水平的差别，使企业的经济发展水平、职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拉开了差距。正如邓小平所预期的“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企业成为市场的基本经济单元和最基本、最主要的竞争主体。每个企业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是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法人。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作用下，必然使“一部分企业先富裕起

---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8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51 页。

来，以影响和带动其他企业发展”这一政策通过优胜劣汰这一更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这样，它将成为推动企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

四、社会成员之间的先富带后富问题

邓小平主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人更勤奋地工作，其基本理论根据在于通过发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优越性，以调动劳动者进行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邓小平说：“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①]早在 1975 年 8 月，他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就指出：“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他针对当时平均主义严重泛滥的情况，指出：“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邓小平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是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的。因为毛泽东 1974 年 12 月 26 日提出的“理论问题指示”中曾经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②]1975 年 2 月 22 日，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出了这个理论问题指示，组织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四人帮”一伙乘机提出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否定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后来，这个“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主张，也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攻击邓小平的内容之一。在 1977 年再度复出以后，在科学和技术工作座谈会上，他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混乱提出：“讲按劳分配，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有好多具体问题要研究解决。这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他随即就来抓这些问题的解决。他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作了巨大的努力。首先，是澄清“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理论混乱。如肯定“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阐明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的关系，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是，革命是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规范按劳分配的内容，指出“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①]其次，他对我国的工资政策、工资制度、考核制度、奖励制度、稿酬制度也提出意见要求研究解决。他强调：“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有好多事情要做。有些问题要经过调查研究逐步解决。有些制度要恢复起来，建立起来。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邓小平主张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拉开收入差距，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51 页。

[②]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0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01 页。

必然使一部分劳动得多、劳动得好的人，收入多一些，生活富裕一些，其目的是利用按劳分配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机制，“鼓励大家上进”，以推动经济发展。他曾经回答人们对贯彻按劳分配拉开收入差距，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问题说：“这会不会打击其他人的积极性？讲怪话的会有，但可以刺激大家努力向上。发展经济工人要增加收入，这样反过来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农业也是一样，增加农民收入，反过来也会刺激农业发展，巩固工农联盟。”[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在考虑个人收入分配问题时，往往主要从收入分配关系内部考虑问题，在如何摆平人和人之间关系，在分配公平上兜圈子，而忽视另一个更基本层次的关系：收入分配与发展生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生产。最合理的分配应当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分配。邓小平在个人收入分配上，主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正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基本出发点，企图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形成一种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即他提出来的“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经济更大发展”的公式。他针对粉碎“四人帮”后，我国人民的贫穷状况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贯彻按劳分配，打破“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勤奋劳动先富裕起来，这是管理革命上的一个重要内容。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份，与此相适应收入分配方式也多元化了。有的社会成员已经不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劳动，而是依靠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资金，甚至剥削雇工而富裕起来，因此，“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邓小平认为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其他一些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并不伤害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它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增加商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扩大劳动就业，为国家增加税收。这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邓小平在 1979 年 1 月就提出：“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他主张：“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他提出原工商业者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目的就是一个，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得快一点。多种经济成份的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和生产经营的不同，必然会引起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一定程度的分化。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分化。有的人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剥削观念出发，主张应当立即加以取缔，以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比如，安徽省芜湖市有一家个体户叫年广·久，依靠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傻子瓜子”成为百万元户，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有的就主张对这种依靠雇工劳动发财致富的应当加以取缔。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却主张不要“动”他们，看几年再说。他说：“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30 页。

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①]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从大局上来看问题”的指导思想十分重要。第一，雇工经营虽然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是“小小的一点”，在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它不影响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本质。第二，雇工问题要放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个“大局”下来考虑。“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第三，我们不搞两极分化，对于雇工致富的“动还是要动”，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并不是简单地取缔。从这里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邓小平主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包括一部分人依靠雇工经营先富裕起来）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从大局出发，“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

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目的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他强调：“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①]为此，他主张：“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②]邓小平在主张允许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如何帮助生产和生活有困难的人如何“脱贫”的问题。他说：“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③]到 1984 年 10 月，他又指出：“现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也比过去好多了。毕竟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好起来了，国家可以腾出手来帮助少数贫困地方发展起来。中央对此已有部署。不仅是国家，还有那些好起来了的地方也可以帮助，问题不难解决。”[④]实践的发展，证明了邓小平这一论断的正确性。1978 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 2.5 亿，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发展，广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到 1985 年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 1.25 亿。80 年代中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强了对扶贫工作的领导，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工作：对贫困地区制定了优惠政策、大幅度增加资金投入，改革扶贫方式（由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开发式扶贫），使农村贫困人口由 1.25 亿下降到 8000 万人。从 1994 年开始又制定和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目前农村 80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中国大地上消灭绝对贫困。这将使我国在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一大步。从 1986 年开始，政府每年提出的扶贫资金，包括无偿支援和贴息贷款近 100 亿元，如果没有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使我国经济有更快的发展，政府每年要拿出这么多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16—217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1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52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4 页。

的资金集中用于扶贫是难以做到的。同时，由于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东部的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乡镇企业提出了“西进计划”，一些私营工商业家投入了“光彩事业”，积极参与和帮助贫困地区的发展。要是没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大家共同贫困，这也是不可想象的。

第十章
基础产业重点发展论

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以后，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邓小平明确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他说：“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重点”。[①]此后，他也十分关注基础产业的发展，主张通过农业、能源交通、科技教育等基础产业的重点发展来带动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目标的实现。这是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是非平衡发展思想在产业布局上的运用。

一、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在我国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发展中，邓小平最关心、论述最多的是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由农业生产部门的根本特点决定的。农业生产是人们利用土地等生产资料，通过自己的劳动，把自然界的生物等物质转化为人们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部门。它是人类衣食之源和生存之本，是人们能够进行各种活动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②]“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①]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提出并全面论证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作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他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主张“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当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这些思想，对 1962 年至 1965 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曾经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在我国并未获得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业发展缓慢，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邓小平指出：“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开放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是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毛泽东“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

第一，从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来认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他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他说：“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②]“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 页，17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885 页。

[①] 马克思：《货币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63—164 页。

端重要性。第一，人口多对农产品需求大，而耕地少则制约着我国农业更快的发展。特别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即使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条件下，每年还要净增人口 1500—1600 万，而耕地面积却因经济建设占用和沙化的侵蚀等，每年以 700—1000 万亩的速度递减，从而导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正是这个人地矛盾使农业发展经常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制约因素。第二，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使我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要解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全民文化科学素质提高的任务更加艰巨，它又需要依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才能真正解决。第三，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决定着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困难。正如邓小平在说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时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是不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人口贫困的基础上。”正是从我国国情特点出发，他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第二，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来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首先，他从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来考虑农业问题。他说：“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并提出。“2000 年还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他要求要好好计算 2000 年要生产多少粮食，才能满足人们的食用、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其次，他从农村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中的地位来考虑农业问题。他说：“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根据国家计委的研究，我国农村要实现小康，农民人均纯收入至少要达到 1200 元。1992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784 元。如要在 2000 年如期实现小康，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实际需要增长 5.7%以上。目前全国农民收入中有 60%以上来自农业。因此，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是非常紧迫而艰巨的。

第三，从社会政治的稳定来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但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①]从我国几十年经验来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稳定的基础，农业生产的周期波动往往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因素，只有农业的稳定健康发展，才有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我国近几年来通货膨胀，物价持续上涨的状况，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农产品的供给和价格水平已成为影响我国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正如江泽民讲的：农业、“菜篮子”是重中之重。市场物价，每涨一个百分点，五成与农业有关。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关键的关键是稳定农业，稳定粮、棉。油、糖的播种面积、产量和收购量，稳定“菜篮子”。农业是关系全局的大头。[②]同时，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还是直接关系社会政治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八十在农村，如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5 页。

[②] 转引自《经济日报》1994 年 8 月 5 日第五版陈锦华的文章。

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有很大发展，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仍然相对滞后，工农业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有扩大的趋势，由此引发出城乡贫富差距较大、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城乡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一系列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第四，从农业进入新的徘徊时期，强调“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 1979 年农村改革开始到 1984 年，我国农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粮食从 1978 年的 3 亿吨上升到 1984 年的 4 亿多吨，棉花从 217 万吨上升到 626 万吨，油料从 522 万吨上升到 1191 万吨。但是，在几年农业生产大发展的面前，有些人对农业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认力我国已经解决了农业问题，甚至认为中国粮食生产已经“过剩”，从而放松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和领导。邓小平及时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 1986 年 6 月指出：“当前经济情况总的是不错的”，但“是不是有两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其中，“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他粗略估计，到 2000 年，以 12 亿人口每人 800 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 9600 亿斤，每年要增产 100 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现在粮食增长缓慢，已经发生了因粮食不够而养不起猪的情况。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邓小平说：“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他强调：“我们搞宏观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邓小平对新形势下农业出现“新的徘徊”的分析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农业基础的薄弱，即使有几年的大发展，仍然同我们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的特点，如果发生曲折会三五年转不过来，将会影响整个经济发展；人们对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认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农业发展顺利时往往会产生忽视农业、减少投资、降低农业生产水平等倾向。因此，我们在宏观上始终“应该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即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动摇。

正是基于农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他把：“重视发展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向第三世界的朋友介绍。他说：“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这实际上是通俗形象生动的语言深刻地阐明了“重视发展农业”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意义。

二、我国农业现代化要走出一条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

对于我国的农业怎样发展，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7 页。

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①]，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指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第一，我国农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的办法；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是在中国条件下的农业现代化，必须走一条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也不能照抄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邓小平是在总结我国农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探索的。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但是，他也实事求是地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存在“速度大快”的毛病。他指出：“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从这个历史经验教训出发，邓小平主张在我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上，应当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他在1980年5月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正是从农业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道路，即完善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两方面人手，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逐步完成的。其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提出的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的思想；农业和工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思想。

（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思想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生的变化时指出：“这六年来发生的变化，确实比预料的要好。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最根本的是得益于纠正了过去执行的“左”的政策，在总结实践基础上制定了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现状和农民群众意愿的正确政策。这首先表现在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上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人民公社制度。我国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不仅有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发展过快的问题，同时在指导思想还存在着“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求“公”求“纯”，即使退到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仍强调集体生产、集体经营，把自留地、家庭经营往往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在分配上仍然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因而难于充分调动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这种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群众要求的情况，早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就在安徽、四川、贵州等一些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出现了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责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2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页。

任到田”、“五统一”等形式表现出来。据邓小平估计，当时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20%，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主张“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认为：“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当然，也要解决工作中领导中的具体问题。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①]这里邓小平提出了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生产关系采取哪种具体形式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为依据；第二，集体经济和它采取的具体形式不是一回事，两者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巩固集体经济是根本方向，但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采取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群众要求的具体形式。第三，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时，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可惜邓小平的这些正确意见未被当时的中央所采纳，反而将当时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包产到户”等形式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邓小平的正确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当作“修正主义”观点来批判。但是，政治批判并不能取代和取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后来的事实证明，人民公社制度并不能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我国农业的发展很不尽如人意。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安徽、四川等一些地方群众又自发地选择了“包产到户”、“大包干”等经济形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农村改革，四川、安徽两省的领导对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采取了支持态度，在我国农村改革中起了带动作用。邓小平说：“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我国在农村改革中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的政策，并不采取强制推行的办法，而是采取“允许看”的政策，用事实来说话。由于这种责任制是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把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同时在分配上与劳动成果（产量）直接联系，这样就使农民取得了农业生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分配上又打破了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办法，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事实来说话，这是一种说服干部和群众最有力的办法。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三年内就在全国范围获得普遍推广，为我国农业到1984年上一个新台阶奠定了体制制度的基础。对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内外都曾经有人把它看成跟个体私营经济差不多，认为它改变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在采访邓小平时，就曾经认为：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他们把一部分收入交给国家，其余部分归自己。这跟我们的制度差不多。”邓小平则明确回答说：“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这不仅阐明我国制度与美国制度的本质区别，同时也说明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替，并未改变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本质，而是找到了一种更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更能调动群众积极性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

第二，邓小平指出：“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4页。

直接的措施有两条：一是发展饲养业，二是发展林果业。[1]这里提出了农业的产品结构政策问题。过去我国片面强调发展粮食生产，甚至把发展多种经营视为搞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以粮为纲，一切砍光”。邓小平十分重视粮食生产，但是强调“农业要有全面规划。农业翻番首先要增产粮食，当然不能只靠粮食，只靠粮食达不到。”[2]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十分重要。但是农业作为一个大产业，不只是粮食生产，它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种植业中除粮食生产外，还有棉、麻、油料等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翻番要求的是在粮食生产发展基础上的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这是只靠粮食生产无法实现的任务。邓小平对于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意义作了多方面的论述：第一，发展多种经营，才能做到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他说：“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1]第二，发展多种经营，才能加快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他说：“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2]第三，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养猪、养鸡、养鱼、蔬菜生产，“这一方面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能改善城市的副食品供应”。[3]第四，发展多种经营，有利于增加出口创汇。他指出：“香港的水果、蔬菜市场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打开。我们可以建立专门出口鲜活商品的基地，蔬菜、鲜活商品看起来创汇不多，积累起来就多了。”[4]第五，发展多种经营，可以带动一些新产业的发展，譬如发展饲养业必然会带动饲料工业的发展。他指出：“全国都要注意搞饲料加工，要搞几百个现代化的饲料工厂。饲料要作为工业来办，这是个很大的行业。”[5]第六，发展林业。“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这是既有利于当前生产和人民生活，又有利于未来人类发展的伟大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来自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第三，农产品购销体制和农产品价格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一种统购统销体制。由国家统购、派购和按计划价格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几乎包括了农民除自己消费以外的全部剩余产品，允许农民拿到市场出售的产品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过去我国的物价都是由国家来规定。粮食和各种副食品的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邓小平指出：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政策的变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农村商品流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主要是把粮、棉、油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外的部分允许农民自由上市出售；几次提高粮、棉、油及副食品的收购价格，陆续放开了绝大多数农产品的购销价格；鼓励农民

---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 页。

[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1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6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5—316，28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5—316，28 页。

[4]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33 页、12 页。

[5]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33 页、12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2 页。

进入流通领域，允许他们搞长途贩运；大力进行市场建设，为农产品进入市场创造条件。这些政策，促进农民走向市场，使农村商品货币关系很快得到发展，是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发展农业要靠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我国已经逐步摸索并形成了一整套基本的政策体系。除了上面所述的三项政策之外，还包括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实施科技、教育兴农，鼓励科技人员下乡等方面的政策。

农业的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是邓小平农村经济发展思想很有特色的部分。过去人们谈到农业现代化，总是强调机械化、电气化，主要是在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上打主意。邓小平则强调："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②]他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③]邓小平在农业发展中如此强调和看重科学技术，应当说这是既立足于现实需要，又着眼于长远发展的深谋远虑。从现实需要来看，我国农业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进农业更快发展，最本质的就是要使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由传统经验转移到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这体现在农业生产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上。邓小平曾指出："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好意见。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①]在提高粮食产量方面，增加和合理使用肥料、改良品种、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改进管理等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运用。很显然，在我国人多地少条件下，不依靠和运用科学技术，我国是难以实现农业翻番目标的。但是，应当特别指出，邓小平强调农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着眼于当代世界科学革命的新趋势，它可能使农业生产发生根本性的革命，从而克服我国人多地少等不利因素制约，为根本解决我国农业问题开辟新的道路。所以，邓小平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②]在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平息之后，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提出："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从邓小平的这些谈话，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把解决眼前农业发展的问题和最终根本解决农业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之上。这体现了一种站在 20 世纪技术革命的高度来审视经济发展问题的新的发展观。

（二）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的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最中心的内容、农村经济发展最基本的依靠，就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代替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根本变革。但是，有些受"左"的思想禁锢的人，总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集体经济性质对立起来，把它视为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

---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 页。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5 页。

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1]早在 1980 年 5 月，针对有些同志担心农村搞包产到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他还具体指出需要机械化水平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多种经营发展、集体收入增加四个条件。“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2]邓小平的这一段谈话，极其重要。它不仅肯定了包产到户并未改变集体经济的本质，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包产到户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包产到户这种低水平的集体化会向高水平的集体化发展。实现这种发展需要的条件：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其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实现这种转变的方法：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是生产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这是对包产到户性质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更是严格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对其进一步发展作出的科学预言。邓小平的这些思想经过十年改革实践的检验，到 1990 年 3 月，他又提出了我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邓小平的这两个飞跃的思想指出了我国农业长期发展的体制模式依托。他首先肯定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一个“飞跃”，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这同有些受“左”的思想禁锢的人把这种转变看成是“倒退”，是完全相反的判断。一种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向另一种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转变，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不能只从形式上看问题。按过去“左”的思维方式，只有集体经济组织越变越“大”、越变越“公”才是“前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要从本质上看问题，判断一种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变化是前进还是倒退，只能以生产力标准来判断，即看它是否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邓小平对第一次飞跃的内容作过一个简明的概括：“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积极性。”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原来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基础上的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由于它是双层所有（集体拥有基本生产资料、农户家庭也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如小型农业机械、农业生产工具、流动资金等）、双层经营（既有集体经营层次的企业和资产，又把土地承包给各农户分散经营），两者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因此，它能给农业生产力发展以较大的活动空间，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我国不同地

---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4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5—316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5 页。

区、同一地区不同经营单位，同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其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层次的比重不同，家庭经营的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同，就是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向更高水平的集体经济形式过渡，需要生产力更大的发展，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所以邓小平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长期坚持不变”。1992 年初，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又再次强调：“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①]邓小平强调“要长期坚持不变”，不等于不要发展。他也多次谈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然也还有新问题，还需要继续解决。”[②]“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③从十多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农民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经营出现一些新问题，表现出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家庭经营的规模狭小难以形成配套的生产能力：劳动力素质低满足于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生产技术水平低；经营分散、经济实力小不利于机械化和采用先进设备和农业措施；信息不灵，生产盲目性大，难于适应市场经济变化需要等。这些问题是需要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和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解决。中央提出：完善和发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思路是，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主要是加强和更好地发挥统一经营层次的作用，为家庭承包经营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削弱家庭的自主经营权，更不是取消家庭经营层次。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由国家或集体兴办的为分散的农户生产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全过程系列服务的经济组织。通过社会化服务能把千百万分散的小规模生产联系起来，把农产品的分散供给和社会化的大市场联系起来，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同时促进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提高。搞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原则是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做那些农户个人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情，而不是去取代、包办农户自己的事务。要加强统一经营层次的作用，就要发展壮大集体经营层次，发展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要把着眼点放在兴办乡镇企业、开发新的农业资源、开辟的新的生产门路上，以及按承包合同向农户收取提留和承包金。但是，不能老盯着农民承包土地打主意，重复过去“归大堆”、搞“平调”那种削弱甚至取消农民家庭联产承包的作法，重新回到原来那种集体经济旧模式中去。

按照邓小平的思想，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当然不会长久停留在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阶段，它会出现“第二个飞跃”，其特征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就意味着，集体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家庭经营虽然绝对量仍有增长但在双层经营中的比重下降，同时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都在向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逐步克服原有的一家一户从事生产经营的局限性，使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跃进到一个新水平。但是，要实现这个“第二飞跃”，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完成，那就是前面讲到的四个条件，要创造这些条件，从全国范围来讲，需要一个长过程。它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而不是人们主观愿望的结果。它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的过程。“第一个飞跃”阶段，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①]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2 页。

同时，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集体经济，加强集体经营层次作用的过程，就是逐步为实现“第二个飞跃”创造条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集体经济比重大，已成为农民收入主要而稳定的来源，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商品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就会出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目前在苏南、珠江三角洲或一些大城市郊区已出现一些家庭农场或合作农场，或土地转包由“承包大户”经营，就是例证。但是，这只是一种开始的尝试，从全国范围来讲还未具备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实现这种转变是一个长过程。因此，还需要“长期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即使出现这种转变的条件，这种转变也应当是生产本身发展需要引起的群众自愿行动的结果。

（三）农业和工业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思想

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不能在农业经济系统内部封闭的完成，它必然同工业互相联系、互相作用。邓小平在研究我国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时，十分注意农业和工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在谈到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时，他就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相互关系，他说：“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①]在 1962 年谈到如何克服国民经济困难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但是，“恢复农业的另一方面的政策是主业要加强支援农业”。他提出两条：第一，为农业需要服务的工业生产不能削弱，还要改善。第二，工业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减轻农业的负担。[②]1975 年在研究发展工业问题时，他首先强调要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他说：工业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又反过来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一方面是调整国民经济比例结构，大力加强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同时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也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这种农业和工业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在 1984 年至 1988 年上了一个新台阶。邓小平在总结这个时期的经验时曾经用大量事实说明：“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①]

应当特别指出，邓小平的农业和工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思想，除了讲国民经济大系统中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外，还包含有一层新的思想，那就是农村经济中农业和农村工业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过去人们不曾重视的。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7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322 页，326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8—29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6 页。

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②]他认为：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③]他不仅指出，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引起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必然结果，又指出：“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④]按照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实现工业化主要是城市和工业部门的事，农村和农业主要是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原料、资金、劳动力。农业要现代化只能依赖于工业的支援和改造，农业是被排除在工业化概念之外的。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引起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和货币收入的积累，而每个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很小，这就必然会出现在农业生产领域之外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乡镇企业的发展。这样，在我国农村不仅实现农业现代化，同时也开始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而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反过来对农业现代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乡镇工业发展可以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同时也促使农业以先进的技术装备来代替活劳动；乡镇工业发展，城镇人口增加，人们收入提高，要求有更多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能开创一个旺盛的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业商品化的发展；乡镇工业和第三产业有较高的比较利益，通过它积累资金以后，能够用一部分资金来“补农”、“建农”，帮助农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能够增加农用生产资料的供应、促进农产品流通、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和其他服务；在乡镇企业发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建设，能逐步在农村形成现代化的交通通讯、贸易金融、教育科技、信息服务等体系，将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还将促进农村干部和农民文化科学素质和思想素质的提高，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创造精神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互相促进的过程，而且也是农村经济中的农业和农村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相互推动的过程。

根据上述三方面思想的分析，邓小平提出的合乎中国情况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可以概括为：以符合中国生产力状况的两个飞跃的体制模式为制度依托，依靠政策调动积极性和科学技术变革农业生产力为主要动力，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两个层次上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为发展的内外条件，使我国农业全面完成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

三、要加强基础工业，使我们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

邓小平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中，一向是把基础工业和农业一起摆在十分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13—214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2 页。

重要地位，强调要加强基础工业。早在 1963 年研究我国工业发展时，就根据“立足现实，瞻望前途”的指导思想，提出“在一定时期内，我们的工作重点，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当然是低水平）；工业本身必须着力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1]在党的十二大确定到本世纪末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以后，他又明确提出：“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他还说：“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②在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他又提出：“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由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加强基础工业的重视。

邓小平所以把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作为战略重点，要求大力加强，主要是从几个方面考虑：第一，基础工业一直是我国工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1963 年他就指出：“工业本身，首先是基础工业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钢铁两头，采矿和轧钢，都差得很多。有色金属工业很薄弱。机械工业的力量也很差。石油产量只有几百万吨，燃料就靠煤，而煤要上去得多投资、花时间”。[2]到 80 年代末，我国基础工业和 60 年代相比，已有巨大发展和根本变化。用 1963 年和 1989 年数据对比，原煤由 2.17 亿吨提高到 10.54 亿吨；原油由 648 万吨提高到 13764 万吨；发电量由 490 亿千瓦小时提高到 5848 亿千瓦小时；钢由 762 万吨提高到 6159 万吨；成品钢材由 533 万吨提高到 4859 万吨；铁路货运周转量由 1815.95 亿吨公里提高到 10394.18 亿吨公里，公路货运周转量由 64.25 亿吨公里提高到 3374.7 亿吨公里。但是，由于我国整个经济规模更大，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仍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所以，邓小平在谈到经济不能滑坡的时候，指出：“现在主要是我们基础工业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他强调：“这次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要清理一下急需解决哪些问题。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1]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今后十年和‘八五’计划期间经济建设的一个重点。”

第二，对工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国际经验的借鉴。邓小平在 60 年代谈到加强基础工业时，就指出：“许多国家工业发展得快，尖端工业能够较快地上去，都是因为有强大的基础工业。现在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国家，基础工业很差，而尖端工业发展很快的。”[2]在 80 年代，邓小平又不只一次地谈到：有位日本朋友建议“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日本人说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讯上入手，我看有道理。”[3]基础工业无非是能源、原材料工业，交通、通讯、前者为其他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提供动力和“粮食”，后者是投资建设的必要前提条件，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

[1] ③《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335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 页，第 54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12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335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2 页，165 页。

交通和通讯成为沟通各种经济联系和传播信息的桥梁。因此，它们对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着基础作用。基础工业的基础作用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所论证，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的实践所证明，它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

第三，加强基础工业能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扎实可靠的基础，保证经济持续发展、有后劲。邓小平在谈到他“完全赞成”“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时特别提到农业、钢、核电站、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强调“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稳扎稳打。”他在建议制定一个下世纪前50年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为主要内容的发展规划时说：“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基础工业一方面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很重要；另一方面它的建设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利润率低、投资回收慢等特点，因此容易被人们忽视，“我们在这方面老舍不得花钱。”但是，基础工业的落后，如同农业滞后一样，它对国民经济影响的面广，持续的时间长，也是“三五年转不过来”的。因此，邓小平主张必须从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有后劲的角度来认识加强基础工业的重要性。

在认识了基础工业重要性以后，采取什么有力措施来加强基础工业？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意见。

第一，要抓好长远规划。基础工业发展既影响国民经济全局，而又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因此，它发展必须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中安排好。党的十二大确定本世纪的发展战略目标后，他就提出“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的关键又是安排好前十年的能源、交通、原材料、智力等为后十年更加快发展作准备。为了下世纪更长远的发展，他又建议“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基础工业既然事关全局、影响长远，就必须有战略眼光，早作运筹，而不能够临渴掘井。

第二，基础工业建设要抓好项目，特别是骨干项目。基础工业发展要适应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除了已投产项目提高效益外，重点是要上新的项目。邓小平特别强调：“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在抓项目中，邓小平主张：一是要处理好各种项目之间的关系，如基础工业项目和一般项目的关系、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的关系、大的骨干项目和小项目之间的关系，“哪些项目早上，哪些晚上，要有个安排”。在项目之间的资金、材料发生矛盾时，“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①]二是对重大项目，要“准备提前做好建设前的前期工作，这件事要认真落实。要列出进度表，什么时间勘探清楚，什么时间拿出设计，由专人负责包干。”要发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优越性，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

第三，进行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要增加这方面的投资。他说：“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页，307页，193页，54页。

十年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②]至于投资资金的来源，他主张采取中央、地方、社会多渠道筹资的办法。他说：“中央的收入少了，中央对开支也不能包那么多。要把地方上和社会上的钱，转一部分用基础建设。我们只能走这条路。”[③]此外，他特别强调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要大胆引进外资。他说，发展基础工业，“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④]他说：“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过去我国对于外商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限制较多，所以这方面投资发展缓慢。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要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其中包括采取政策措施引导外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领域，这必将促进我国基础工业更快地发展。

四、教育和科学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

邓小平在谈到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要抓的战略重点时，明确提出教育和科学是重点。他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他在谈到四个现代化之间关系时，也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可见，他之所以把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重点，是由于教育和科学也是一种基础产业，它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关键地位。

按照过去的传统观点，人们往往把教育和科学视为不创造物质财富的非生产性事业。但是，邓小平在 1952 年就提出科学研究是一项基本建设，在这方面的投资叫基本建设的投资。这表明他把科学研究看作具有生产性质的基础产业。当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后，教育和科学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地位就更加明确，而且它是处于关键地位的基础产业。教育和科学的这种关键地位，既从教育和科学与农业、能源交通等其他基础产业发展的关系中表现出来，也从教育和科技与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关系中表现出来。

从农业现代化来讲，过去我们曾经简单地把它等同于机械化，后来把它扩大到包括电气化、水利化、化肥化。这四化对农业发展都非常重要，但这主要从劳动资料革命这一角度来解决农业问题。而农业是一个以生物为劳动对象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产业部门，农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劳动资料的改善，更取决于其生物劳动对象的革命及其与自然环境系统适应。所以，邓小平认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①]他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②]他具体解释说：“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6 页，307 页，193 页，54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6 页，307 页，193 页，54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6 页，307 页，193 页，54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 页。

[1]他认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2]"农业问题……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3]我国是一个11亿多人口、农村人口占80%、而人均耕地少的大国。发展农业、解决农业问题走什么道路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我国国情决定农业不能走依靠扩大耕地、增加投入的粗放经营道路，而要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我国农业集约化经营也不能照搬西方某些国家主要采取在同一块土地连续追加资金投入的"资金集约型"道路。我国人均资金短缺，而科技实力在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强的，又处于新的一轮技术革命的高潮中，我国农业应当走"技术集约型"道路。因此，农业"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60年代初的"绿色革命"：墨西哥小麦和菲律宾水稻的育成，对世界农业生产发生巨大影响。墨西哥和菲律宾都由小麦和水稻进口国变成出口国。70年代，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杂交水稻每亩只要一般播种量的1/10（2—3斤），即可获得亩产1000斤以上的产量。方兴未艾的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将引起农业生产一场深刻的革命，为我国农业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了美好的前景。

工业的现代化更直接与科学技术现代化密切相联。从宏观上讲，工业的发展，其结构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升级的过程。从日本经验来看，从轻工业化、重化工业化、加工组装工业化，到高级技术集约化不同发展阶段，都是以社会需求变动为导向，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在当代社会，"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发展。"科学技术的落后，必然导致一个国家工业结构落后和整体发展水平的低下。从微观上来看，"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从市场调研、发展规划、产品开发、设备工艺、生产制造、质量管理、产品包装、市场营销、企业形象，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运用。企业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质量和服务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

科学技术现代化对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影响，邓小平在1975年进行军队整顿时，即提出："科学要走在前面。"他首先从解决军队装备问题上指出："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另外，在"抓战略"问题上，他提出："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这就要求军队干部要掌握现代军事战略，现代军事指挥科学和现代的指挥手段。所以，邓小平提出："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1]后来，邓小平提出"建立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口号，"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这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邓小平把科学技术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地位，必然也高度重视教育的基础产业地位。因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2]因此，邓小平在许多场合都是把科学和教育联系起来讲，结合起来抓的。早在1975

---

[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5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21页，95页，34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21页，95页，34页。

年他在抓科研时，就对科研队伍大为削弱，接不上茬，表示的忧虑。认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③]1977 年复职后，他对“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科技和教育的落后十分关切。他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 20 年。科研人员美国有 120 万，苏联 90 万，我们只有 20 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他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他非常重视日本新兴资产阶级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注意科技和教育的经验，认为“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更好。”他强调：“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①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0—21 页，95 页，34 页。

第十一章
经济“台阶式”发展论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规律的揭示，不仅表现在他主张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企业、个人发展，即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而且还在于他揭示了时间上不同阶段的不平衡发展，即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规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的突破性的贡献，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经济“台阶式”发展论是国内外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

邓小平在1991年8月谈到总结经济工作经验时，提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之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①]1992年1—2月，他又再次提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这就告诉我们波浪式前进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波浪式前进表现为“飞跃——调整——再前进、再飞跃”这样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过程。要抓住时机在一定阶段加速发展，来一个飞跃，使经济发展上一个台阶，但又不是每年按一个固定的百分比直线增长；一段时间高速增长，上一个台阶以后，必然出现经济发展中各种关系的不平衡、不协调，需要放慢速度，进行调整，理顺关系，克服薄弱环节，为再次前进、再次飞跃创造条件做好准备；经过调整、理顺关系后，又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来一个新的飞跃，而不能因为调整、整顿而使经济发展停滞萎缩；经济发展上台阶是需要每隔几年实现一次的周期性过程，而不是不间断地、毫无喘息地进行。因为经济发展是飞跃和调整、不平衡和平衡互相交替的辩证过程。

邓小平提出：“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经济发展要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规律，是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的科学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左”的思想束缚下，总认为生产的周期性波动——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也有周期性波动。因此，在经济的周期波动面前，往往处于盲目、被动的地位，当经济扩张的时机来临时，往往超越客观条件，盲目大上。当经济收缩阶段到来时，又被动调整。粉碎“四人帮”后，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破坏的局面，1977、1978两年在经济工作中提出一些“左”的口号，轻率地发动“洋跃进”，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破坏更加严重。面对这一现实，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为指导，主张立即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邓小平在这次调整一开始就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和平衡不平衡规律来说明调整的必要性和意义。他说：“首先，我们对于被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的我国的经济状况，要有个清醒的估计，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8页。

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看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个阶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他强调：“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这在全国解放初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两次调整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①]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央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挂帅，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并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说明调整和发展的关系。他说：“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调整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他主张做经济工作“要瞻前顾后，看远一点”，调整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安排得低一点，经过调整，理顺关系作好准备，在下一阶段加快发展。他说，如果在下一阶段“我们的速度不能够更快一点，我看交不了帐”。1980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又提出要进一步贯彻调整方针，邓小平强调：这“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其他方面……还要尽可能继续发展”。他说“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只有某些方面退够，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转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次调整与 60 年代初期为克服“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而进行的调整有很大的不同。第一，60 年代的调整，从当时的情况出发，提出“先退够，再前进”的指导思想，大大降低了各项生产指标，缩短整个基本建设规模，减少了 2000 万职工，使国民经济逐步恢复。80 年代初的调整，总的来说是稳步前进，从各个局部来说是有进有退，有上有下。这次调整由于是有退（主要是基本建设、一部分生产条件的不具备的企业、行政费用）有进（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科学教育卫生）的调整，把调整与改革经济体制、整顿现有企业、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结合起来，通过调整使国民经济比例逐步协调、经济工作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造成的影响逐步消除，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的轨道。这就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从 1984 年到、988 年的五年里上了一个新台阶，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大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货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过快，国民收入超分配等。1988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1989 年 11 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在进一步治理整顿中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市场销售疲软、某些企业产品滞销、工业速度回落过猛等。邓小平指出：“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正是自觉地运用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规律、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思想来认识和对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的结果。他在 1989 年 3 月 23 日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曾经有这样一段谈话。他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61 页。

全会到 1988 年底的十年里，“中国有了可喜的成就，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困难，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用两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把错误纠正过来，就能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①]在这里，邓小平已经基本上概括出了经济发展上台阶论的思想，从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的规律来看，上台阶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通货膨胀）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要全国人民思想统一，认真对待，“治理也不难”。通过治理整顿，又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再上新台阶。从这次谈话以后，邓小平多次讲到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的规律，要抓住时机使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特别是 1992 年初南巡重要谈话中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特别是 1984 年至 1988 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经验，得出结论说：“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

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理论，也是邓小平认真思考和借鉴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结果。他在 1991 年 8 月提出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的规律，要求抓住时机上台阶时就指出：“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①]后来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更具体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

从我国和国外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波浪式地前进，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确是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客观规律，邓小平正是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概括提出这一规律的。这一规律的表现形式是邓小平概括的“抓住时机，几年的加速发展——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治理——再继续前进，新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形式可简化为一个公式：“飞跃——调整——再前进，再飞跃……”。经济发展的这种形式，从哲学上来看，这是毛泽东曾经概括的“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是这一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经济领域里的表现。经济发展的飞跃、上台阶，是通过打破原有经济发展中的平衡关系来实现的。但飞跃式地发展以后，又需要建立新的平衡关系才能保证在新的基础上使经济顺利发展，所以需要调整、治理，而通过调整、治理又为新的飞跃、不平衡发展创造条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中的平衡和不平衡互相制约、互相推动的过程，使经济发展逐步上升到一个新阶段。这样一个“飞跃——调整——再前进，再飞跃”的公式，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考察，它是多种经济规律作用的表现和结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在一定阶段出现一次加速发展、一次飞跃、上一个台阶，它是该国经济发展的量的积累、经济政治制度或体制的变迁、国际环境和条件的作用、正确发展战略和政策指导等多种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经过一阶段大发展后需要进行调整，更体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概括前面所述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调整的必要性大体上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由于经济发展的飞跃或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88—289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8—369 页。

需要通过调整，理顺关系，才能为新的飞跃发展创造条件，这种调整可称为结构性调整。第二，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换代规律的要求。经济发展不仅是量的扩张，还要有质的提高、飞跃。这特别表现在适应新的科技革命发展的要求，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从数量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增长，由粗放型增长进入集约型增长，由劳动密集型增长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增长，这就需要有一个调整阶段，才能进入新的飞跃，这种调整可称为质量性的调整。第三，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规律的要求。当代世界经济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普遍趋势。每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都受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调整，往往是受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规律的作用：如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世界市场的变化和波动等，也需要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进行调整，才能使本国经济有新的发展和飞跃。这种调整可称为适应性的调整。这三种调整，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可能各有重点，但有时又可能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总是需要有一定时期的调整，才能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不仅反映了事物发展平衡不平衡规律和要求，而且是在概括我国和战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总结。

二、经济“台阶式”发展的条件分析

经济发展波浪式地前进、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证明了的客观规律，但是，这不等于说各国经济会自动地飞跃和上台阶。因为经济规律总是同人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离开人们的活动，就不存在经济规律。因此，经济发展波浪式地前进，也是人们经济活动的结果。问题在于是盲目地进行经济活动，受波浪式前进规律的自发支配，还是自觉地遵循和利用这一规律，指导经济有目的的发展，促进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做到后者，就需要研究利用经济波浪式前进规律的条件和怎样促进经济上台阶。在这方面，邓小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思想。

（一）要善于抓住时机，促进经济发展上台阶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强调要“抓住机遇”。他对我国的发展总是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他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邓小平不仅强调我国要抓住机遇发展经济，有时也劝告其他发展中国家注意这一点。他说：“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在 90 年代初，邓小平总是反复告诫我们：“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中国面临大发展的机遇”，“机会难得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机遇？机遇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态势和内外条件。所谓抓住机遇就要抓住经济发展的客观态势和有利的内外条件，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来促进经济发展。抓住机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虽然有好的机遇，但是人们没有认识它，或虽有所认识，但未能采取

正确的政策措施来加以利用，经济也不会有大的发展。经济发展机遇的出现，第一，是经济发展波浪式地前进规律的表现。经济发展波浪式地前进表现为经济发展由扩张到收缩再由收缩到扩张的周期性波动。所谓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是经济发展自动进入扩张阶段，当经济周期波动中的扩张阶段到来时，是否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住这一态势，并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这就是抓住机遇的问题。第二，经济发展机遇也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邓小平在 1992 年初谈到我国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时，就强调：“ 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 ”。所谓机遇实际上也就是一定阶段出现的对经济发展有利的国内和国际条件。这种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稍纵即逝。所以，邓小平强调“ 机会难得 ”，担心“ 丧失机会 ”。

在经济发展的机遇到来，即经济发展的扩张阶段到来和国内外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如何抓住和利用机遇是个大问题。这里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不认识和不善于利用机遇，而坐失良机。如 60 年代中期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已取得重大成效，国际上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我国却发动“ 文化大革命 ”，集中抓“ 阶级斗争 ”，而丧失了一次经济发展的机遇，拉大了我国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邓小平对我国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这次经济调整，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中的飞跃和稳定的关系。他说：“ 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 ”。他说：“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第二种态度是经济发展的机遇到来时，超越客观条件的可能，过高过快地盲目推进，导致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不仅不能使经济发展上台阶，而且伤害了整个发展的机体和机制。如 1958 年的“ 大跃进 ”和 70 年代末的“ 样跃进 ”。所以，邓小平在谈到“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时，又强调：“ 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第三种态度是根据客观经济条件和经济发展规律，提出适当的目标和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上一个台阶。这种情况的实例有我国 50 代中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 1984—1988 年五年的飞跃发展。

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上一个台阶，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必须注意几点：（1）要正确分析形势，善于把握机遇。1989 年至 1990 年国际形势由于苏联东欧的剧变，很多人把国际形势看成一片漆黑，看不到我国发展的机遇。邓小平不同意这种悲观的观点，指出：“ 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他强调：“ 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机遇 ”。对国内形势，他也强调要正确分析。他说：“ 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 ”，就会丧失时机。（2）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他说：“ 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他强调：“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3）“ 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 ”。他认为在抓住机遇发展经济时，必须要有大的措施，对此应当根据条件及时决策。他特别强调“ 上海开发晚了 ”！“ 回过头来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

面，都会不一样”。所以，在新的一轮经济发展上台阶的努力中，他把抓上海开发浦东作为一个大的战略措施坚持不懈地抓下去。（4）不搞争论，争取时间干。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论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他主张对政策有不同意见，可以允许看，最后拿事实说话，正确的政策最终会被人们普遍接受的。（5）要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邓小平在谈到抓住时机使经济上一个台阶时，强调要解决“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问题”。他说：“1975 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

（二）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邓小平在论述如何抓住时机使经济发展上台阶时，强调：“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得出来的结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确定了战略目标，“从何处着手呢？”他强调“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他认为只有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是对 1984 年至 1988 年经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邓小平在概括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进程时说：1981、1982、1983 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 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 1984 年至 1988 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互相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过程”。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改革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相互促进。所以，邓小平强调：“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这是一条最根本的经验。

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这也是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邓小平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发展不光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的规律表现为经济发展会出现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的周期可分为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正如我国有的学者研究指出的：从 1953 年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起，到 1994 年的 42 年中，共经历了 9 个短周期，大体上平均 5 年左右一个短周期。两个短周期组合为大约 10 年左右的中周期，如 1953—1962 年、1959—1976 年、1982—1990 年。认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符合大体上 10 年左右的这种中周

期”。[1]邓小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这不仅是着眼于短期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从改革开放对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发展打基础考虑的。按照邓小平的估计，“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样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就有了更加完善成熟的制度和政策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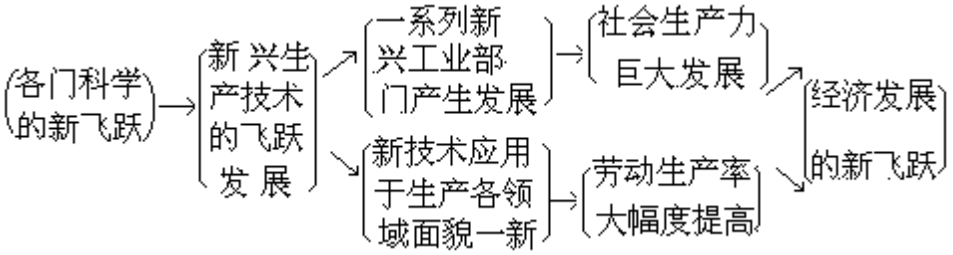
（三）依靠科技和教育，经济发展才能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

经济发展要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主要依靠什么？邓小平明确回答：“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依靠科技和教育来加快经济发展，争取上新台阶，这既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层次把握，也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把科技和教育放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地位，这是邓小平基于 20 世纪后期世界发展特征的深刻把握而形成的新发展观。从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变来看，国外许多理论家主要强调货币资本的积累、物质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的作用；在我国，除了这些之外，过去曾经特别强调我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干劲）这样的优势。应该承认，这些东西仍然是经济发展的要素。但是，在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已经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了。邓小平对 20 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是这样认识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 30 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我们之所以不顾文字的冗长来引述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清楚了经济发展要上新台阶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道理。这段话对于当代世界科技革命与经济飞跃发展之间的关系是这样来把握的。

---

[1] 李京文，刘树成：《积极驾驭和主动利用经济周期波动——学习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 年第 1 期。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87 页。



邓小平关于怎样抓住时机使经济发展上台阶的思想包含丰富的内容：抓住时机是前提，这是对经济发展周期的准确把握和利用；坚持改革开放是动力，为经济发展上台阶提供制度保证；依靠科技教育是关键，是实现经济发展上台阶的基本手段。这三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总的都体现邓小平主张的抓住时机使经济发展上台阶，与 1958 年组织“大跃进”的本质区别：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正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条件的科学分析，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①]

三、对毛泽东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思想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时，就曾指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在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他又进一步提出矛盾诸方面的统一、平衡等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显现的面貌，而统一体的分解。平衡状态的破坏，都是事物质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他强调“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1956 年 11 月 15 日，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提出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强调：根本还是促进的。

1958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讲了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结论提纲里曾作这样的概括：“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还写到“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相对的”。经过 1958 年的“大跃进”以后，1959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结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又从工作方法的高度作了长篇讲话，其中提出了“波浪式”问题。[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7 页。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 648—649 页，832 页。

他从哲学的高度说明：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是运动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主张 1960 年经济增长指标稍微再低一些，1961 年再来一个大跃进。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前进，反对反冒进”。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又谈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从上面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作为一个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已经从正确分析事物发展中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得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结论，并运用这个观点来研究我国和苏联等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得出社会主义生产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规律性的认识。但是，毛泽东在从哲学高度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生产波浪式地前进的规律的同时，在经济实践中运用这一规律时则是为其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这些错误决策服务的。1958 年运用这规律来批评反冒进，只强调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而把主张平衡，反对实际存在的冒进，视为右倾保守，这实际上就改变了党的八大提出的在综合平衡中稳定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把它说成是右倾保守，压制群众积极性，为组织大跃进开辟道路。1959 年以后提出“波浪式地前进”规律是大跃进中开始感到指标过高，意识到大跃进“不能天天搞高潮”，但主张降低速度后，过一年来一次“大跃进”。两次谈话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通过“波浪式地前进”，“不平衡发展”来为“大跃进”提供理论根据，而忽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所要求的综合平衡。同时，对“不平衡发展”的理解也存在简单化绝对化趋向，反对反冒进，实际上把“冒进”等同于不平衡发展。这实际上是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结果造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的：“大跃进是不正确的”。“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曾经提出：“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 1958 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应当说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这种“波浪式地前进”的思想，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问题在于“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这个规律在经济建设中的运用时，“不平衡”发展，或者说飞跃、跃进，它本身是否应该有个“度”的问题，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不是任何程度的跃进都是正确的，不存在着发展中超过客观的“度”——冒进的问题。毛泽东当时反对反冒进，把反冒进等同于反对“不平衡发展”，结果导致 1958 年的高指标、浮夸虚报风，“放卫星”。同时，根本忽视国民经济发展中需要的相对平衡，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破坏，最后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困难。

邓小平提出的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继承主要体现在从认识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上，坚持唯物辩证法，肯定经济发展波浪式地前进的规律，认为经济发展是“飞跃——治理或调整——再飞跃”，也就是一个从不平衡到平衡到新的不平衡的过程。发展，主要体现他纠正了毛泽东简单地用哲学规律来回答和解决经济问题，忽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左”的偏向。第一，他主张的不平

衡发展、飞跃，不是脱离经济发展客观条件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而是强调“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具体体现在发展目标和部署上都同“大跃进”有本质区别。第二，他主张的飞跃，上台阶，并不忽视平衡发展的要求，而是主张发展一段后，就应当“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而且强调这种治理、调整，应当是“自觉的，清醒的调整”，而不是在飞跃时不顾比例协调，待到导致经济严重困难时才来进行被动的被迫的调整。第三，他主张的飞跃、上台阶在方法上强调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而不是 1958 年“大跃进”式的违背客观规律的蛮干。第四，两种不同的“波浪式前进”、“不平衡发展”，在实践上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正如邓小平所说，1984—1988 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它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飞跃奠定了更强大的基础，同时，也为我国今后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提供了新鲜经验。

第十二章
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统一论

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去长期受着“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脱离国情国力，急于求成，把建设规模搞得过大，发展速度过快，造成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反而延缓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何走出一条新路，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十分关注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探索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适度发展理论，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贪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从 1957 年下半年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 30 多年里，我国在经济建设上也发生“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急于求成，盲目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结果反而是欲速则不达。在这 30 多年里，我国有过三次大的教训。第一次是 1958 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经济发展上，搞“以钢为纲”，追求高指标，高积累，断断续续地延续了三年。结果打乱了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使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导致我国国民经济从 1959 年至 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第二次发生在“文革”期间，政治动乱是造成经济建设遭受挫折的最根本原因，但是，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失误，也是造成经济建设的效益很差和国民经济比例越来越严重失调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生产建设中，片面强调为战备服务，不适当地把过多的财力和物力用于国防建设和加强战备方面。同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超过客观可能，提出了过高的指标，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挤了人民的正常消费：第三次发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主要表现仍然是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存在急于求成和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倾向。1978 年初制订的 1976 年到 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超过我国国力的可能，要求在以后的 8 年时间里用相当于过去 28 年基本建设投资的总额，新建和续建 120 个大型建设工程，使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已经失调的状况更加严重。邓小平曾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这种状况作过总结概括。他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到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①]。他深刻地揭示了我国过去在经济建设上“左”的错误的危害。他指出：“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大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②]他说，我们在 1949 年取得全国政权以后，解放了生产力。“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5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406—407 页。

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3]一方面是急于求成，犯了性急的错误，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是“左”倾的错误政策，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关系。“‘左’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很慢。”[1]但是，应明确指出，邓小平主张纠正在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并不等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慢慢吞吞地发展。在 1979 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时，他就提出：调整是为了“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2]他在 1980 年总结建国 30 年的经验时指出：“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他说：“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③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提出争取“比较快的发展”，到 90 年代初提出经济发展速度滑坡问题“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这表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始终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邓小平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纠正过去“左”的错误，是纠正对经济发展速度“离开现实”的过高过快的要求和超越阶段”的“左”的政策。只有纠正这些“左”的错误才能更快更好的发展。

邓小平之所以一贯主张要争取“比较快的发展”，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提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要争取“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根本在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济发展速度重大意义的深刻认识。第一，邓小平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来认识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的。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批评过去“左”的错误和“四人帮”“宁肯要穷社会主义”的谬论，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2]从 1957 年下半年开始到 1977 年，差不多 20 年时间里，我国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生活还是贫困。邓小平尖锐地提出“我们于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3]所以，他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总结我国的历史教训，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大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

---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7 页。

[1]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5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97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2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51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11 页。

越性呢？[④]”邓小平这些论述，从根本上彻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主张搞社会主义，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能够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再加上消除剥削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它能使人民更快地摆脱贫穷、走向富裕。如果社会主义仍然使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样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这种状况，“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他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①]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使人民能够尽快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经济。

第二，邓小平是从保证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来关注经济发展速度的。邓小平对于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做到心中有数。”[②]这个“数”.就体现在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把握上。1982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8%左右，大大超过原计划的 4%。他就及时指出：“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党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以后，邓小平一直关注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实”？到 1984 年 7 月，他作判断说：我国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了五年半，发展得不错，速度超过了预期。这样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③]他说：“我在同外国人谈话时，讲了一句大胆的话：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这个话，我过去是不敢讲的，只是讲翻两番有可能实现，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为什么这时敢讲“肯定能够实现”呢？主要是根据“六五”计划前三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接近 8%，超过原预计前十年平均增长 6.5%的速度。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他认为：“如果按照决定所制定的方针走下去，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加快。”[④]因此，他对实现本世纪的战略目标满怀信心。邓小平正是从实现战略目标出发，经常提醒注意解决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例如，1986 年 6 月，他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提出要注意解决粮食增长缓慢、外汇短缺、政治体制改革这三个问题，认为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在 1988 年 9 月，在进行治理整顿时，他又说：“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①]在 1989 年 6 月，当时的政治风波平息以后，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谈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强调要抓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1990 年 3 月，又提出：“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26 页，66 页，9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26 页，66 页，95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26 页，66 页，9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7、355 页。

两番能不能实现”，是长期“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大问题。[②]从这些论述可能看出，邓小平始终把经济发展速度作为保证实现战略目标的一个关键问题来抓。

第三，邓小平是着眼于国际经济的比较和竞争来强调经济发展速度的。邓小平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他主张放眼世界，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发展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人们谈论“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加快发展，对人类作更大的贡献是我们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要从世界的发展，看到对我国加快发展的压力。他指出：“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③]他不仅强调我们要对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有紧迫感，而且也要非常重视我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比较和竞争。他说：“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因此，他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如果长期保持4%、5%的速度，“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①]

二、“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的适度发展思想

邓小平十分重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但是，他深刻地吸取我国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两方面的教训：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其困难的教训和20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历史教训。因此，他在速度问题的把握上，始终注意问题的两个方面，防止发生两种偏向。

1983年1月，针对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4%）增长一倍的情况，提出：“总结历史经验，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根深刻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注意。现在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②]

1984年6月，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说：“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③]

1985年9月，谈到“七五”计划规定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时，他说：“7%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④]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35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0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65、143、26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65、143、26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65、143、268页。

1988 年 6 月，在谈到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时，提出：“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⑤

1989 年 6 月，在平息政治风波以后，他提出：“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像过去想的那么高。”①

1992 年 1 月，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时，也同时指明：“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②

从上面列举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到：邓小平记取了两方面的历史教训，一贯主张我国经济应当“力争”、“积极争取”发展得快一点，但又反对追求不切实际的过高的速度。这个思想集中起来，就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就提出来的一个目标：“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要重犯 1958 年的错误。”③

怎样在经济工作中既要发展得快点，又不重犯 1958 年追求不切实际的过高的速度的错误？这里有一个经济速度的合理的“度”问题。对此，邓小平提出“适宜的速度”、“适当的发展速度”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随便说的，而在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之后，在制订“七五”计划时经过我们党认真研究提出来的。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一直面临着一个如何恰当地安排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1979 年开始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 1980 年至 198J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安排，曾经发生 6%还是 8%的争论。邓小平认为，为了今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增长 6%也可以。但是，如果到 1982 年、1983 年，我们的速度不能够快一点，“我看交不了帐”。在 1982 年 5 月，邓小平在谈到我国“六五”、“七五”计划的设想时说：“五年至十年以内，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每年增长 4%，达到 5%就了不起了，我们希望下一个十年也就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高一些。”1983 年 1 月，当发现 1982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8%左右，大大超过了原定增长 4%的计划时，邓小平及时指出：“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1984 年 10 月，邓小平在谈到经济发展速度与翻两番的关系时说：“过去说，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 6.8%，二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 7.2%，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看我们前十年的势头可能超过 7.2%，因为前三年已经接近 8%了。”由此他得出结论：“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1985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我们党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七五”时期内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在 7%左右。邓小平肯定：“7%的速度并不低。”认为“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他对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确定的发展速度作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是“总结过去七年的经验，为我国经济发展确定一个适宜的速度，并通过‘七五’计划，为中

---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65、143、268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12、37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12、37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56 页。

国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创造条件。”[1]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适宜的速度”的概念。当时为什么把 7%的速度认为是“适宜的速度”？因为当时我国已经完成了 1980 年提出的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解决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任务，基本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六五”期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有把握达到 10%。但是从 1984 年和 1985 年 1 月至 7 月，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4%、22.8%。邓小平谈到工业增长速度太快时说：“听起来可喜，但有不健康的因素。”[2]所以，我们制订“七五”计划，经过对经济发展速度进行各方案的测算，按照“既是积极的，又是留有余地的”原则，把当时已经偏高的增长速度降低一些，规定“七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7%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7%左右，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7%和 6%。当时把这样的速度视为“转入正常的速度。”[1]

邓小平在谈到“七五”计划时提出“适宜的速度”之后，以后又多次提出“适当的发展速度”的概念。什么叫“适宜的速度”或“适当的速度”呢？根据邓小平多次论述，可概括为两点：

第一，适当的速度是从实际出发的切实可靠的速度。他一方面讲：“治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同时，又提出：“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2]

第二，适当的速度是能确保翻两番战略目标实现的速度。他说：“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要按 1980 年的固定价格，没有水分的，还要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计算在内。”[3]

这两点集中起来看，适当的速度就是既能保证实现战略目标需要，又有客观实际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

还需要指出：邓小平主张的适当的发展速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当结合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条件来理解。第一，他主张对发展速度的安排，要瞻前顾后，根据不同时期的条件，要有不同的要求。他在 1979 年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时，主张 1980 年。1981 年两年的速度可以低一点，以便为后面的发展准备条件。但是“如果到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我们的速度不能够更快一点，我看交不了帐。”在 1982 年谈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时说：今后十年经济发展不会太快，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大多，各种比例失调。五年至十年以内，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每年增长 4%，达到 5%就了不起了。我们希望下一个十年也就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高些。第二，他主张经济的适度发展，还应当根据不同地方的发展条件来安排，有条件的地方要发展得更快一点。在 1988 年在谈到在治理整顿中“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时，就明确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

---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50 页。

[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册），第 976 页。

[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册），第 981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88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4 页。

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在 1992 年初提出抓住时机，发展经济时，更明确地提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得快点”。对广东、江苏、上海等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就提出了更快发展的要求。

三、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速度与比例、质量、效益的统一

邓小平主张：“既要搞得快点，又不要重犯 1958 年的错误”，除了强调发展速度要适当，不要追求过高的速度以外，还提出注意处理好发展速度与比例协调、质量、效益等方面的关系。

第一，速度和比例的关系。他在 1979 年 3 月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因此，主张我们的经济“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平衡。”“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他认为这是“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在 1979、1980 年都坚定地主张要贯彻调整方针。1984 年第四季度到 1985 年发展速度较快、带来一些问题，他主张“要调整一下，收缩一下”。[①]后来，他进一步把经济在快速发展之后，用一段时间选行治理调整，然后继续前进视为一种规律性的东西。他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但是，他强调：“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①]他认为：“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②]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速度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关系的思想是全面的。比例协调是加快发展速度的前提，没有比例协调就没有确实可靠的发展速度：但是比例协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比例协调是为发展速度服务的，不能过分强调比例协调而丧失时机，影响经济发展。

第二，速度与质量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是反映经济实际增长程度的指标，它必须以产品合格对路为前提。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时，总是强调应当是扎扎实实的、产品讲求质量的速度。他说：“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数字就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问题，有产品不对路、质量很差的问题。知道这点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有好处。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③]1985 年 9 月，在谈到“七五”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时，又强调“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④]1992 年初，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时，提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4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7、36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7、36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97—198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3 页。

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把讲求质量作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和保证，并且把它与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联系起来”因此，他强调在抓经济发展速度时，“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首先抓好质量，就是要把质量放在经济发展的第一位。这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早在 1975 年，他在抓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整顿时，就提“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抓好产品质量。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产品质量也包括品种、规格在内。他认为：“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在一定意义上说，质量好就等于数量多。质量好了，才能打开出口渠道或者扩大出口。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他认为：“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在第一位。乡镇企业也要抓质量。”对于如何解决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第一，他首先强调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他说：“说产品质量大多数是好的，这不解决问题，有时恰恰在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里面，关键产品、关键零部件出了问题。”第二，要建立规章制度。“没有必要的责任制度，质量难于保证。”第三，要“把科研工作抓紧”，好多产品是由于技术没有过关而不能正常生产。第四，“要提高质量，就必须改革。”第五，“要立些法，要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第六，“质量问题虽然经常提，但现在只是一般地提不行，要突出地提，切实地抓”。从邓小平对解决质量问题的途径的思考之全面和深刻，我们可以看到质量问题在他心目中的“第一”地位。

第三，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经济增长时说：“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①]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②]过去一般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表现在经济比资本主义制度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上。邓小平在这里则把经济发展的效果（即经济效

益）与经济发展速度并提，把它们同时作为优越性的首要体现，足见其对经济效益问题的重视。经济发展速度是经济发展的数量表现，经济效益是经济发展的质量指标，质和量两方面是统一的。但是，数量必须在一定质量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片面追求高积累、高速度，实际结果却是低增长、低效益。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又面临着人口过多而资源有限的制约，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来发展国民经济。正是鉴于过去的历史的教训和现实发展的需要，所以，邓小平在谈到经济增长速度时，总是强调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①]“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②]即使在 1992 年南巡重要谈话，他主张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时，也强调：“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9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51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143、37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143、375 页。

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③]

总的来看，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优越性和我国的现实需要出发是主张尽可能发展得快一点。但是这种快一点，不同于过去“左”的错误的急于求成，脱离客观实际和违背客观规律去追求过高的速度，而是既要能保证实现战略目标，又符合我国客观实际条件的“适度发展”。这种尽可能快一点的“适度发展”，是与比例协调、注重质量、提高效益相统一的，并以它们为保证和制约的扎扎实实的速度。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143、375 页。

第十三章
“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论

邓小平非常重视经济发展速度，经常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他说：“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①]他的经济“台阶式”发展论的核心，就是“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从 1990 年 3 月 3 日《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提出“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要善于把握”开始，到 1992 年初南巡重要谈话，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最后 8 篇文章中，有 5 篇文章都强调和论述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并明确指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他认为：“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伺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这表明“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既是经济“台阶式”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又是“总设计师”面对 90 年代中国经济加快发展迫切性和有利条件的战略设计，它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根据我们的学习理解可以归纳为四句话：从政治角度看问题，指出加快发展的紧迫性；从形势分析找条件，判定中国面临大发展的好机遇；从总结经验找规律，运用非平衡发展规律，为加快发展提供理论根据；用战略眼光定措施，选择带动全局发展的具体措施。

一、从政治角度来看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发展速度，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强调加快经济发展的紧迫性

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分关心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就像当年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关心每年消灭敌人军队数量一样总是经常计算分析，做到“心中有数”。但是，他在不同时期，对发展速度的认识是有变化的。他曾经认为“七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百分之七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①]1989 年 3 月还提出：“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他曾经认为 1984 年第 4 季度到 1985 年的发展是“超高速”。1989 年又讲到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后，“再往后五十年，要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点几就够了”。[②]在这次《邓选》编辑整理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审阅原稿时认为这两个地方不妥当，分别加以修改或删去。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对发展速度的认识有新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 1990 年 3 月 3 日《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重要谈话中，他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6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3 页。

[②] 《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 年 6 月 9 日）。1989 年 6 月 27 日新华社电讯稿。

坡”。他明确指出：“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有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相比，也叫滑坡了。”他还要求认真计算“年增长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他强调经济发展速度滑坡，“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认为这是“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大问题”。正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他提出了加快发展的要求。他在 1992 年初南巡重要谈话中提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邓小平把经济发展问题看成是使我们真正睡不党的政治问题，并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概念来考虑问题，而是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第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来自国际的挑战。“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第二，总结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第三，顶住西方强权政治和“和平演变”压力的需要。“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第四，经济发展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第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最根本的因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小平同志还从反面尖锐地告诫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列宁曾经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能从政治上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邓小平说，他在经济问题上讲的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他曾经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称为“我们的政治路线”，把到本世纪末要实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称为“一个政治目标”。在这里，他又从现实的政治关系分析，把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来认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提出的加快发展的严重意义和紧迫性。

二、科学地分析国内外形势，透过眼前的迷雾，判定中国面临大发展的好机遇

在邓小平提出“抓住时机，加快发展”之前，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方面，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1989 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解决了原有的矛盾，但出现市场疲软、经济滑坡；1989 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大暴露；在国际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苏联逐步走向解体；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对我国进行“制裁”，在政治上加强对我国“和平演变”的压力。在当时的中国面前，似乎是困难重重、云遮雾障。有些人对我国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有的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把“和平演变”看成为现实的主要危险，似乎应当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反和平演变”。同时，惟恐“经济过热”，过分强调“稳”，经济发展迈不开步子。

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对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他在1990年3月指出：对国际形势“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

对于国际形势，邓小平的分析是：“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是在向多级发展，中国也算一极。在这种世界格局大变动中，“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利用好这些矛盾，就是我们发展的有利条件、就是机遇，他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机会难得呀”，“问题要善于把握。”几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邓小平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第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的终结，可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为我国经济建设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第二，苏联解体，我国与俄罗斯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基本上解除了来自北方西北方向对我国的军事威胁。与此相联系，中印、中越关系改善，阿富汗和柬埔寨战争结束，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使我国取得了近百年来未曾有过的良好的周边环境。第三，两极格局结束后，过去长期在两极格局掩盖下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甚至发生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这些冲突和战争对西方国家牵制大，而对我国影响小。加上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矛盾和经济磨擦，使他们在短期内难以把矛头集中对付我国。第四，世界新技术革命进程加快，许多国家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西方国家从90年代开始先后进入经济衰退，而亚大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势头最强劲的地区，这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邓小平还指出我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了很多贡献。

从国内形势看，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三年多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使经济生活暴露出来的许多矛盾基本得到解决，为加快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重新实现和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经济发展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特别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成长为全国加快发展树立了榜样。

正是根据以上情况，邓小平在1990年底作出判断说：“这一年的成绩不可低估，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于是，他鲜明地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1992年初南巡重要谈话号召我们：“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993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又强调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

三、总结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运用经济非平衡增长的规律，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

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发展的资源（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短缺，经常陷入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所说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一个国家穷是因为它穷”）的怪圈。为了突破这种“怪圈”，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都曾经提出过“平衡发展”和“非平衡发展”这两

理论和两种战略。所谓“平衡发展”和“非平衡发展”，实质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有限资源如何在产业、地区间配置和发展时间阶段的划分问题。两种理论的论争和实践的比较，人们倾向于把两者结合起来，把平衡发展作为目标，非平衡发展作为手段，通过一定阶段的非平衡发展达到最后的平衡发展。邓小平在解决我国如何加快发展时，认真研究和总结概括了国外一些国家经济起飞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平衡发展”和“非平衡发展”理论有多方面的创新，为加快发展直接提供理论指导。

第一，首先是总结国内国际经验，提出经济“台阶式”发展论，认为它是规律，为我们加快发展直接提供依据。他在 1991 年 8 月《总结经验，使用人才》一文中，谈到总结经验的重点时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这是他科学地总结国内国际经验而得出的结论。经过 1980 年至 1983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在 1984 年至 1988 年五年内上了一个台阶，提前实现第一步发展战略目标。由此得出结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他认真地研究了国外一些国家经济起飞的经验，得出结论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在分析当前国内和国际条件，并考虑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明确作出判断：“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正是以这种对客观规律和发展条件的科学认识为依据，他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这个“经济发展台阶”论不仅对我国加快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经济发展理论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他根据战后一些落后国家和我国经济起飞的实践，打破了国际上影响广泛的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理论模式”。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可分为：传统社会、为经济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认为一国经济在“起飞”之后的三个阶段就会自动地“持续增长”。罗斯托的“成长阶段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启示作用在于，他提出要经过准备条件才能“起飞”，“起飞”本身需要一定条件（总要有 20%以上的积累率、要有主导产业带动、需要有适应起飞的制度变革）。但是，他把准备条件、起飞和持续增长三阶段机械地割裂开来，他把经济发展看成一个似乎像飞机飞行一样，经过准备条件，通过起飞过程冲破最大阻力，直入蓝天，就可在天空持续飞行——实现持续增长。战后日本等国经济发展成功运行的轨迹，并非像罗斯托描述的“准备条件——起飞——持续增长”的“三段式”，而是邓小平揭示的“准备条件——跳一个台阶——‘调整一下’（准备条件）——再跳一个台阶”这种“跳台阶式”的发展方式。日本战后从经济严重破坏的落后国家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过程是通过若干高速度发展阶段来实现的，在两个高速发展阶段之间，有一个调整和准备条件的过程。

同时，也需要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跳台阶式”的波浪式地前进规律，与我国在历史上曾提出的波浪式发展规律有本质的区别。第一，我国在

1958—1959 年组织“大跃进”期间，曾经鼓吹“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大跃进”失败后，被迫进行全面调整，为了说明“调整”的合理性，才提出“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规律”。当时提出这一“规律”是以“大跃进”的合理性为前提，与其说是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揭示，不如说是对“对跃进”的消极辩护，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台阶”论，则是针对我国市场疲软、经济滑坡的局面，通过对客观规律的揭示，指导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积极的科学指导。第二，邓小平同志讲的跳台阶式的波浪式地发展，与过去那种与“大跃进”相联系的“波浪式地发展”在内容上有着本质区别。邓小平在总结我国 1984 至 1988 年上一个台阶时指出：“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是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这就是说，邓小平讲的跳上一个台阶，是按照社会经济规律办事，依靠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来实现的，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所以需要“治理整顿来调整一下”，但是在上台阶中，经济机体、经济机制、经济结构是趋向于优化，而不是朝恶化方向发展。而“大跃进”时期那种波浪式地进入“波峰”，则是由于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必然造成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和结构的破坏。

第二，邓小平在产业发展上，主张在综合平衡基础上非平衡的有重点的发展的方针。他明确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①]根据这种“基础产业重点发展”论，在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平息以后，他在提出“经济不能滑坡”时就指出：“现在主要是我们基础工业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为了“要在今后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他“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同时提出：“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①]他强调在“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②]在基础工业和农业重点发展中，主张搞骨干项目，他提出“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他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主要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经济发展要有重点，要有主导产业以带动全局发展，西方经济学家罗斯托、赫希曼等都有论述，但他们都是从一定时期主导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产业之间的关联作用来考察的。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的“经济发展重点论”，其理论贡献则侧重于从战略上来考虑问题，主张产业重点发展主要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发展后劲的增强。

第三，他根据“先富带后富，加快发展”论的思想，从我国是一个地区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12—313 页，30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12—313 页，307 页。

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差异极大的大国这一现实出发，主张在加快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在现阶段全国经济发展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过程中，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 20 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他明确提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①]因为我国的发展资源有限而各地区发展条件的差异极大，用平均主义的方法来分配资源，既损害了有条件地区的发展，也不能根本解决发展条件差的地区的问题，结果只能是共同贫困，对全局的发展不利。他强调“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②]同时，实行地区之间的非平衡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他解释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③]因此，从总体看，他强调“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④]

邓小平同志“提倡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同时，又强调要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要避免搞两极分化。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同志充分估计了地区之间两极分化的严重政治后果，前苏联解体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如何做到既“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又“避免两极分化”呢？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分两阶段解决问题的设想：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以前，作为第一阶段，提倡沿海帮助内地。他说：“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的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大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⑤]在这个阶段，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第二阶段，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把共同致富作为“中心议题”，“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税利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①]

“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实质上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也是长期困扰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的重大问题之一。他们往往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强调的重点不同，但是由于制度限制，他们不可能根本解决地区发展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出发来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社会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7—278，111，166，364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7—278，111，166，364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7—278，111，166，364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7—278，111，166，364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4 页。

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考虑这个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当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个大局，即要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同时，也只有全国社会生产力提高到相当水平才有可能缩小和消灭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别。第二，承认“效率优先”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必然造成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就必须把地区之间的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避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因此，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必须：‘兼顾公平”。第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是解决地区差别问题的物质基础。在生产力充分发展以后，就必须解决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四，“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和各地“共同富裕”之间是辩证关系。“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四、“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

邓小平主张的加快发展是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他在 1992 年南巡重要谈话中提出“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的要求。既要速度比较快、又要效益比较好，根本之点在于“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毛泽东曾经用桥和船的关系来比喻任务目标和实现任务目标的方法措施之间的关系，任务目标设想得再好，没有正确方法措施，任务目标也只是一句空话。

根据邓小平 1992 年春南巡重要谈话提出的“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的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用宏观战略眼光分析问题，为加快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

（1）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并要求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接着，1993 年 9 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党中央专门作出了学习决定。学好这一理论，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措施，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南巡谈话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学习，为我国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科学论断、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所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和系统化，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制定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 1994 年在全国进行财税、金融、投资、外贸四项体制改革，同时开展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的逐步推进，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和体制保证。

（3）为了加快发展，根据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我国从 90 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的思想和“抓上海、开发浦东”的意见，1990 年 6 月 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市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邓小平认为，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广。抓上海、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它将影响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因此，邓小平强调：“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继浦东开放之后，中央又决定沿长江开放 6 个城市和 4 个省会城市形成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放带。1992 年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之后，国家又决定实行沿边开放（开放 13 个内陆周边市、县、镇）和内陆所有省会和自治区首府城市开放。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在我国初步形成。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为我国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来加快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仅使上海浦东和环渤海湾地区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新的吸引中心，而且对长期封闭的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根据邓小平关于基础设施建设要搞骨干项目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的思想，我国在“八五”期间决定办几件大事。1992 年 3 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三峡工程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在防洪、发电、航运和供水等方面将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特别是对保障荆江两岸 1500 多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对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为下世纪初国民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来说，兴建三峡工程，更具有深远意义。此后，国家又决定兴建从北京至香港九龙的“京九铁路”。这条建国以来投资最大、线路里程最长的南北大通道已在今年建成通车。它对于缓解我国东、中部地区南北铁路运输的压力，开发中部地区，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和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和我国扩大对外开放都有重要意义。这些大型、特大型骨干工程项目的建设对于带动全国各省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5）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总结 17 年特别是最近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强调在加快经济发展中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提出要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更明确地把它作为今后 15 年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方针。江泽民在谈到如何贯彻这一方针时说：“我们要善于统观全局，精心谋划，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要把加快改革和发展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①]这既是对我国处理三者关系经验的总结，也是贯彻这一基本方针的要求。

[①] 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1992 年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决策，并精细组织贯彻实施，使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八五 ” 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用新的实践检验和证明了邓小平 “ 抓住时机，加快发展 ” 思想的正确性。

第十四章
经济发展环境论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必受到国内和国际诸多条件的深刻制约，这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环境。邓小平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教训，一再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①]在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中，发展环境问题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障，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从战略高度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才能真正理解邓小平这个思想的重大价值。

一、政局稳定是关键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任何国家和地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重视政局稳定；那些现代化的后起国家，要想在较短时期内走完现代化历程，尤其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在动荡和战乱中完成。各国的经验表明，在动乱中实现经济增长几乎举不出任何例证，而动乱导致增长停滞、经济衰退的例子却不胜枚举。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必须以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为前提。政抬稳定问题是当代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遇到的相当棘手的问题。显然，政局稳定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十分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中国的现代化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作保障，政局稳定对我国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邓小平把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视作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和关键原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尤其是对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指导思想上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企图以“抓革命”来“促生产”，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造成了人为的政局动荡，严重冲击了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十年动乱几乎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这个教训十分沉痛，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打倒的邓小平和整个国家一起饱尝了动乱之苦，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恢复政治秩序以加快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75 年，邓小平复出着手全面整顿之时，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顶住各种压力，引用毛泽东“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最高指示”，提出“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以把国民经济摘上去。[①]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②“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③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0 页。

[①]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2 页，251 页。

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目前我国稳定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④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邓小平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1]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六·四”风波后，邓小平在与尼克松的一次谈话中说到：“我们对参加游行示威和签名的学生，包括在海外的学生，都采取原谅的态度，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只对少数有野心和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进行必要的、程度不同的惩处。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稳定压倒一切。”[2]事实证明，邓小平的政治稳定思想富有战略远见。从1957—1976年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奇迹，与稳定的政治局面密不可分。90 年代初期，东欧、苏联剧变，政治、经济一片混乱，中国却保持了稳定，经济上也呈现出欣次向荣的景象，两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邓小平的确是世界上杰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既高瞻远瞩，又极为务实。较为熟悉中国事务、对邓小平改革思路又颇多了解的尼克松指出：“邓小平——伟大的领导人往往这样——比这些专家们高瞻远瞩，他看到的未来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的确如此。邓小平的领导方法历来是高屋建领，“举重若轻”，有大局观念。他奉行这样一个治国信条，即“治理国家，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中国现代化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大局。为了实现中国的发展目标，就必须具有稳定的政治局面，这同样是个大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政局不稳定，“就没有精力搞建设”，必然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甚至使什么经济建设都无法进行，人民生活也无法提高。政局不稳定，也就无法搞改革开放。“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动荡的政局，不仅会使国内如一盘散沙，毫无希望，国外投资者也会望而却步，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也会中断。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发展目标，稳定的政局对经济发展意义尤为重大，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落后状态，中国要发展起来，要实现四化，政治局面不稳定，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1]邓小平的一个高明之处是始终把握这样一个准则：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和关键原则，一切有害于稳定的因素必须坚决排除。例如，他坚决主张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由于多年实践证明，‘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他宣布中国再不搞政治运动，也不允许任何人搞任何变相的运动。他主张对动乱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阻止，而对西方鼓噪不屑一顾。他历来强调“四个坚持”，因为，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乱了”。在政治民主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民主是我们的目标”，没有民主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但实现民主必须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一是要循序渐进，“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二是不能片面追求形式上的民主，“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

---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6页，331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6页，331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6页，331页。

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文革”的教训太深刻了；三是不能照搬西方那套民主制度。如果那样，中国“非乱不可”。他说：“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②]“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③]西方一些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问题，把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看作是仍搞资本主义”，当邓小平一次次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则又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逆转”：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邓小平。1987 年 2 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到：“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改革派，把别人看作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他说，我是实事求是派。”④

必须指出，邓小平的稳定观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政策稳定和社会稳定等等，但关键是政局稳定，他所说的稳定并不拒绝变化，并不意味着各方面的静止、停滞，而是一个动态有序的过程，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他在强调坚持四顶基本原则、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同时，又反复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全面改革；他在强调安定团结的同时，又大力倡导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他之所以高度重视政治稳定，绝非为稳定而谈稳定，而是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政局稳定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互为前提，相互促进，是辩证统一的。因此，邓小平的稳定观是动态的稳定，发展中的稳定，充肃舌力和包新的稳定。

二、实现政局稳定的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把一个混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有秩序的、进步的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和保证。我国稳定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但是，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

首先，现代化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整体性变迁过程，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①]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层出不穷的现象。我国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矛盾，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经济差距拉大，地区差别加剧，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民工潮涌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社会治安恶化，社会心理冲突，宗教问题与民族矛盾的存在……这些问题虽是社会进步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就有可能成为引发动乱的根源。

其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遇到了“左”和右的方面的干扰。一方面。“左”的思想流毒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有些人长期习惯于旧的体制和旧的思想模式，习惯于用“阶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9 页，第 244 页，332 页，209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9 页，第 244 页，332 页，209 页。

[①]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 页。

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动不动就想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构成对改革开放的主要危害。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促进了对外联系与交往，在一部分人中滋生了向往资本主义、怀疑甚至否定社会主义的自由化思潮，成为干扰改革开放、影响政治稳定的另一危害因素。对此，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

其三，西方世界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确想把中国搞乱，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在我国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中，他们这种陈腐落伍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表现体现得淋漓尽致。邓小平在 1989 年 9 月与李政道的一次谈话中也说到“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②]

总之，我国目前存在的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安定因素还很多，维护政局稳定并非易事。为了实现我国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治理。邓小平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和丰富的历史经验，提出的实现稳定的治国方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稳定是保证。这就是说，维护稳定的关键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发展的条件，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政策不变，两者是紧密相关的。政局稳定是关键，政策稳定是保证。“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①]他反复强调“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现行政策不能变，无论对内对外政策都不能变”[②]，“改革开放政策不变”，“要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一个字都不能动。”[③]在邓小平看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关系到我国长治久安的千秋大业，是实现稳定的根本途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经济发展的奇迹，主要归因于政策正确，人民拥护，谁都不能更改这些政策，也改变不了；谁更改它，谁就会被打倒。

2.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就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看，稳定为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稳定的基础。唯物史观历来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载物”、“厚生”，民无“恒产”，因无“恒心”，“仓禀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目前主要问题是经济落后，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困，如果我国老是处于贫穷状态，它就“站不住”，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984 年 10 月，邓小平在谈到实现“翻两番”的战略意义时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大变化。我们对待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5 页，32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5 页，32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17 页，156 页，296 页，89 页，37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17 页，156 页，296 页，89 页，371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17 页，156 页，296 页，89 页，371 页。

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④]1992 年 1 月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又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⑤]经济发展需要政局稳定，只有稳定，才能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为政局稳定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政局稳定是脆弱的、难以长久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缺一不行。就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看，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改革与稳定也是相互统一的，维护稳定，并不是拒绝变化。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变动不居的，“生生之谓易”，“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因此，必须以变应变。邓小平历来反对以不变应万变，他主张“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他大力倡导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与教育体制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全面改革，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①]总之，要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以保证现代化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3.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坚持“两手抓”，是邓小平“按照辩证法办事”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提倡的一种科学领导方法和治国方略。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从不同侧面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诸如：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既要反右，又要反“左”等等。他还多次要求全党改变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

4.排除来自“左”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冲击、干扰我党的基本路线，造成政治不稳定的危险，既来自右的方面，表现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来自“左”的方面，表现为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干扰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因此，邓小平坚决主张既要反右，又要反“左”。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邓小平主张，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维护稳定的政局，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他反复强调：“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安定团结的思想基础。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问题，“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①]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对右的危害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容易认识和理解，而对“左”的危害与政治不稳定之间内在联系却往往忽视。邓小平在 80 年代和南巡谈话中多次指出，从历史上看，我们吃亏主要在“左”,“左”的思想根深蒂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危害在于“左”，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17 页，156 页，296 页，89 页，371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17 页，156 页，296 页，89 页，371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56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6 页，50 页，250 页，156 页。

现实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这种见解十分精辟。

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和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战略思考表现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和远见卓识，政治稳定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手段，而且与现代化战略目标融为一体，成为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的实现我国政治稳定的途径具有深远的时代指导意义。

三、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就外部条件来说，需要一个持久的国际和平环境。邓小平说：“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世界局势的稳定，中国至少需要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②]“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③]，我们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④]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70 年代末以前，我党工作重心放在抓阶级斗争和反帝反修上，并未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这固然与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有关，同时也与冷战格局下国际环境充满冲突、对立和危机有关。80 年代世界政治格局走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新时期国际关系的主题。邓小平通过对这种国际形势变化的分析和正确判断，顺利地实现了我党工作重心的转移。80 年代以来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加强国际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经济建设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邓小平不仅强调和平的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还分析了争取持久的国际和平环境的可能性。1985 年，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改变了我们过去“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首先，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国争霸，世界战争危险存在，但双方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谁都还不敢打；其次，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占世界人口的 3/4，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包括西欧、日本等，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美苏人民也不支持战争。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苏联解体后，美国妄图独霸世界，但是，世界格局正向多极化发展。1990 年 12 月，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中说：“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复杂得多，乱得多”。[①]和平与发展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大势所趋，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

和平与发展虽已成为时代主题，但是，至今为止，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因此，争取和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成了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具体的做法，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6 页，50 页，250 页，156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6 页，50 页，250 页，156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6 页，50 页，250 页，156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3 页。

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往来。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①]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不打别人的牌，也决不容许别人把我们当牌打，准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我们就反对谁；谁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就反对谁，因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我们还必须加强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如加强南南合作及与欧洲、日本等国的合作等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扩大，就能更加有效地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来说，邓小平特别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为了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邓小平还提出了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即“一国两制”和“共同开发”。我们用“一国两制”成功地解决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争端。对中日有关钓鱼岛问题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关于南沙群岛问题上的领土主权争端，邓小平从维护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关系着眼，主张把主权问题先放一下，搁置起来，共同开发。同邓小平谈话的外宾都认为这是新思想，很有意思。

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早在 1974 年联合国发言时就谈了这个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反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差距越拉越大。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障碍。解决这个问题要靠南北对话，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要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坚持同所有国家都往来。“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①]邓小平认为，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毕竟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形成及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国在经济关系上的互相依赖亦随之而增加。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是个大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增强与我国的合作往来；同时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资金、市场等等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1989 年政治风波发生后，西方七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使我国在国际上一度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些人对此不免过分悲观，邓小平及时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变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于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3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9 页，354 页。

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善于把握。”[②]事实证明，邓小平这段话富有预见。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灵活、机动、务实的外交活动，很快就打破了国际封锁的僵局，西方七国不得不一一宣布放弃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为我国经济加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9 页，354 页。

第十五章
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发展思想的新贡献

人类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不可能超越。任何理论的完善程度取决于它满足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需要的程度。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分别代表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两个重大里程碑。系统考察邓小平对毛泽东经济发展思想的继承、扬弃和发展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现代化主题

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必然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在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之后就要"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也同样认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大体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①]

不可否认，毛泽东在理论上对工作重心的转移还是有所认识的。1949 年 3 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必须逐步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工作中，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同年 6 月，他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函张澜说："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又及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①]对党的八大提出的关于我国基本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论断，他起初是赞同的。即使是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他在 1958 年 1 月所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1959 年 10 月庐山会议后，他在接见拉丁美洲 17 国代表团时还说："今后的十年或二十年内，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据此而断定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主题的认识是明确的，显然不合历史事实。事实上，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是矛盾的。由于历史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毛泽东整个思想框架的意识中心是革命，这种革命，主要表现为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阶级斗争这个命题在他心中重千斤，这是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杠杆，是解放生产力的一种工具价值性手段。但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之时，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革命救亡的需要，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关注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发展生产力有所忽视。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1941 年 9 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

[①] 《列宁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35 页。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 568 页。

的讲话中曾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①]这表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当时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这种观念主宰了以后毛泽东的整个思维框架。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据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克诚回忆，毛泽东问他："党在城市的中心工作是什么？"黄克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是生产建设"。毛泽东这时摇摇头说："不对，是抓阶级斗争"。1957 年 2 月，他在内部的讲话中明确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到 6 月公布这一讲话时，又对这一结论作了重大修改，认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②]留下很多潜台词，这当然与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有密切关系。9—10 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作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错误结论，打断了在 1956 年下半年提出的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进程。此后，他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误区，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

邓小平对发展生产力把握得比毛泽东准确，这也导致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一个重大分歧。早在 1950 年 5 月，邓小平在西南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③]60 年代初，他又从发展生产力着眼，支持"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的做法，但却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75 年邓小平复出后，面对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局面，提出全国全党面临的大局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着手对军队、交通、农业、工业、教育科学事业等各方面的整顿。这势必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否定，因而又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重新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的工作重心。

在中国现代化主题问题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合理内核，继承了把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积极思想成果，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理想，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迷误，把发展生产力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党的政治路线，并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是个理论上的巨大飞跃。

二、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和概括，而且反映了发展经济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方针，大体包括发展目标、发展途径、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22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 769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48 页。

发展方式三个主要方面。

在发展目标上，从我国国情出发，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的战略指导思想。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强调，认清中国国情，仍是认清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基本依据，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情作了具体分析。1957—1958 年，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穷二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小国。1984 年，邓小平也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1]因此，加快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凸现出来了，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毛泽东说过，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邓小平也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国内还有一些人不大相信社会主义。对这些人要加强说服教育，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有鉴于此，1955 年底，毛泽东就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邓小平在 80 年代以来也多次强调“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发展大慢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这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邓小平和毛泽东在我国经济发展目标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事实上，毛泽东并没有能够真正从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实际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过高，脱离了实际，欲速则不达。1957 年以前，毛泽东提出用近百年时间分两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还是比较积极稳妥的，但是 1958 年 5 月，他突然提出 7 年赶超英国、15 年赶上美国的主张，同年 6 月和 9 月，他又要求 2 年到 3 年超英、7 年超美，严重脱离了国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受挫使毛泽东对此问题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联系实际，总结教训，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我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也有了初步认识。1961 年 9 月，他在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中说道：“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摒弃了发展目标中超越阶段的空想成分，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积极思想成果，阐述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在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和部署，既宏伟远大，又切实可行。此外，邓小平还改变了毛泽东加快经济发

---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4 页。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2 页，116 页。

展战略目标中主要重视产量增长、对质量效益与人民生活关注不够的做法，把加快经济增长与提高质量效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把“数量型”和“质量型”两种发展目标相统一，体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观，比较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为了实现发展目标，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发展途径。邓小平和毛泽东在中国经济发展推进机制的选择上表现出不同的导向。1985 年 4 月，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时说：“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②]

首先，毛泽东注重用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推进经济发展，邓小平则更注重科学技术与教育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未曾意识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1956 年 1 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说：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1958 年 1 月他又号召“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内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③]但是，由于深深植根于战争年代的经验，毛泽东更注重用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推进经济建设。早在 1956 年他在听取 34 个部委汇报时就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所以能超过苏联，主要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薄一波指出：“‘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们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①]如大兵团作战修水利，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等等。政治运动、群众运动这种战争年代的方法并不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企图以“抓革命”来“促生产”，把“阶级斗争”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更是错误的。30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途径主要靠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通过追加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劳动力数量来扩大生产规模和加速经济增长，这可以归结为一种“粗放型”经济。当然，鉴于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发展“粗放型”经济是必要的，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我国经济应向“集约型”经济发展，即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办法来扩大生产规模。现代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但它首先必须是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人。为了加快我国经济发展，邓小平较早地把注意力移向科学技术。1975 年 9 月，邓小平在复出后整顿过程中就提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1977 年 5 月，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又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1988 年 9 月，他进一步提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据此，他多次强调把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作为我国产业发展的重点之一，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坚决停止了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从对社会生产力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辩证分析中揭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地位，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指导意义。

其次，毛泽东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2 页，116 页。

[③]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721 页。

力发展的反作用，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本身要求；邓小平则从发展生产力着眼，提出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早在 1937 年 8 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1959—1960 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多次强调“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这从原则上说是对的。但问题是，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夸大了这种“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决定作用”，造成了不良后果。如在农村，人为地加快生产关系变革的步伐，当初级社建立不久，就建高级社，高级社还没有巩固，又搞“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这一切都是以生产关系为中心考虑问题的结果。对此；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自己承认：“我注重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的问题，至于生产力的方面，我的知识很少”。[①] 这样就违背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受到了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文革”中我国又在上层建筑领域“爆发革命”，大批“唯生产力论”，其结果又使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致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吸取了这个严重教训，在理论上取得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观点。他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如果说毛泽东把发展生产力的重点放在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变更之上，那么邓小平则主要从我国生产力水平出发，通过改革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事实证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正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江泽民在 1995 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全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十七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就是在改革中实现的。实现未来十五年的奋斗目标，关键仍在于深化改革”。

其三，在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的程度差异。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也是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对外开放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程度。毛泽东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曾提出过对外开放的思想。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列了一个题目：“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建国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客观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①]主观上则对对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9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27 页。

外开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自己孤立自己”。毛泽东在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到“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的建设事业自己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个原则是对的，但过分强调前者就有问题。直至“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国同世界隔绝了。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多次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继承光大了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合理成分，剔除了其中不合时代主题的内容，大力倡导“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资金、人才，扩大对外经济交往，这已成了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强大动力。

在发展方式上，毛泽东与邓小平都强调了我国经济“波浪式”发展规律。“波浪式”发展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邓小平也认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①]“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②]发展经济学中，素来有“均衡型”和“非均衡型”两种发展方式的争论，但两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对立统一的。毛泽东强调不平衡发展，并非排斥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而是一种积极平衡，其用意是不要用消极平衡的办法束缚群众的手脚和前进的步伐。但问题是，毛泽东把它强调得过分了，在“大跃进”中完全不讲平衡，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以钢为纲”，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大起大落，这是个很大的教训。在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中，关于“非均衡”发展问题有几点十分引人瞩目：第一，在产业发展问题上，他在强调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第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三，经济发展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在某一阶段“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这些都可视为经济发展的“波浪式前进”的规律。事实表明，在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上，邓小平比毛泽东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入，也更正确。

如果说邓小平与毛泽东关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所提出的战略原则是相同或相似的话，那么，在经济发展的战略步骤、经济增长模式和战略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7页，36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7页，368页。

实施途径上，二者却表现出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所致。邓小平在认真反思和吸取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三、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

经济发展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在既定的生产关系下还有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问题。因此，为着实现经济发展，需要选择适合一定阶段具体国情的体制模式。一般地说，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经济体制模式，但经济体制模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制度依托，它反过来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反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品经济已经消亡的“按照计划进行社会生产”的体制。但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诞生在处于比欧洲最落后国家还要“落后状态”的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在经过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后，1921 年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不但容许而且还在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已经社会化的国营企业也在改用所谓的经济核算制，即商业原则”。[①]这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迅速发展起来，国民经济也很快得到恢复。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斯大林很快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建立起以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各国必须效法的唯一楷模的苏联体制模式，虽然在其初期集中力量建立工业化基础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个体制模式带有根本性的缺陷，它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并不成功。所以，邓小平在 1985 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到：“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

毛泽东是我国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进行探索的第一人。新中国成立至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期间，我国基本上是学习苏联，建立起单一公有制结构和高度集权相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一五”期间进行重点建设，奠定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这种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毛泽东也敏锐地感觉到这种体制模式的严重弊端,从 1956 年起开始着手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进问题，在经济管理体制、市场机制和所有制结构、分配形式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实践上也作过大胆的探索。但是，由于时代局限，他在思想上并没有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把单一公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他的改革也大都只是在原有经济模式的框架内进行修补和完善，并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整体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教训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领导人民在实践中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根本上突破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框限，建立起适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模式，对毛泽东在体制模式方面的思想有了巨大的发展。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54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39 页。

第一，在所有制问题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中，曾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即国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基本上实行了上述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这在当时是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对国民经济的恢复起了很大作用。1952 年，毛泽东提出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1955 年，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①]当然，不能否认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意义，但是，这种过早、过快、过纯的所有制形式的改造对以后经济发展留下了不少后遗症。1956 年 12 月，毛泽东针对三大改造中公私合营后存在的某些问题同工商业人士进行了多次谈话，指出：“我怀疑我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②]但是，这只是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方面所闪现出的零星思想火花，他说的“新经济政策”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的思想深处仍然坚信单一公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毛泽东的单一公有制思想又有所发展。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说：“我们提出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然后使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此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刮起一次又一次“共产风”，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大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几乎把公有制和人民公社以外的经济成分扫除得干干净净。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对所有制结构作了一系列论述，主要内容有：发展个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采取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吸引外资，发展外资企业；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在邓小平上述思想指导下，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制以及其他公有制形式）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繁荣的局面，从而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第二，在分配形式上，毛泽东认为，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我国社会主义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也肯定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这些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一种平均主义的趋向，错误地把按劳分配视为“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批判和限制。1958 年他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要求实行“供给制”，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 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 22 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70 年代他又进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98 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434 页。

步提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下，从 1958 年到 1978 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大搞平均主义，结果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发展，不仅谈不上共同富裕，反而导致普遍贫困，这是我国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大败笔。邓小平对此弊端看得十分真切：“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铁饭碗’，现在看来这个路于是对的”[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坚决纠正了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确立了物质利益原则，制定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邓小平的这一价值取向，冲破了我国几千年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纠正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的影响，为确立劳动致富的物质利益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反映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相统一的原则。

第三，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同时必须尊重价值规律，“计划第一，价值第二”。毛泽东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曾经有过不少精彩的论述。他在 1958 年底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针对陈伯达主张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直接调拨的错误倾向时指出：现在有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不让它们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赞同斯大林提出的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观点，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就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此外，毛泽东还认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认为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最终与生产力水平有关，他不同意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局限于消费资料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仅消费资料是商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他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并主张大大发展我国的商品经济，有很大的理论创新。

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相联系，毛泽东还一再强调价值规律的客观性及其作用。1959 年，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针对当时“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要使县社干部“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就得碰得头破血流”。他还提出了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论断。

但是，毛泽东的思想深处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按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毛泽东一直没有摆脱这种凝固化观念的束缚。他虽然一度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但总是认为商品经济会产生资本主义，因此要处处限制它，防范它。后来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迷误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不但没有得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55 页。

到发展，反而倒退了，他夸大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消极作用，因而主张加以“限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积极思想成果，以极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一公认的“基本原则”仍早在 1979 年 11 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①]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在邓小平这个思想指导下，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念。从内容看，决议中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邓小平对这个决定评价很高，说它“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确实很好”。[①]1989 年的政治风波过后，理论界仍有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与姓“社”姓“资”问题联系起来，对此，邓小平多次严肃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②]。他的一系列讲话，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在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把计划和市场看作组织经济的手段，他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目标出发，主张利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大大深化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第四，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毛泽东较早觉悟到苏联式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认为必须进行改革。1956 年 4 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他主张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在微观经济管理，即企业管理问题上，他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余地、一点利益、恐怕是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联系我国实际，在注意解决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长期比例失调的同时，特别强调改革企业管理问题，即企业管理的民主原则。他提出：“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这就是他后来进一步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经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许多宝贵思想并未在实践中得到贯彻，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革，影响了地方与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36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3 页，36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3 页，364 页。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集中谈到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他指出了我国经济管理工作存在的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等弊端，认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如何改革呢？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力”[①]。即要扩大地方、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调动它的积极性；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实行职、权、利相结合；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明确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提出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精简各级行政机构；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等等。在此后实施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等一系列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邓小平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思想的重大价值。

1980 年 10 月 25 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到：“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这段话用来考察邓小平与毛泽东经济发展思想的关系也是恰当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吸收国际经验、总结本国经济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了毛泽东经济发展理论中的积极成果，并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和新的实践，对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思想中不合时宜的部分作了纠正和发展，使之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

后记

本书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的 1993 年度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的研究成果。幸运的是，在我们从事课题研究期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第一、二卷第二版出版。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出现了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杜会主义理论的高潮。我们在有关领导和同志的关怀支持下，先后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地厅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国家教委举办的全国教育系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第二次邓小平思想理论研讨会、邓小平与中华腾飞理论研讨会、陕西省邓小平经济思想研讨会等，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和学习机会。我们在 1995 年上半年基本完成研究成果的初稿后，中共中央又批准印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通过学习《纲要》，我们对原有的研究成果作了进一步修改。我们的课题得以顺利完成，与上述有利条件密不可分。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国家教委有关领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4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00 页。发展-经济模式-中国-思想评论IV.

导给予的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杨长福研究员、人民日报理论部蒋映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金羽教授、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李秀潭（现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秘书长冯家臻等同志对于本课题研究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指导，特此表示感谢。尤其要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苏星教授在百忙中审阅了本书的研究提纲，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本课题负责人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冯世新。课题研究由冯世新提出研究提纲，然后由冯世新、陆卫明（西安交通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分工撰写。其中，冯世新撰写前言、第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章；陆卫明撰写第一、二、三、四、六、十四、十五章。初稿完成后，由冯世新通阅全稿，提出意见并进行认真讨论后修改定稿。